

「關於海外交流這回事」

城鄉 通訊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38

Apr.
2025

四月號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No. 38 Apr. 2025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康旻杰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製作 賴彥霖
美術編輯 賴彥霖
文字編輯 陳品嘉、賴彥霖
(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

雜誌投稿請洽：thentunews@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本期《城鄉通訊》為本屆編輯團隊負責的最後一期。緊接在畢老師退休專刊之後，本期內容或許稍顯不同，但編輯群仍竭力呈現精彩的篇章，以期讀者能掌握城鄉所的最新動態。

本期主題聚焦於「海外交流」。我們邀請了曾赴或正於海外精進學習的同學們，分享他們在異地訪察、駐足或短期居住期間的所見所聞。去年七月，芷榕跟隨麗玲老師及三位城鄉所同學前往印尼峇厘島，進行參與式規劃設計。她們不僅體驗了當地的風土人情，更從實地調查中洞察了地方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曉渝和維哲則參與了由怡君老師帶領的 IFoU 工作營，深入香港新界與中國深圳之間的新田地區，細膩探討大灣區科技新都及工作棲地等空間形式所帶來的規劃挑戰。文章不僅詳述了活動的參與過程，更藉此反思以科技為規劃基礎的局限性，促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思辨。今年四月上旬，懷超在舒楣老師的帶領下，前往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展開為期一週的考察。透過閱讀日本鄉野地景，並與當地居民互動，同學們以真誠與熱情為震災後的能登帶來一絲溫暖與希望。世浩、李安和于慶則以交換生的視角，分享了在荷蘭萊頓大學及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習與生活點滴。最後，思曼透過結合不同城市的研究旅程，為我們帶來一場跨越時空的反身性對話。

在教職員訪談部分，我們有幸邀請到本所合聘教師林楨家老師，與我們分享其近期的研究概況；以及新聘教師郭怡君老師，闡述她過往的學思歷程以及對未來教學的展望。本期的校友洄游單元，衷心感謝白仁德學長（老師）和林辰學長接受我們的訪問，他們分別回顧了自身與城鄉所的連結，並分享了工作領域的經驗與體悟。本期新增的社會行動篇章，特別感謝毓文鉅細靡遺地回顧他親身參與的和平新生天橋反拆運動，並納入潛在的公館圓環拆除議題，藉此省思都市公共設施留存的困境與挑戰。拆除並不代表空間的終結，而是另一場行動的開端。最後，本期收錄的三篇城鄉評論文章皆饒富趣味，誠摯推薦各位讀者細細品閱。

隨著本期刊物的付梓，我們也將卸下編輯的重責大任，交棒給下一屆的同學，由他們繼續為各位讀者帶來優質的內容。衷心感謝各位讀者一年來的支持與愛護，編輯群在此向大家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5.4



城鄉通訊

目錄

ii 編輯室報告

1 專題報導：關於海外交流這回事

許芷榕

3 以社區為本的旅遊規劃田野經驗——峇厘島跨境實習筆記

曾曉渝、張維哲

16 在變動中的邊界思索規劃：參與香港 IFoU 工作營的經驗與反思

紀懷超

25 移地實習記行：日本能登災後復興現況

陳世浩

31 以巴議題、砍預算、本土化——轉動中的荷蘭： 我在荷蘭萊頓的觀察手記

徐李安

35 A capacity for agency is a capacity of desiring.

詹于慶

37 早稻田大學雙聯學位生存指南

張思曼

41 把一篇論文走完：一個暑假的研究旅途 ——從田野感知到方法整合，走向理論與學術對話的三段式實踐

2 教職員動態

45 縉紳化的狂想：林楨家老師專訪

52 千迴百轉的社會生態纏繞：郭怡君老師專訪

3 校友迴游

62 「交通」人生的再進化：白仁德老師／學長專訪

70 化無奈為動力，透過幽默：林辰學長專訪

4 社會行動

陳毓文

79 上來瞧橋：從天橋與圓環看臺北市失效的公共空間政治

5 城鄉評論

柳瀨葵

91 都市邊界：橫濱黃金町、壽町與港未來的空間分隔與融合

陳彤

102 誰的開放空間？——談新板特區豪宅爭議

張維嫻

113 政大性別通用廁所爭議事件——運動與空間規劃策略分析

不論是個人、團體的出遊或出差，每一次的海外經驗總能進一步拓展彼此的視野，帶領大家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城鄉所自創所以來，持續與國際接軌，除了引進多元而新穎的資訊，也提供豐富的海外交流途徑，讓學生們有機會踏出島嶼，親自探索廣闊的世界。本期專題報導邀請許多透過不同途徑，親身參與過海外交流的同學，為大家分享來自現場最新、最真實的情況。

專題報導：關於海外交流這回事

◎編輯：賴彥霖



◀清晨的羽田機場—攝影：賴彥霖

專題報導

以社區為本的旅遊規劃田野經驗 ——峇厘島跨境實習筆記

◎撰稿：許芷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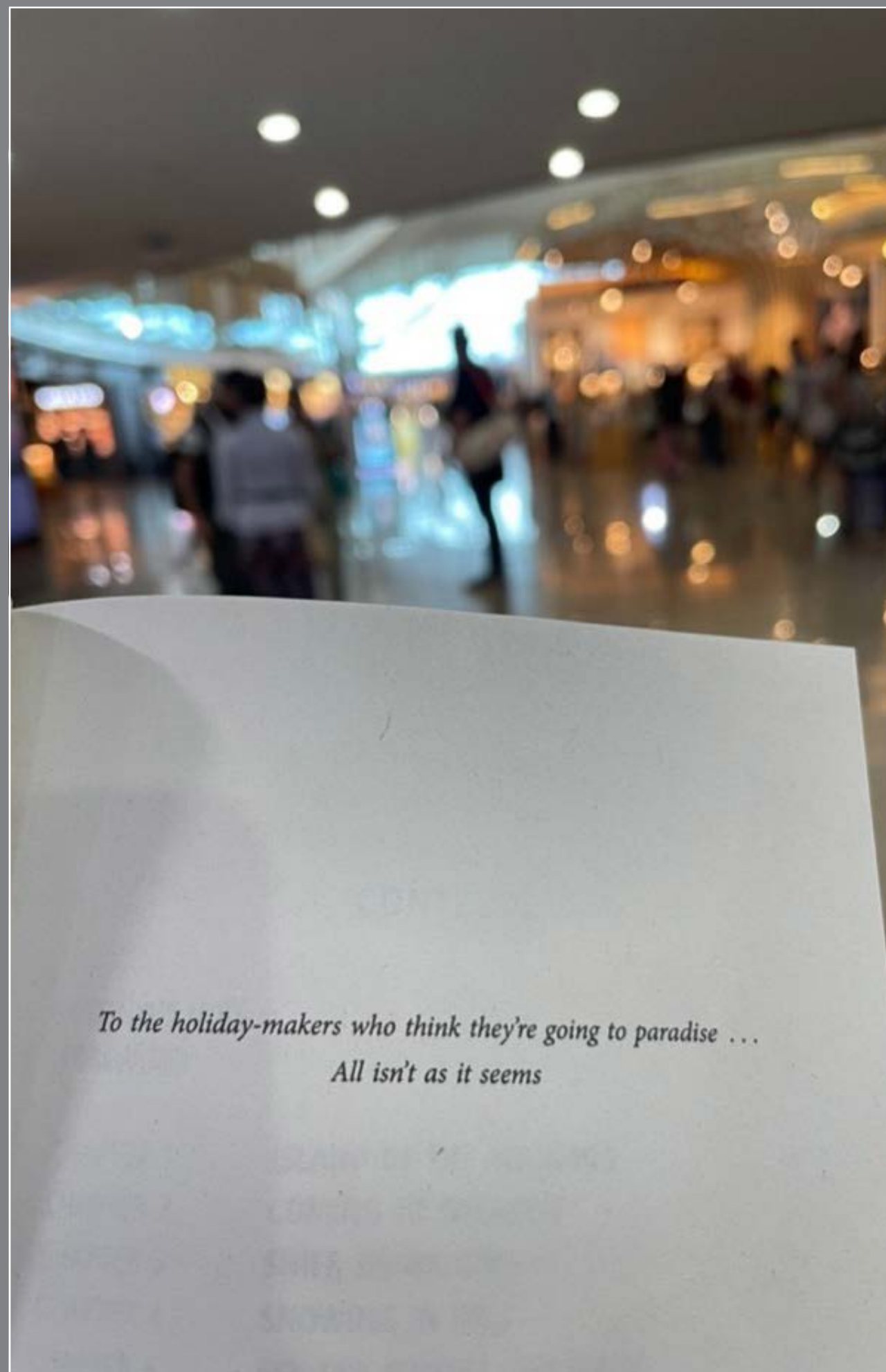
七月底，是峇厘島天氣非常宜人的時節，搭配著舒服的涼風從伍拉·賴國際機場（Denpasar）返程，準備登機前跟同行夥伴在出境書店看到書架上主打的書籍——“SNOWING IN BALI/ THE INCREDIBLE INSIDE ACCOUNT OF BALI’S HIDDEN DRUG WORLD”，翻開第一頁的篇章，沒想到這完全是我待在峇厘島兩週的最佳詮釋。

今年很幸運以研究生的身份第一次拜訪峇厘島，一個位於印尼最東邊的自然豐沛島嶼，參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rbanism Foundation，IFoU 2024 舉辦的 Summer School，2024 年的參與主題是

Community-Based Tourism Development at Balinese Villages (CBT)，以社區為本的峇厘島村落觀光發展規劃。本次國際城市論壇工作坊專案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印尼塔魯瑪迦大學（UNTAR）以及清華大學東南亞中心（TSEA）籌辦，在峇厘島總共選定了三個不同類型的村落進行深入訪談進行兩週的規劃研究，包含城鄉所與清華大學、韓國忠南大學等規劃學院一起透過參與式規劃（Participatory Design）、嘗試透過實際參與實地考察、與國際間的學生進行幾回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後嘗試提案、激發當地社群有更多的活力。



▲作者與七月底的峇厘島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登帕薩機場出境書籍的推薦書籍，請觀光客看見真實的峇厘島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這次工作坊進行工作的地方位於清華大學東南亞的研究基地 TSEA，地點位於其中一個駐村瑟蘭干島（Serangan Island）上。在工作坊的前四天，老師與同學除了實際走訪瑟蘭干村 Serangan Island、Kelcung Ecovillage（Beach Village）、Tenganan Village，一邊在研究基地進行交流、演講學習，TSEA 的公共空間非常舒適，每一樓層空間都有水池小花圃、梯間的轉角不規則的躺椅、甚至是遠眺海岸的屋頂咖啡空間，使得我們這些與印尼文化很遠的亞洲學生願意打開心胸與旁邊的陌生人打開話匣子聊聊不同的心得。

參加本次工作營由麗玲老師帶領我們四個研究生（R08 詠竹、R10 玖圻、泓雨）一同參與，我們與其他國際學生分別進駐三個村落，而我選擇著與自己關聯性最高的港口小島——瑟蘭干島

（Serangan Island）是一座位於登帕薩地區東南側的小島，跟主島相當的靠近，小島的許多物資依賴本島的支援，所以每日的交通繁忙，基本上全仰賴橋連通本島的所有生活所需，打開 google 我們可以查到這裡以海龜保育暨教育中心（Turtle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Center）聞名，同時是一個 90% 仰賴漁業維生的村落。以地理位置而言，我們定義它屬於都市聚落（Urban village）一種。實際進到 Serangan village 頭幾天的訪談裡，發現這裡有一座超過 300 年以上的清真寺，但訪談當地區公所的過程中，公務員卻說這個村落的年齡大概只有 30 多年，因為語言不通，我們的訪談仰賴印尼的同學以英文翻譯，而在轉譯英文的論述這個村落的发展情況時，大抵是有幾個對不上的年限線索。沒想到在小島上的各種複雜時間線索與語言是增加整個調查困難度的開端。



▲城鄉所的五位夥伴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第二天啟動訪談與田野調查工作，當地的村落的小區域稱為「Banjar」，以及稱為 Kampung 的村莊單位，Serangan 一共有六個「Banjar」及一個「Kampung」，為了瞭解當地最古老的清真寺，我們拜訪了當地最古老的布吉斯原住民區——Kampung Bugis（武吉士村），有祭祀墳墓、傳統儀式的廣場、甚至

也有一些固定的活動範圍。Kampung 跟 Banjar 的活動幾乎不重疊，而不同 Banjar 的小孩們都會聚集在村落正中心空地玩耍，讓我們對於村落裡的每個種族實際範圍有些許疑惑，村落間對於陸地的領域（Territory）沒有非常固定的界定範圍，而這個謎題在閱讀了 Serangan 的上位計畫（Master plan）後，才解開了疑惑。



▲ TSEA 空間狀態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據當地人口述位於 Kampung Bugis 的清真寺建立於 17 世紀，在網路世代卻幾乎找不到相關中文資訊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典型的 Bugis 建築——高蹺屋主要的房屋空間聚集在二樓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 Kampung Bugis 的裡的現代化的住宅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鄰近都市中心的村落命運

在全球資本主義加速流動的時代中，都市邊陲地帶常被視為潛在的投資空白與發展機會，特別是位於全球南方、世界知名的觀光地景中，這類空間既被想像為「未被充分利用」的自然資產，又被視為可以重新編排為旅遊與服務經濟網絡的一部分。Serangan 島正位於這樣一個想像與治理交織的節點上。除了因擁有 10 世紀以來保存完整的歷史古蹟廟宇外，面向海洋而成為觀看日落的絕佳場域，逐漸被納入政府與親發展聯盟眼中的觀光資本場域。在上述都市發展敘事中，Serangan 離島的破碎地貌——原本是地理與生態的獨特性——反而成為發展的障礙與「待整治的問題」。於是從 1995 年到 2005 年間，地方政府展開了為期十年的填海造陸工程，試圖以現代技術手段「修補」其空間上的非連續性，進一步將之整合進以土地為主軸的現代化治理與商品化空間體制之中。

Serangan Village 同時是當地有名海龜保育及教育中心所在地，設立於此原因是島嶼的沙灘地形適合海龜孵蛋，而在啟動大面積的填海造陸、海上觀光旅遊事業後，當地生態環境接受到十分嚴峻的衝擊；捕撈、人類的遷移亦改變了瑟蘭干島地形，當一切發生以後，峇厘島省長 Dewa Beratha 於 2006 年在 Serangan Village 設立了海龜教育與認養中心（TCEC），該中心旨在消除峇里島非法海龜貿易的綜合策略，透過收容受傷的動物、從旅遊海灘收集巢穴以及從當地人手中購買烏龜蛋（防止它們被吃掉）來實現目標。在教育中心繁殖海龜卵，幼龜飼養約一個月後，再被野放到海灘或直接進入海裡。待在村落研究的這幾天，翻開許多資料查看、觀察整體開發規劃跟生態保育的發展，事實與資料彷彿是平行宇宙，Serangan 的大片填海造陸開發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的空間，而 SDGs 永續發展則是開發正當性的口號，讓這樣的空間得以存續並衍伸空間的價值。



▲由 Kura Kura Bali 峇厘島房地產開發商提出的 Serangan Island 經濟特區願景圖 | 圖片來源：<https://www.balidiscovery.com/bali-special-economic-zone-turtle-island/>



▲日落的港邊環境，運氣好還能看到峇厘島的火山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保育中心中心的招牌標誌，早上一早來到保育中心可以看到準備回到大海的小海龜一盤盤的被放在出口處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除了海龜以外，Serangan Village 的位置在填海造陸以前，其實並不是一個完整的 village 概念，而是散落在零碎的土地上的不同 Banjar，為了讓大面積的填海造陸得以完整，Kura Kura Bali 地產開發商與各個 Banjar 進行協商後，大規模的村落遷移同時在 1995 年進行，除了遷居外海域的使用範圍也從狹長的海域變為單面靠海的捕撈範圍，整合了土地後，就沒有下一步的行動，爾後 Serangan Village 的整體經濟至今 38 年來沒有太大改變，例如基礎的用水設施、垃圾處理空間在這裡都沒有，但觀光所帶來的外部效應卻顯著地呈現在我們眼中。而當地亦沒有充足的學校資源讓小孩得以留下，許多小孩在高中以後不得不離開村落到本島上學，離開後回來的機會很少，跟全世界許多村落一樣留不住下一世代的年輕人回到當地持續進行在地的生活與經營。

Serangan Village 的主體特性在於它的歷史性與豐富寺廟的宗教地景，包含擁有一座 10 世紀落成的印度教寺廟——Sakenan Temple。寺廟是用石灰石和珊瑚建造的，這些珊瑚來自島嶼周圍的珊瑚礁並被切割成型。除了建築之外，亦有十分特別的祭祀儀式及紀律，但對於觀光而言卻是過於嚴肅及陌生的文化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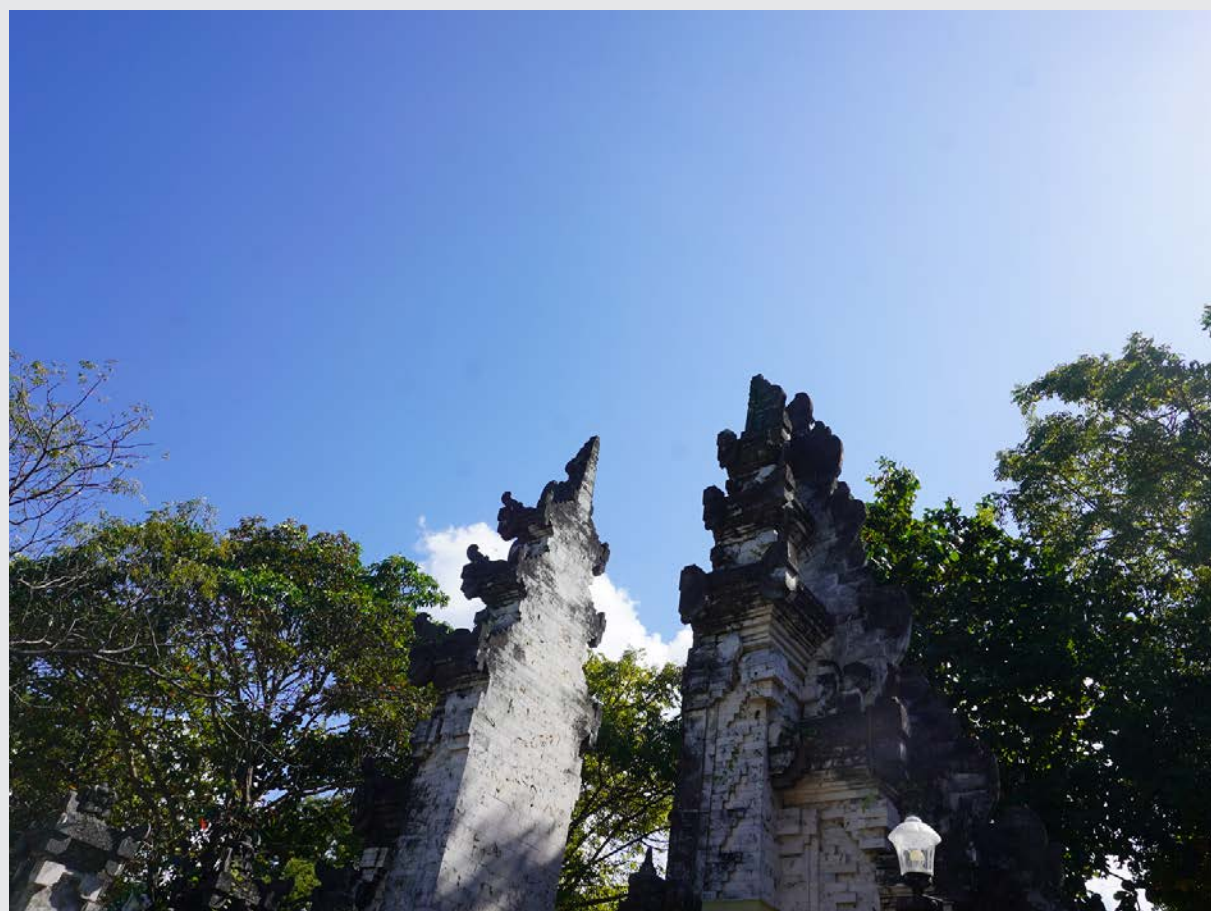
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前往了 Serangan Harbor 及 TCEC 收集更多有關觀光客對於這裡的資訊。比起花時間釐清地方複雜的背景脈絡，吸引來自世界各地遊客的反而是跳島的水上遊程。大批的中國及澳洲遊客一早會開車或聘用司機開車來到村落，搭乘 8 點出海的快艇前往 Kura Kura Bali 或是附近的跳島旅行，進行一天的觀光行程，而通常來到海龜保育中心的則是跟著在地導遊，保母車似的停留一時半刻便匆匆離開，實際留在村落的時間可能不超過 10 分鐘。



▲與印尼同學對來自法國的觀光客進行訪談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村落入口處的地景表情，船屋、海邊及紅樹林幾乎是 Serangan Village 白天的記憶點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 Sakenan Temple 的入口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Serangan Harbor 小小的跳島轉程區，除了早上8點出船及下午4點的返程，幾乎都是十分寂靜的空間——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瑟蘭干島的女性大多需要照顧小孩，而多出來的時間都會以零售商業為主，圖為港口區的零售業婦女販賣著在地小吃、及生活用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個看似擁有觀光資源的區域，卻沒讓觀光客把這裡當成過境的區域，似乎是 Serangan Village 在短期內無法改變的命運。

「在我嘗試要說的話背後，是堅信地理學首先是通過觀察得的知識…換言之，地理學家的主要訓練應該盡可能地來自從事田野工作。這種短途旅行和田野課程是最佳的學徒訓練。學生和領導者持續交換著變化中場景提供的問題與提示，投入有關地景及其中事物性質的巡遊式對話…徒步移動、睡在戶外、夜間圍坐營地，觀看一片土地的四季，是強化經驗，將印象發展成為更廣泛的評價和判斷的適當方法。」（Sauer, 1963b, p. 400）

面對很多爭議的同時，我也反思著，這裡的孩子與大人到底是用什麼眼光看向自己？在 Google 查看「印尼人個性」他給我的答案是：「2.56 億人口的印尼是全世界最大回教國，但「卻是全世界最隱形、最不被看見（invisible）的國家」，印尼人從小被教導與人和平相處，在公開場合必須修飾自己的舉止和說話的表情，不宜突出或引人注意。就像我在村裡看到的一樣，你覺得一切都好像有點不對勁，但沒有人說破任何事情。你會發現爭取、努力抗議這些事情是很難在這裡發生的。在享受美麗自然風景的同時，我聽到路邊總是傳來小孩的玩樂聲，以及大人在結束一天辛苦的捕撈工作後，坐在船屋邊就聽著音樂開始聊天。「我們尊崇每一個 Banjar 供奉的信仰，

每天進行祭拜祈禱，交通議題？沒有巴士？沒有大眾交通工具？沒關係，我們都會騎摩托車……甚至從小學我就已經在整個村子跑來跑去」。現代化是國家嚮往的進程，但對於都市聚落卻是一種不得不跟進的空間壓迫。

這也是為什麼在各個 Banjar 陸續搬進小島北側，讓整個 Serangan Village 密度極高的 38 年裡卻從不衝突的原因吧。族群間的和平共處，使得這個村落一面面對高度開發的威脅，一面又保有純樸美好的年代感，既衝突又矛盾的狀態存在於 21 世界初期，或許將是最後看到的面貌。

兩週的田野生活，或許不能對於一個地方有多深刻的了解，卻是提供機會讓自己真實看見、感受土地與人們的關係，可以有很多的反省，也可以有很多不一樣的感受，我們不是生活在平行時空，而是此時此地，在世界上某一個地方閱見政治、看見不公平的存在。該改變些什麼？可以做些什麼？是在這樣一次次的反思之中尋求答案，而跟你一起的同行夥伴將是共享這段記憶，畢生難忘的存在。



▲瑟蘭干島的小朋友一邊享受日落一邊跟在海上游泳的小朋友進行對話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與韓國、印尼同學在登帕薩晚餐約會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參考文獻

- SAUER, C. O. (1963).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J. LEIGHLY, Ed.; DGO-Digital original, 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j.13167997>
- Turtle Conservation And Education Center (TCEC) 海龜保育中心, <https://tcecserrangan.jimdofree.com/>。檢索日期：2025/4/28。
- MASJID As-Syuhada 瑟蘭干島武吉村清真寺, <https://www.cnnindonesia.com/nasional/20240317090919-20-1075221/masjid-as-syuhada-jejak-peradaban-islam-di-pulau-serangan-bali>。檢索日期：2025/4/28。
- Kura Kura Bali 峇厘島經濟特區, <https://www.balidiscovery.com/bali-special-economic-zone-turtle-island/>。檢索日期：2025/4/28。
- 賀桂芬 (2018) 〈【理解東南亞】淡定和諧 印尼人能教我們的事〉, 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87244>，檢索日期：2025/4/28。

專題報導

在變動中的邊界思索規劃： 參與香港 IFoU 工作營的經驗與反思

◎撰稿：曾曉淪、張維哲

IFoU Winter School 國際規劃設計工作營，每年都會由各地的 IFoU 學術夥伴大學輪流在寒暑假舉辦。睽違 6 年，2025 年 IFoU Winter School 再次重返香港，並由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主辦。此次的基地是位於香港邊界、與深圳只一河之隔的新田，探討未來大灣區科技新都及工作棲地 (Workbitat) 的規劃挑戰，試圖合眾學子之力尋找新可能。城鄉所由郭怡君老師率領 13 位同學前往參與，並在工作營中分為 5 組去討論基地中的不同議題。

啟程之前，參與同學自發舉辦了 4 次讀書會，更邀請了對香港有豐富認識和田野經驗的黃舒楣老師來作行前分享。事後回想，讀書會及分享會對我們有莫大助

益，為我們在工作營中打下了穩固的基礎。在工作營緊張的節奏下，並不會有時時間讓我們由零開始理解議題。營隊中我們當然也得見有參與的同學的確是對基地無甚認識而來，這也正是規劃成果顯得空中樓閣的原因。我們讀書會涵蓋了認識基地、生態及科技的融合、移動與基建等主題，不熟悉香港議題的同學有機會先共同閱讀文獻資料，同時藉由與團內香港同學的交流，讓我們看到香港複雜的空間處境。舒楣老師的分享則為我們梳理了大灣區規劃、漁農業政策及新界東北發展的抗爭脈絡，並提供了更多關鍵字及有用資源，去切入新田的規劃，更拋出了「農業不重要嗎？」等值得深思的問題。



▲圖 1 第一次讀書會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新田科技城作為一種空間修補

回到本次操作的基地，新田複雜的關係網絡中包括擁護大灣區及北部都會區規劃方針的特區政府、擁有了權的原居民、漁業及非原居民等議價能力較低者，更需考慮其位處大灣區策略區位及未來的新住民。

新田，一個香港人原本為之陌生的地方，從 2021 年開始被披上「科技城」的華麗變裝出現在大眾面前，承載了所謂「優質、健康及綠色生活的新社區」的期望。位處元朗區的新田，原本除了是新界原居民世代的聚居地，就只是一個以漁業及棕地（即已被廢棄、或被破壞的農地）為生並隱居邊陲的地方（本土研究社，2024a；張展鴻，2009）。然而寧靜漁塘的不遠處，除了翱翔半空的各種鷺鳥，其實滿是高樓及霧霾，曾經那是隔著深圳河、一個不可跨越的對岸。實際位置如圖 2 及圖 3 所示。

2021 年，香港政府提出將新田科技城定位為北部都會區的重要部分，並計劃將其打造成連接深圳河兩岸的科技創新走廊（相關時間軸見圖 4）。政府旨在發展「南金融、北創科」的香港新產業布局（香港立法會，2024）。變成新市鎮和核心區域，意味將迎來新的人口及相應的社區衝擊。香港的經濟由金融業所主導，而其四大核心區¹則位在英殖時期優先經歷大面積開發的九龍與香港島內。



▲圖 2 新田（紅框範圍）之於香港的區位
| 圖片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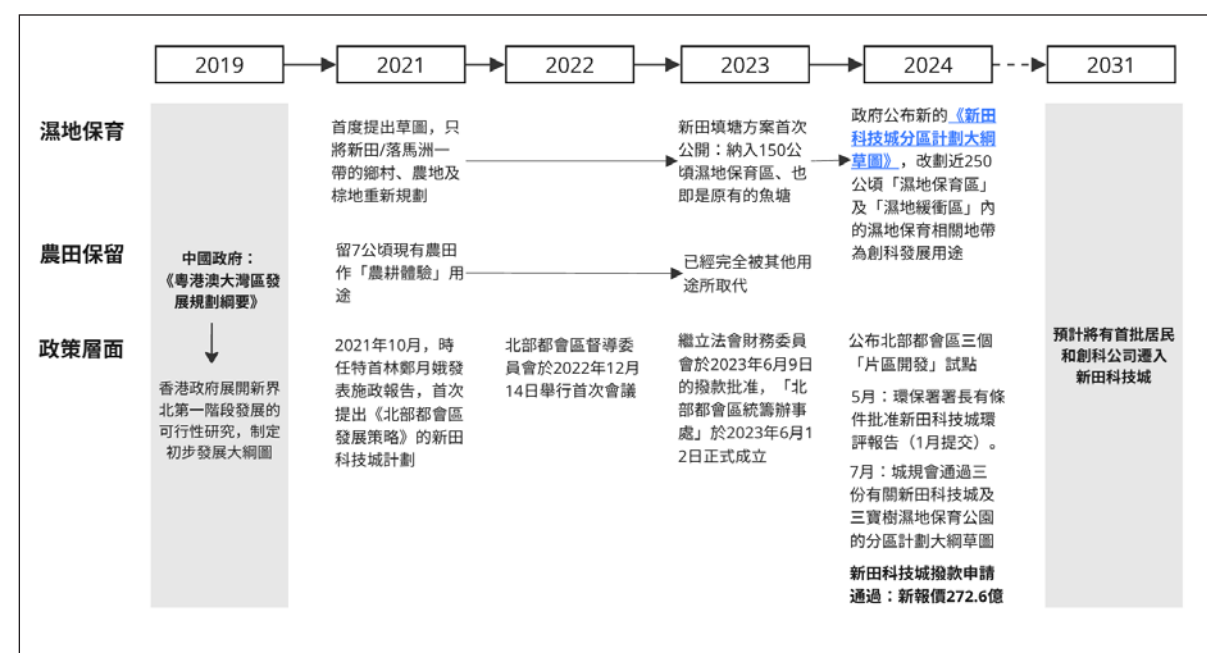


▲圖 3 北部都會區範圍示意 | 圖片來源：新田科技城官方網站

然而，這樣的局勢在未來 10 年即將會被扭轉，並轉移或分流至香港的邊陲。

新田科技城及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計劃報價 272.6 億港元（約新台幣 1 兆 1,176 億元），合共提供約 300 公頃的創科用地；新田科技城將在河套香港園區以外提供約 5 萬個住宅單位和約 6,400 個人才公寓單位，全區將合共創造 165,000 個或以上職位（香港立法會，2023；

2024）。新田科技城在整體規劃中，被定位在北部都會區²的心臟地帶，以毗鄰深圳皇崗和福田的創科區域作為其區位策略，其產業定位為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另一任務為輔助香港發展「南金融、北創科」的新產業布局。除了創科園區，周邊也將開發為完整的住宅社區，建成環境將包括為彌補填塘而造成的生態破壞而開發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新落成的公私



▲圖 4 計畫時間軸 | 圖片來源：香港觀鳥會，2024a；香港立法會，2023



▲圖 5 創新科技園區模擬圖

| 圖片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

▲圖 6 基地現狀及漁塘

|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¹ 四大傳統核心區包括尖沙咀、旺角、中環、銅鑼灣（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2024）。

² 北部都會區覆蓋元朗區和北區，包括天水圍、元朗及粉嶺／上水等新市鎮、多個處於不同規劃及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以及其相鄰地區，約為香港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將發展為一個最終能容納約 250 萬居住人口和提供約 65 萬個工作職位的都會區（香港發展局，n.d.）。

營房屋單位、政府、機構設施和休憩用地網絡，同時在運輸基建方面，將新建北環線鐵路、公路的改造和興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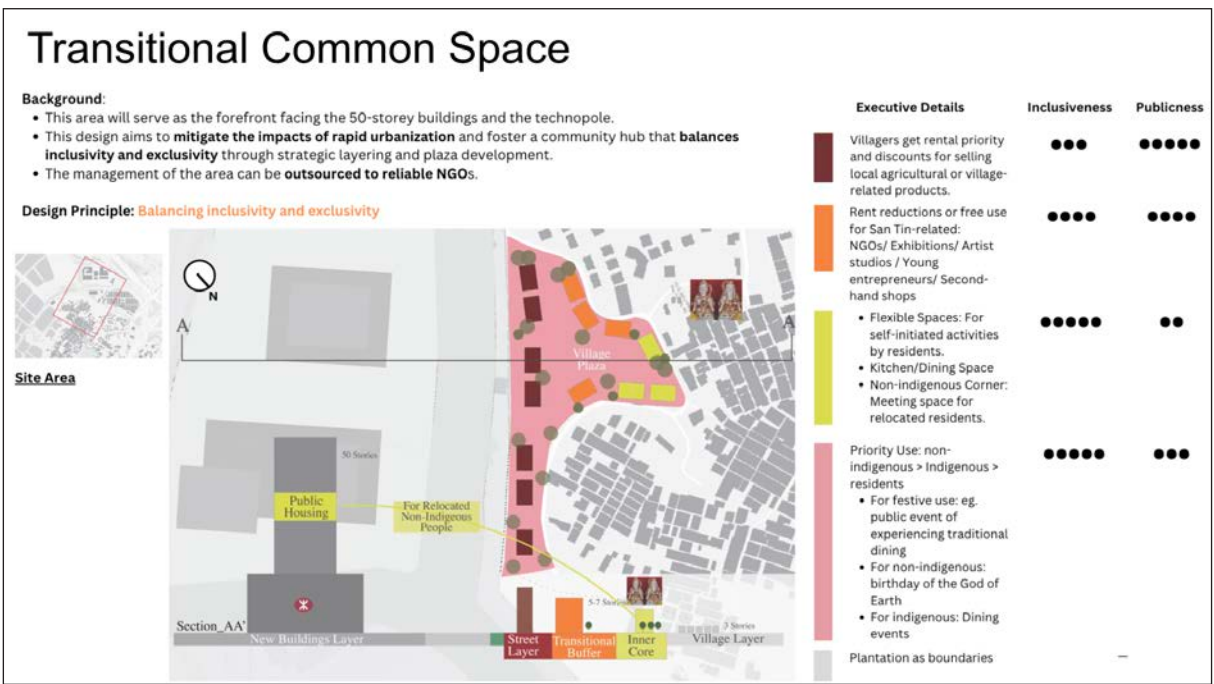
我們在處理這個基地議題時，也必須承認中港之間的資本流動及兩者的空間，是緊密的交纏與難以劃分的狀態。新田科技城出現的背景，是基於中國政府提出的政策：「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當中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並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立法會，202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3）。我們另外可以新田科技城作為空間修補的手段去整個新市鎮的發展。配合香港的「高才通」計畫³，新田科技城提供了緩和中國失業率⁴的可能，同時為香港同樣低迷的經濟狀況，如持續上升的店鋪空置率（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2024）及連續五年下滑的私人住宅價格（差餉物業估價署，2024），暫時開通一條治標不治本的出路。

然而，自 2021 年正式公布科技城規劃之後，民間曾就程序、及環境影響出現各種爭議，包括生態破壞、環評報告公信力受質疑（香港觀鳥會，2024a），也涉及對當地九個非原居民村落及其文化的摧毀，位置如圖 7（本

土研究社，2024b），而當地的漁業也將因此面臨收地而步入最後倒數（鄭淑華，2024）。城鄉所同學雖然早有注意到相關的關係張力，然而在工作營中，可惜我們能夠實際處理這些討論的空間不足，大部份小組也未能推動其他組內成員對此的關注，主要仍聚焦在規劃設計的炫技。不過仍有小組嘗試在縫隙中突破，例如建議在未來連接港鐵站的廣場，設置由面向公眾到較對村內這樣層層遞進的空間配置設計，同時為需搬離家園的非原居民祖祠預留一空間作為聚集地，以此放入對原居民及非原居民的關懷。



▲圖 7 經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與將消失的非原居村 | 圖片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黑色標示為本研究繪製



▲圖 8 第五組 Village & Technology 的規劃建議 | 圖片來源：2025 年 IFoU Winter School 第五組成員繪製

工作營制度及空間概述

這一次工作營，以上文分享的新田科技城為基地，討論規劃一個 workbitat 的可能性，workbitat 即為 work 與 habitat 的結合，迥異於香港許多人從家中長途通勤至工作地點，這個複合字想要展望的是一個工作結合生活居住的區域規劃。工作營主要的活動地點都位於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大樓（又稱李兆基大樓）以及崇基學院大樓，與臺大開放的校園不同，中文大學在校門口設置了閘門，所以外校學生需要換證件進入。中文大學整體校園氛圍讓我想到台灣的政治大學，兩校都依勢著山坡而建，並透過校園公車的穿梭帶著同學上下山趕課，我們此次活動地點都位於山下，因此可惜無法也搭乘校車體會一下中文大學學生們的日常。

從表一可以看到真正工作並討論的時間僅有三天，在三天的時間，各組需要在各自的子題下凝聚一個階段式的成果。因

為一組約 13-15 個學員的緣故，其實難以討論跟凝聚共識，因此每組大多是由指導老師進行分組，在這之下拆分成約 3-4 組進行各主題的討論。城鄉所的同學們會後彼此分享各組的分工模式，才發現其實各組的合作狀況落差很大。有些組別的老師十分具有主導性，所以整個大組的提案就會按照著他的方向來走，工作坊形式就像是老師指派任務，而同學們接著彙整出成果簡報報告，難以有自主性與各自的創見；另一部分也受限於時間，許多構想的討論難以真正的深入研究，所以成果只能偏向大致方向，較難落實或是看到細部規劃。工作營的授課、報告都是使用英文，但因為此次工作營的學員組成大多來自於香港、中國、台灣等地的學生，非中文主要使用區的僅有新加坡大學與韓國全南大學（但許多 NUS 同學都會說中文），因此容易形成「中文的小圈圈」。這與我們所聽聞的歷屆的工作營經驗有落差，因為

³ 按香港入境署說明，其中兩類簽證僅需符合合資格大學頒授的學士學位。（<https://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TTPS.html>）

⁴ 數據取自中國國家統計局城鎮調查失業率數據庫。（<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z=A0E01&sj=202504>）

過去都是英語系的同學在小組工作上因語言佔有主導地位。但香港工作營的情況下反而是非中文使用的同學在溝通上偶有困難，一些老師們也有認知到這點，所以在討論過程時常需要提醒同學用英語溝通。此外，新田科技城的議題其實早就是中大建築某些老師的工作室在處理的規劃議題，所以這些已經調查新田一個學期的學生也常常在組內佔有主導地位，甚至是階段成果報告都可以直接搬上他們早就設計好的模型，小組內也是按照他們既有的研究成果直接向下延伸。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建築學院大樓的空間安排。在他們的系館內，並沒有一間一間的教室，而是大廳挑高的迴廊。在工作營開幕式，一些隔板被撤開，擺上椅子與螢幕，整個大廳就變成了一個會議廳；一般上課時間，同學們就各自拉椅子、坐在階梯、調整活動式大桌，老師就在大廳講起課來。這讓我想到公館樓一樓，大家途經課堂都可以透過各自的形式參與，整個空間動線上彼此不衝突，卻又保有某程度交會的可能性，建築學大樓採光與挑高的開闊，並留有許多展示模型與設計的展覽空間，讓整個討論環境十分舒適。

▼表 1 2025 iFoU 香港工作營時程安排

日期	工作營安排	活動地點
1/12	開幕式、講座論壇、香港城市探索	建築學大樓、港島各處
1/13	基地訪查	落馬洲瞭望台、新田、天水圍濕地公園
1/14、1/15、1/16	工作坊	崇基學院大樓
1/17	階段成果報告、結業式	崇基學院大樓
1/18	城市論壇	中環街市

資料來源：2025 iFoU 香港工作營



▲圖 9 中大建築學院大樓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科技想像下的規劃侷限與反思

在新田科技城的基地之下，工作營又分成了五個主題來討論不同面向的規劃分別為：Cross-Boundary, Ecology & Technology, Mobility & Living, Living & Technology, Village & Technology。雖然五個主題彼此都有共同處，但工作營規劃上仍偏向各小組獨立討論專案，所以在成果報告上也難以彙整出整個工作營對於規畫案的一致立場與核心方向，但仍然可以透過各組的階段性成果來看到規劃上的趨勢。在五組的成果上，銜接上新田科技城這個未來場域，其實各組都有試圖以科技的方式來打造生活空間。例如貫穿許多組規劃的無人機，能夠傳遞貨物、外送，甚至是人的輸送。同時，許多組別也試著以超高層垂直建築試想一個結合各種生活機能的大型建築。在交通上，回應主辦方 workbitat 的框架，中低運量軌道運輸系統、個人行動載具也被納入了考量。這些天馬行空的構想若需要實踐於香港，仍須考量到法規面、生態面、技術面等問題，而這也是工作營三天的密集討論無法解決的。許多人會說未來就會透過智能來解決了，但實際如何解決？是否有案例來支撐可行性？受限於時間與各自領域的不同，反而較少在工作營中被討論。

當規劃成為輸出：短期營隊中的知識生產困境

可以想見，工作營所產出的 master plans，與實際的空間案例上存在著一定落差。三天的尺度也較難含

括新田複雜的土地狀況、生態脈絡、規劃背後的意圖與主張，大家僅能透過被指派的題目，以科技的大概念去試想一個未來的科技城生活型態，所以最終的成果也較難涵蓋新田既有村落的生活紋理、濕地生物與地景多樣性等議題。在這之下，也顯見了行前讀書會的重要性：若是以一張白紙進入基地，我們或許也會被工作營的官方主題帶著走，難以在其中反思，並看到持續因為北部都會區規劃而捲動的香港社會脈絡。以城鄉所的訓練角度來看，進行規劃的前期作業，需要的是較長期的田野調查或是參與式規劃，以盡可能全貌的角度理解場域以及多元的聲音；同時，我們也能藉此觀察到人們生活日常的細節，進而激盪規劃者如何在規劃過程中保持對微觀生活的敞開。工作營走馬看花式的基地調查、短期密集的討論形式，較難以達到上述的規劃目標跟企圖，也因此，許多同學也難以理解新田原居民的生活、濕地與魚塘的生態，以及前述兩者交織出的地方紋理。所以也不難想像，不論是在港府官方規畫，或是工作營的成果，村落與生態地景都是在規劃案中被排除或是做為附加的價值，在科技這個風行草偃的趨勢下，微觀的日常與現實在 master plans 下被犧牲。

除了科技主導的規劃現況，當我們在工作營後進行對於土地狀況、村落生活與生態地景等議題更深入的反思時，我們可以提問的是：在新田科技城的案例中，資本危機有暫時解除了嗎？還是會造成其他不可挽回的危

機？哈維（Harvey, 1989: 240）曾言：「我用『壓縮』這個字眼，因為這可以強調資本主義歷史的特徵是生活步調的加速，並且如此迅速地摧毀障礙，以致有時候世界像是朝著我們崩塌下來」。這段話精確點出了在空間修補的過程中，既有的地景、文化與社會關係往往會被快速消失或重組，而新田漁業、非原居民村落的衰亡便是一個鮮明例證。然而，這種破壞在為了資本的存活的目標下，卻似乎總是「必須」的。

在香港與中國政府的威權統治下，新田科技城的規劃幾乎沒有遭遇有效的社會反抗，但這種缺乏制衡的發展模式本身即可能構成另一種危機形式。沒有批判聲音與公民參與的結果，往往是政策脫離實際。兩地政府規劃假設中，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企業與人才會被科技城吸引，卻忽略了香港薪資水平、法制環境持續惡化，以及資料安全等結構性考量，這些都可能讓外資和國際人才卻步。科技城最終可能淪為僅由中國或香港本地企業主導的單一生態系統，與其原先宣稱的「國際創科新城」定位相去甚遠。

新田科技城的案例突顯了香港本地發展需求與大灣區／國家戰略之間的潛在張力：地方特性不斷被國家和資本邏輯重寫，原有的社會空間關係被解構並重組。此一過程中，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特質，包括「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獨立的司法權」⁵，有可能都被消融至大

灣區的國家論述中，成為一個被整合的新經濟區域。然而，這樣的整合是否真能帶來香港的持續發展，還是會導致更深層次的城市認同危機與社會分化？這就留待工作營的同學及讀者一同思考。

最後，也在此特別感謝：籌辦聯繫的康旻杰老師、提供我們行前指教的黃舒楣老師、在香港帶領我們的郭怡君老師、香港本土研究社的陳劍青與黃肇鴻專員，以及同行彼此照應、互相陪伴的城鄉所同學們：黃煒彤、黃宏裕、郭妍伶、李浩廷、許璿婕、王正祥、李亨瑩、王秉程、吳瑀崙、何智麗、宋燁博。

參考文獻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本土研究社（2024a）〈活農活現：北部都會區農地調查報告及農業優先區建議〉。本土研究社官網。（<https://liber-research.com/farmlandsureyreport2024/>），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本土研究社（2024b）〈【北都村崩】新田非原居民鄉村的被消失名冊〉，本土研究社官網。（<https://liber-research.com/【北都村崩】新田非原居民鄉村的被消失名冊/>），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美聯工商舖資料研究部（2024）〈香港主要購物區街舖空置及商戶分布調查報告〉，美聯工商舖。（<https://bit.ly/4jE4SqC>），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香港立法會（2023）〈立法會 CB(1)506/2023(03) 號文件〉。（<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230523cb1-506-3-c.pdf>），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香港立法會（2024）〈PWSC(2024-25)16 號文件〉。（<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fc/pwsc/papers/P24-16-c.pdf>），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3）〈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 2023〉。（https://www.nm.gov.hk/downloads/NM_Chi_Booklet_Web.pdf），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4）〈香港主要購物區街舖空置及商戶分布調查報告香港物業報告 2024〉。（https://www.rvd.gov.hk/doc/tc/hkpr24/HKPR2024_Fullbook_TC.pdf），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張展鴻（2009）《漁翁移山：香港本土漁業民俗誌》。香港：上書局出版社。

鄭淑華（2024）〈新田收地倒數：他們用一生養魚，看香港塘魚業高低〉，《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1205-hongkong-santin-fish-farmers>），取用日期：2025年4月21日。

⁵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條及第五條。

專題報導

移地實習記行： 日本能登災後復興現況

◎撰稿：紀懷超

本次交流緣起

2025 年 4 月 3 日到 4 月 9 日，我們一行人在舒楣老師的帶領下，前往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考察。本次的移地實習，全程由東北大學的北村美和子老師協助接待，並請菅沼毅學長協助翻譯。能登除了在 2024 年 1 月發生大家所知的強震外，同年 9 月更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豪雨，多重災害使救災行動更為嚴峻。而相較於 2011 年的東北大震災，大眾對能登的關注卻顯然不足，地方能獲得的復興資源，也有一段落差。本次拜訪的期間，有不少倒塌的建物都還在等待解體，對於目睹震災真實情況的我們，無疑是一大衝擊。

交流與接待

我們的住宿地位於能登半島地理中心的一處農村聚落。接待我們的多田喜一郎先生，在距今約 30 年前成立社區組織「春蘭の里」，代管聚落內的傳統古民家來經營民宿，並媒合周邊的農村體驗活動，積極推廣能登的里山文化，也為社區帶來收入。

期間我們有數次都在社區的交流中心共餐。這個交流中心是由廢棄的小學所改建，名為「こぶし」（花語象徵「友情」、

「歡迎」），同為多田先生和他的女兒真由美小姐所管理。震災後，他們把內部的空房間安排給房屋受損的獨居長者、志工、協助重建的工人居住，讓我們有幸能碰到這些人們，在準備食物、聚餐聊天中見到災區真實的樣貌。



▲こぶし倉庫中供修學旅行團體驗用的祭典工具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在こぶし中的共餐交流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地震後遭到燒毀的輪島朝市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能登大部分的道路景觀：狹窄蜿蜒、部分仍受損中 | 圖片來源：許芷榕

看見各地的脈絡與困境

雖然有先經過五次的行前課程，來認識能登的現況。但我們實際走訪時，才真切認識到內部的每個市町村都有其獨特性，各自都面臨不同的困境。光是「公費解體」的執行，在能登町我們就聽到許多抱怨太過緩慢的聲音，然而在珠洲市、輪島市，因為聚落較為集中也擁有相對多的行政量能，就較少聽到。

其中更加迥異的是七尾的狀況。七尾市同時擁有著名的觀光地「和倉溫泉」（國際上小有名氣的「加賀屋」便位於此）和地處更加偏遠的「能登島」。能登島觀光協會就提到，他們一直以來對公部門不信任、長期質疑資源分配不均，在災後聯外道路、通訊都中斷時，就深知要自立自強。地震發生當天，就

由居民自主開設避難所，後續更由在地建設公司投入道路復舊，社區能動性格外強烈。一位先生更問起花蓮震災的狀況，真情喊話「臺灣跟我們一樣都有很多災害，你們千萬不要相信政府！」，不自覺是一記震撼。

災後，各處都能看到因應房屋受損，而設立的中繼設施。其實不僅限於中繼住宅（仮設住宅），而包括商店街、集會中心，以漆器聞名的輪島，更有為職人設立的創作工坊，但地震破壞的不僅是建物，也是重創了社會連結，不少人選擇搬走，而留下的也是十分蕭條的光景。與國際知名品牌有許多合作、鎖定高端消費品的漆器業主桐本先生，非常有自信地向我們介紹漆器的設計創新，但在提起政府的災後補助計劃時，還是認為充滿著未知數，而感到焦慮。



▲輪島中繼用的漆器職人工房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受右側大面積崩塌影響，灌溉設施仍在修復中的白米千枚田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復興之路遙遠，鄉村何去何從？

這次課程主題是災後規劃，但其實整趟行程中，大家一直延伸思考的是鄉村「為何存續？」、「如何存續？」的問題。日本的鄉村比起臺灣，有著更嚴峻的高齡化、人口外流危機，震災似乎不是空前的危機，而是加速衰退的一大推力。農業產值達不到自給的狀況下，很難花費大把經費來修繕損害的基礎設施，也意味著象徵永續經濟循環的里山地景，已經面臨很嚴峻的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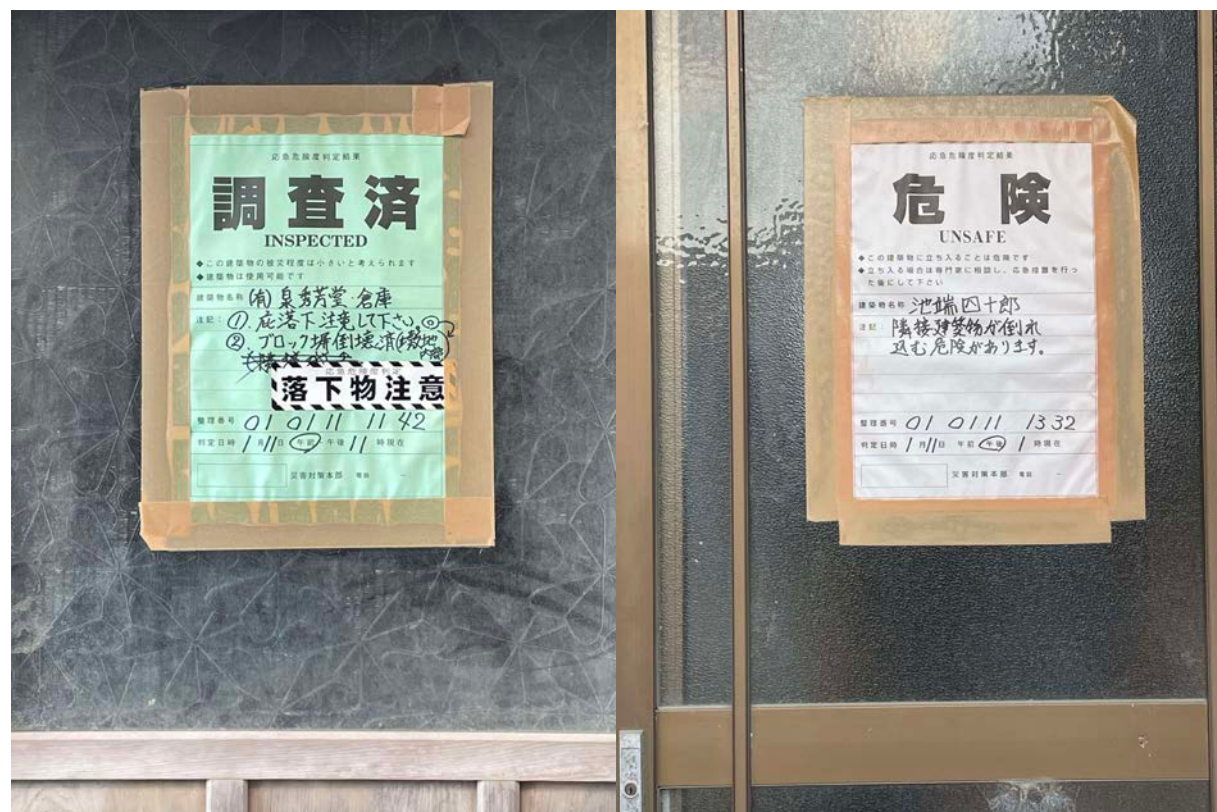
另外，最顯而易見的是空屋問題，這也是困擾著日本各地自治體的難題。震災後，處處可見宣導屋主盡快申請「公費解體」的文宣，雖然許多房屋在震前就沒有人住，但問題在於，解體也意味著聚落逐漸消滅，其中不乏僅部分

受損、尚可使用的房屋，也直接被消去了投入修復再利用的可能。顯示了積極保存文化地景的動機或許會寫在計畫上，執行面卻很難做到。

臺灣很常崇尚日本的規劃體制，但此趟我們看到的卻是許多人在災後對未來深感不確定的焦慮，在面對萎縮的資源分配工作中，看見了規劃的侷限。但另一方面，卻看到了鄉村中各個角色的能動性，包括春蘭里的多田先生、黑島襲產保存的工作者、協助觀光振興的能登DMC，他們強調的都不只是重建，而是社會韌性的復甦。這一趟在能登的所見，反倒是理解自身的處境追求自立，接著思考萎縮下的地方能以怎樣的形式存在，而非追求「什麼規劃方案比較好」的難題。



▲黑島襲產保存指定地區內的標語，意指「解體是最後手段」，也有「解體應在人生最後階段之後」的意涵，有反對快速解體的意涵。 | 圖片來源：黃仲崎



▲震災後房屋の危険判定標示單，識別須拆除的房屋 | 圖片來源：許芷榕

特別珍貴的回憶

原定最後一天我們要在こぶし做簡報與居民交流，但在多田先生的突發奇想下，決定請我們在交流中心開一天的「台灣餐廳」。真由美小姐甚至特別設計了傳單，發給了三個聚落、超過八十人，匆忙之下我們開出了蚵仔煎、牛肉麵等各種菜單，意外開啟了我們的「烹飪實習課」。雖然處於一陣慌亂，但長輩們對食物非常捧場，語言不通之下，還是願意一起愉快地交流，相信對大家都是非常難忘的經驗。

我們更曾到一位 90 歲的中野奶奶家中。奶奶在言談中，不自覺透露出長年獨居的孤獨感，但當他看到女兒的結婚式照片時，便志得意滿地與我們分享，似乎年輕時未能留下青春的影像成為了惋惜。為此，同行的芷榕、煒彤利用 AI

工具，模擬中野奶奶年輕時的樣子，還印下來並附上了大家的簽名。中野奶奶直到最後一天我們要離開時，還堅持到機場送行，讓我們在短暫相遇的時間內，留下十分珍貴的回憶。

還不熟練日文的我，在這段期間如何妥善與人互動是一大挑戰，感謝舒楣老師、北村老師、同行夥伴的照顧，以及在能登遇到的每個人，也期許自己能將這些故事分享給更多人。春蘭里的技能實習、移住體驗未來也會持續開放，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也希望大家積極善用所上國際交流的機會，能跳脫自己身處的環境去思考某些事，相信都會是知識上重要的養分。

春蘭の里相關資訊頁面：
<https://shunrannosato.info/>



▲在廚房準備台灣料理的我們；真由美小姐為我們設計的傳單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最後一天大家的合照，我們也用 AI 模擬了多田先生 99 歲的樣子貼在門上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專題報導

以巴議題、砍預算、本土化—— 轉動中的荷蘭：我在荷蘭萊頓的觀察手記

◎撰稿：陳世浩

我從2024年8月隨着城鄉所與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的批判歐亞文化遺產的雙學位學程來到荷蘭。直至截稿前的5月，這一年學習也快踏入尾聲。在荷蘭這大半年，比較歐洲與香港台

灣的熱議，不時有着活在平行時空的感覺。適逢遊學這段時間，世界發生的一些大事也默默影響着荷蘭的日常。比起是單純的學術分享，這篇所分享的是圍繞在我們萊頓留學生所發生的日常。



圖片來源：<https://www.universiteitleiden.nl/en/news/2025/03/10-march-liveblog-leiden-university-strike>

「挺巴學運」與校園日常

從學校走回宿舍路上，不時能見到單位窗外排着巴勒斯坦旗幟、寫着“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從河流到海洋」——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在出發荷蘭之前，不時能從媒體裡看見美國大學裡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運動，佔領校園抗議，最後因警方或校方介入而演變成肢體衝突。同樣地，以巴議題仍然不少萊頓學生所關心的議題。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要求校方停止在研究與交流上與以色列的大學合作。他們在校內張貼和派發單張。最深刻的一次，我跟友人在學校教學樓的用餐區坐着。我們突然聽到有人高喊“Free Palestine”，從高樓層往下撒傳單，隨後滿地都是寫有一些要求校方停止與以色列合作的訴求。校方對這些行為未有嚴令禁止，但最近一次（5月6日），有大批學生佔領萊頓大學海牙校區示威。校方警告要求學生離開無果後，便報警要求警方清場拘捕涉事學生。最終有近75名學生被捕。這也不是荷蘭第一宗校方報警拘捕「挺巴學運」的學生，阿姆斯特丹大學去年便因佔領事件而拘捕過百名學生。

這種以巴對抗的緊張情緒和有關的討論，或許不常見於我們亞洲的校園，但成為了荷蘭的日常。去年11月，以色列足球隊特拉維夫馬卡比到阿姆斯特丹作客，球迷間因以巴議題而發生衝突。事件最終造成20至30多人受傷。我還記得上學期修了一門討論課 Democratizing Histories。雖然這門課並沒有直接討論以巴議題，但像討論 Settler-colonialism 等時候，老師也將有關的時事帶入課堂讓同學一同討論。此時此刻，雖然我身處在歐洲大學的課室內，也能感受到阿拉伯半島上以巴衝突所帶來的「震動」。

師生走上街頭抗議砍教育預算

同樣牽動師生的不只是國際形勢，也是荷蘭政府的政策轉動——教育預算削減。一邊廂，在台灣朝野對抗發生預算削減爭議；另一邊廂，不同於台灣總統制，荷蘭議會屬於內閣制，而議會有近14個政黨，就算目前議席最多的大黨，也難使議會變成一言堂，換言之，籌組政府需要多黨合作。惟近年以右翼政黨得票議席不斷增加，改變了政府內閣的組成。新任內閣一

改以往的民生預算，當中大幅削減教育和國際援助的預算。如此大刀闊斧使得不少大學面臨經費不足，需要裁減人手、甚至「殺科」。我便在今年1月便曾收到校方電郵，表示下學年部分學生人數較少的人文學科需要取消和併至其他學科，例如：義大利語言及文化課程取消、削減收生不足的非洲研究的研究型碩士課程等。一直在研究和保存荷蘭少數民族語言 Frisian 的格羅寧根大學更在下學期停辦有關的學士課程。這一方面體現與台灣少子化造成的收生困難相似，另一方面也體現一些小眾專長的人文學科，在資源削減下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老師也沒能倖免，不少老師也表示明年有可能教席不保。

從去年10月開始，學校校方與師生多次發起反砍預算的示威。有趣的是，這些示威行動的召集公告是校方經電郵發到學生郵箱的「重要訊息」。有一些老師甚至在示威日期，選擇停課讓學生能參與示威。在校內不時能見到有關號召反對教育預算削減的海報。在示威當日，師生也發揮創意，手上拿着寫上訴求的紙板。儘管如此反彈，各間荷蘭大學教育經費大減已是板上釘釘。

英語教學？荷語教學？哪個才是學生所要？

與此相依的議題，是荷蘭政府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本土化——要求課程教學語言達一半為荷蘭語、削減國際生課程。他們認為有限的教育資源應該集中在本地學生身上。與之相映成

趣，臺大等多間臺灣的大學正推動EMI（全英語授課）以追求國際化。一直以大學教育國際化、英語普及率高的荷蘭反其道行，選擇削減英語教學課程，加開荷蘭語教學的課程。當然兩者教育發展脈絡截然不同，不能直接比較。荷蘭一直以來是歐洲其中一個招收大量留學生的國家，此舉無疑是大幅收窄留學生的空間。剛畢業於萊頓大學心理系的友人曾跟我分享，在她仍然就讀時，大學並沒有完全停運心理學的國際生課程，但供國際生選修的英語教學課程逐年減少。語言選擇本身就是一門政治，難以說誰對誰錯，但此確是讓極力追求教育全球化的東亞教育機構反思的一題。

雖然這一些並不是我的「主修」，但卻是我學習理解荷蘭身處變動政治的寫照。身處在荷蘭、台灣的大學校園，如今像處在颱風風眼般，但總能感受政治對校園的影響。最近罷免爭議也使得臺灣多間大學內曾有過「政治不得進入校園」的討論。我相信在上述荷蘭數個例子也說明大學是社會的一部分，談及政治似乎是無可避免，但我們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討論的界線。荷蘭個案雖然不能提供我們一些答案，但是我們重新討論和反思的契機。



專題報導

A capacity for agency is a capacity of desiring.

◎撰稿：徐李安

在 2024 年的 9 月到 2025 年的 7 月之間，我透過城鄉所的雙聯學位計畫，到荷蘭萊頓大學學習。抵達機場的那天，海關人員問我：「Why do you want to study Asian studies here, is it for your country?」我愣了一下，反射性地回答：「No, it's for everyone.」

是的，為什麼在歐洲做亞洲研究？也許直到搭上飛機的那一刻，我都還說不太清楚。但也許，對小島的回望就已經成為某種解答。在這裡，身體所感受到的一切——那些相似的、陌生的、讓人停下來注意的——其實都在訴說著關於自我認同，以及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的線索。而這些線索，往往是在我們與「家」之間拉開一點空間後，才會變得清晰起來。

除了城鄉所的學位論文之外，參與這個計畫還需要再完成一篇與批判文化襲產（critical heritage）相關的論文。因此，這個研究位置，其實是在萊頓大學人文學院的亞洲研究架構底下，進行批判文化襲產研究。而亞洲研究，又必須被放在區域研究的脈絡中來思考。

剛開始確實會有些困惑，但在第一學期修完 Introduction to Asian Studies（亞洲研究導論）後，便會對亞洲研究那種無所不包的可能性感到不可思議。這個領域可以涵蓋語言學、文學、地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面向，當然也包括我們所進行的文化襲產研究。舉例來說，我的一門選修課 Urbanism and Digitality across Asia 的老師 Carwyn，自我認同是一位地理學者；而我的指導老師 Maghiel 則專注於中國當代詩歌研究；必修課 The Politics of Destruction: Targeting World Heritage 的老師 Elena 則是建築背景。也因此，當我們帶著城鄉所的背景來到這裡時，我們習慣關注的物質空間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文本，被納入更大的政治與歷史脈絡中，並且可以與不同類型的文本間相互參照。

除了跨學科研究，亞洲研究的研究對象也跨越地理的邊界。在上課的時候，我們常會因為老師的研究方向，而讀到不同地方的文本（包含了東亞、南亞、東南亞、中亞等等），也進而發現一些自己在地理認知上有許多

「糊糊黑黑」的地方。例如，在課程 Introduction to Asian Studies 的第一個文化衝擊，是來自斯里蘭卡的老師 Nira 介紹萬隆會議對於亞洲國家的重要性。當時的我們才突然體會到，原來站在不同的視點，會有非常不一樣的視域。然而，這些被我們忽略的地方，可能有著與台灣可以相互參照的經驗。

此外，這裡也會感受到許多文化差異。例如，即使我們都在這裡學習解殖民（decolonization），但歐洲與被殖民國的認知仍然有著很大的不同。有一次，城鄉所同學苡寧在課堂上分享了台灣的襲產經驗，並且解釋了台灣的親殖民（pro-colonial）現象，然而，許多歐洲人一臉疑惑地想著：為什麼會喜歡殖民者。許多我們習慣的文化，其實有別於歐洲的經驗，而這些差異是我們運用歐洲語境作為參照時，容易不小心忽略的。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 Nira 的 Culture of Resistance 課堂上。我們閱讀了有關喀什米爾的記憶與抵抗的文本，描述喀什米爾人如何透過記憶，來抵抗印度政府的壓迫。當課堂討論到「有什麼是自己從未經驗過的記憶，但仍然透過社會或是家族留在我們身體裡」時，一位荷蘭同學分享了他的二戰記憶，是從他的父親傳給他，而他再傳給他的女兒。而這讓我想到，我其實很少有這樣的經驗，對於二戰時期的台灣，其實有一大塊空白的、缺失的部分，這讓我開始思考，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些遺忘。

最後，我想回到 Nira 的 Culture of Resistance 課堂。有次在談能動性



▲走路十分鐘就看得到的城市

（agency），這個概念其實很常在城鄉所裡出現，但當 Leiden 同學分享文本“Power and Projects: Reflections on Agency”時，我因為中英文轉換的差異，突然意識到：其實能動性需要的，也許正是「空間」。

A capacity for agency is a capacity of desiring.

Capacity 是一種能力，也是容量。我們其實需要空間，來容納與孕育那些能夠抵抗理所當然事物的能動性。這樣的空間不只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不只是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可以是宏大的，也可以是日常微小的；甚至還包含了一些時間上的空間。而這些空間，是我在這個雙聯學位計畫中所感受到的。

專題報導

早稻田大學雙聯學位生存指南

◎撰稿：詹于慶

大家好，我是 R12 的詹于慶，去年 11 月申請了早稻田大學的雙聯學位，今年 4 月來到日本進行一年的留學（殘酷試煉）。由於所網上已經有沛齊學長非常詳盡的申請紀錄，因此就用自問自答的方式分享個人主觀的求生經驗，希望可以提高未來的挑戰者在申請及求學時的存活機率。

Q1. 雙聯學位在幹嘛？

簡單來說，本所學生可以在早大創造理工學研究科的「**建築学**專攻（建築所）」或「**建設工学**專攻（土木所）」留學一年，之後回到臺大再讀一年，完成兩邊的論文及學分後，就能得到兩個碩士學位。申請的要件僅有兩個，其一是日檢 N2 的語言門檻，其二是找到早大的**指導教授／研究室**。我在臺大是由良治老師指導，在早大也是尋找都市計畫相關的教授。建築學及建設工学皆設有都市計畫部門，各有三位教授（如圖 1）。過往的學長姐大多是進入建築學の後藤春彦研究室，而我則基於論文主題選擇建設工学的森本章倫研究室，進行交通計畫相關研究（未經證實但據說我是建設工学第一個雙聯學位學生）。

建築学



後藤 春彦 教授
景觀・地域デザイン



有賀 隆 教授
都市空間・環境デザイン



矢口 哲也 教授
市街地再生デザイン

建設工学



森本 章倫 教授
交通計画



佐々木 邦明 教授
都市計画



佐々木 葉 教授
景觀・デザイン

▲早稻田大學與都市計畫相關的教授 | 圖片來源：<https://www.arch.waseda.ac.jp/wa/professors#sec01>、<https://www.civil.sci.waseda.ac.jp/professors>



▲早稻田大學一景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Q2. 有哪些主線任務跟支線任務？

主線任務就是修完 30 學分的課跟寫完日文碩士論文。修課部分，在臺大修過的一些課可以抵免早大學分，所以實際要在早大修課約為 20 學分。真正會出人命的是論文部分，日本的研究室是以ゼミ（Seminar）的形式運作。以我的研究室為例，主要有兩週一次向老師報告進度的論文ゼミ，此外還有學長姐主導のゼミ，教導統計方法和軟體操作，在寒暑假時則有合宿（大家會認真發表論文，不是動漫演的有枕頭大戰的合宿）。

學生在研究室會依研究主題分班，例如我的研究室有都市構造、土地利用、交通工學和交通計畫四個班，必須和班內的同儕前輩討論疑難雜症，許多研究主題和相關資料也是在班內傳承下來的。我的指導教授會特別希望參考研究室過去前輩的論文來發展研究主題，因此在最初選擇研究室時必須仔細看過研究室歷年的研究方向。

理論上，在早大的一年留學結束時，要提出論文計畫書，回來台大再繼續完成論文。同時，修課也必須在留學結束時達到早大 30 學分的畢業門檻，各研究室會有相應のコア科目（必修），相關規定及課程大綱可參考創造理工學研究科的要項及 Syllabus (<https://www.waseda.jp/fsci/students/syllabus/>)，抵免科目則要參考城鄉所網的雙聯學位合約。

Q3. 聽了好想去，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每年提出申請的時間會落在 11 月中上旬，在這之前必須確認早大研究室。我希望用最快速度完成雙聯學位，因此在碩二上就提出申請。儘早確定臺大的指導教授和論文主題會很有幫助，雖然沒有規定兩個論文主題要相關，但是從臺大論文發展出早大論文，會比較好向早大教授說明申請理由。我大概在 9 月確認兩篇論文的大方向，10 月準備志望理由書（研究方向）、履修計画（修課計畫）和 CV，10 月底聯絡到早大教授並確認指導。於此同時，相關的申請文件及所內提名也建議在 10 月慢慢處理，因為同時要提出線上申請和國際郵包，最好在 11 月開放申請前完成所有要件，避免最後郵包來不及寄到。

提出申請後，就是靜待次年 1 月底（真的很底）的結果通知。雖然日本開學是在 4 月，但是研究室的活動可能在 3 月就開始了，因此最好提前向早大教授確認赴日時間。其次，早大並不會確保宿舍，雖然之前雙聯的學長姐似乎都有抽中宿舍，但不知道為何我沒抽到。不論有沒有抽宿舍，也務必提前開始找租屋處，因為 2、3 月是全日本的租屋季，若像我一樣等到宿舍沒抽中才開始找房子就太晚了。早大會寄一封電子郵件提供合作的租屋業者資訊，這些業者是相對友善外國人的，一般的租屋處不太會租給外國人，因此請務必注意。最後，來日本之後請放下手邊所有事情，將看櫻花列為最優先事項（推薦早稻田附近的神田川，如右圖），在日本的一年可能只有第一個禮拜可以看到，務必把握。

Q4. 還有什麼生存秘訣嗎？

建議除了學業之外找到其他來日本的目標，這樣在學校遇到挫折時才不會覺得一切都完了。例如一定要去看的音樂節、藝術季、棒球賽，或是制霸 47 個都道府縣。剛開始最大的挫折就是什麼都聽不懂，不過在第三個禮拜開始會慢慢習慣聽不懂的狀態（還是聽不懂但是不會那麼可怕）。此外，日本的研究室有許多不成文規定，必須要主動提問或是讀空氣才會知道。不過研究室的人其實都很友善的，建議大家透過飲み会多多增進情誼。

最後，很感謝亮全老師創造了雙聯學位的交流機會，在我申請時也提供許多建議和聯絡上的協助。也感謝良治老師一路上花了很多時間，幫助我重複釐清臺大與早大的論文定位。還要感謝政霖學長和沛齊學長向我分享雙聯的經驗，讓我在申請時不至於手足無措。我覺得一年是一個剛剛好的時間，不但可以充分體驗日本生活，在學術上也可以深入了解不同國家的知識體系（而且不用繳超爆貴的早大學費），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神田川櫻花 |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專題報導

把一篇論文走完：一個暑假的研究旅途

——從田野感知到方法整合，走向理論與學術對話的三段式實踐

◎撰稿：張思曼

在研究生階段，參與學術活動不僅是課堂知識的延伸，更是開啟視野、實踐所學的重要途徑。隨著當代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日益強調跨領域合作與國際接軌，具備全球視野、現地經驗與方法能力的人才培育顯得格外關鍵。研究者不僅需要在地場域的觀察能力，更須掌握系統性的研究方法與理解前沿理論的能力。去年暑假，我連續參與了三場取向各異的學術活動，從中國到北美，再回到東亞，每一站的內容與形式雖不相同，卻恰好構成了一個從田野探索、方法建構到理論應用的學術實踐過程。

第一站，是江蘇如皋古城全區規劃研習營，採取的是「在地浸潤」的形式，參與者進入古城實地踏查，在有限時間內透過訪談、拍攝、繪製等多種方式深入街巷。各小組各自負責不同片區或議題，再透過日常討論、晚間聚會不斷交換彼此的觀察與想法，逐步建構對地方空間與文化脈絡的感知。密集的現場工作讓我們快速建立對地方的直覺認識，也學習如何藉由反覆對照在地訪談與既有資料，在壓縮的時間內提出有邏輯的空間規劃構想。



▲如皋古城核心街區：街巷雖保留傳統樣貌，但其功能轉型與生活密度已發生微妙變化。研究中可作為探討文化資產活化、空間使用與日常社會互動的視覺材料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研習營設計討論：團隊合作的張力與默契，同為田野過程的重要結構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第二站是位於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由其 School of Cities 主辦的 2024 都市混合研究方法跨領域工作坊。相較於如皋研習營強調地方性與空間構想的實作，這場工作坊更聚焦於方法訓練與跨學科對話，核心在於探索如何整合量化與質性資料，理解城市中的多重現象。活動前期，主辦方安排了一系列講座與實作課程，涵蓋訪談技巧、空間製圖等操作技術與應用範式。隨後，參與者依小組分配進行田野實踐，田野地點選在多倫多市中心的 Kensington Market——一個以多元文化共存與空間自主性著稱的歷史街區。這樣的場域條件提供了觀察都市混雜性與社區自主實踐的豐富條件，也成為混合方法操作的理想現場。我們組選擇聚焦於街區中視覺物件與空間使用方式。實地調查中，我們記錄了街頭塗鴉、商鋪招牌與日常擺設，並以聲景錄音與影像敘事的方式輔助觀察。其中，下圖這輛

位於街區中央的報廢車輛，車身斑斕，周圍的柏油地面用彩色粉筆寫上 Kensington Market 的字樣。這輛車既是地景的一部分，也象徵著城市空間如何在非制度性框架中被居民持續再詮釋與再定義。因此，這次工作坊不僅讓參與者實際思考混合研究方法如何在都市現場中具體運作，更重要的是，理解方法訓練從來不只是技術操作，更是一種認識城市、進入城市並與城市對話的方式。

此外，這次工作坊最具代表性的特徵之一，是其高度的國際化組成。來自北美、歐洲、亞洲、非洲與中東的博士生，學科背景涵蓋城市規劃、社會學等領域，構成一個多語言、多文化與跨專業高度交織的學習場域。在這樣的組合下，方法的討論不再停留於技術層面，而是隨著每日的交流自然延伸出對城市概念、資料詮釋與空間治理等問題的不同理解與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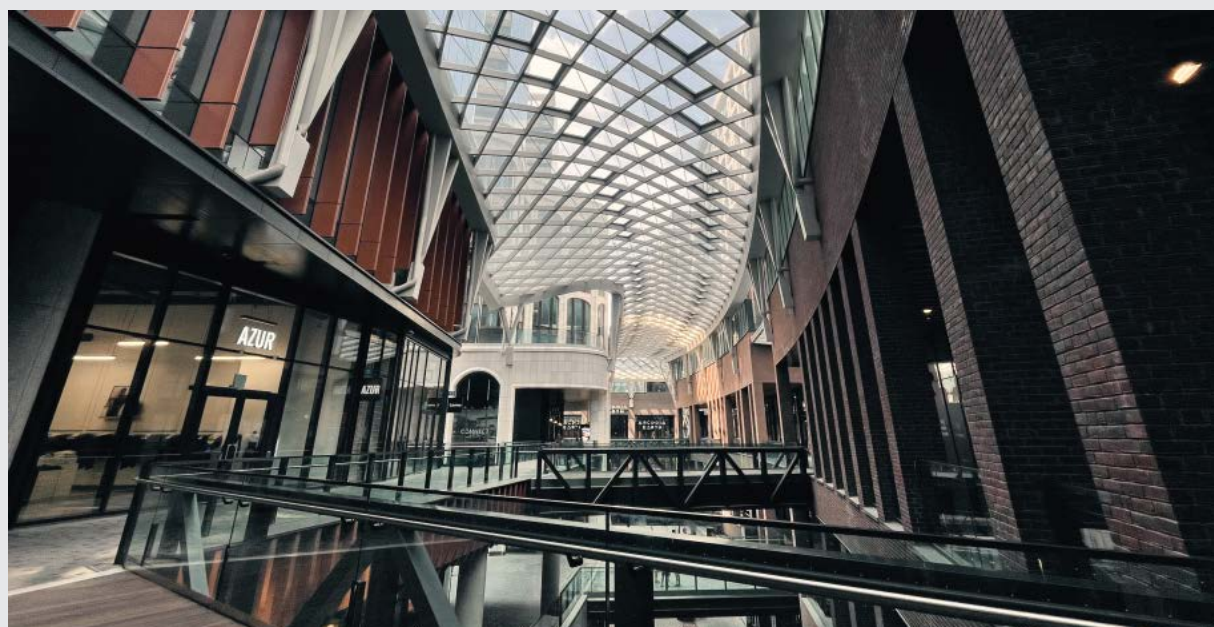
▲ Kensington Market 街頭的塗鴉植栽車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來自不同地方的博士生與導師 | 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感受異國的煙火氣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探索城市不同角落與特色建築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最後一站在日本高松參與的，是一場以模糊理論為核心議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重點聚焦於該理論在決策系統等領域的應用。整場會議依照常見的國際研討會形式進行：主辦方設定多個專題分場，安排來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與專家進行論文發表與成果展示。每天有若干場次的報告與討論，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感興趣的主題聆聽或發言。此種多場並行的會議結構，使各領域的研究成果能充分交流，讓人得以較全面地掌握模糊理論的前沿動向。相較於研習和工作坊在實地場域與研究方法上的著墨，研討會更偏向理論討論與技術模型的深度探討。若說前兩站提供了在地踏查與方法整合的學習契機，這裡則是一個檢視相關理論與應用是否能更精確回應城市需求的場合。

回顧這個暑假參與的三場學術活動，恍如經歷了一篇論文的完整過程。如皋是田野，是問題的起點。多倫多是方法，是分析的展開。高松是發表，是將思考推入更大的學術對話中。雖然沒有刻意預設順序，但這條從現地感知到理論實作的路徑，意外地描繪出一種研究的進程。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學會了什麼方法、參加了哪些場合，而是在這段移動的歷程中，開始意識到自己能如



▲研討會口頭發表現場 | 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何提問、如何參與，如何開始一段真正屬於自己的研究旅程。



▲研討會附帶的難忘回憶 | 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教職員動態

縉紳化的狂想：林楨家老師專訪

◎訪談整理：陳品嘉 | 圖片提供、審訂編修：林楨家老師

一、研究回顧

上次的通訊（第 29 期），主要是談我們（研究室）最近在作的兩個研究主題，一個是捷運引發縉紳化，一個是共享運具使用行為。

捷運引發縉紳化：多重形態之浮現

捷運引發縉紳化這個主題，現在還是文獻上大家熱烈討論的議題。從兩個層次來談，一個是縉紳化的大領域發展方向，我注意到有三個討論：一個是「去縉紳化」（de-gentrification），就是剛好反過來發生，簡單地說，本來這裡是中產階級居住的地方，後來變成弱勢群體進來，中產階級離開。這種情況跟傳統的都市廂陋或 declining（衰退）不太一樣，不一定伴隨居住環境變差，比較著重在不同群體的流動。

另外一個方向是在討論「超級縉紳化」（super gentrification）。我們原來在討論都是一次縉紳化過程，簡單來說就是從經濟弱勢被中產階級置換。但是，超級縉紳化就是又更往上縉紳，中產階級又被置換出去，經濟能力更強的群體進來。第三個方向是去探索更多樣的發生縉紳化的原因，例如最近很多研

究在討論綠色縉紳化，就是我們強調一些環保，或者是「淨零」這些對環境友善的一些政策措施，結果造成縉紳化，有更多造成縉紳化的 driving force（推動力）的討論。

那另外一個層次是 transit induced gentrification，就是運輸或大眾運輸引發縉紳化。這個層次的討論，現在其實也是有多重的討論。它有一個方向是，研究者發現在每個地方發生的狀況不太一樣，也就是不同的背景脈絡不一樣，這裡產生的 transit induced gentrification（TIG）的結果會不一樣。所以現在很多的案例研究，在世界各個城市都一直還在增加中。從最早以前芝加哥那邊的案例開始，後來到歐洲，然後來到亞洲，那現在很多案例都被挖掘出來在中南美洲這些地方。所以越來越多的案例被討論，這是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是多重原因的討論。因為我們以前討論 TIG 通常是只看「運輸」這個元素。但研究者發現，運輸這個元素跟……比如說跟都市更新或都市再開發放在一起的話，狀況會跟純粹只有運輸的狀況不一樣。這就是

multiple driving forces 的討論。所以，現在有一個方向是在討論，譬如說運輸加「B」結果會怎麼樣？加「A、B、C」結果會怎麼樣？這是第二種方向。第三個方向是在討論長期的演化過程。縉紳化本身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逐漸有些研究發現，短期看、中期看、跟長期看會不一樣，它本身的關係會演化，這就需要更長的資料來討論，至少都要三、四十年以上的資料去看，一開始捷運蓋了以後是怎麼樣，捷運慢慢發展以後，捷運引發縉紳化的變化又變怎麼樣，這中間是什麼樣的消長關係，這是長期演化的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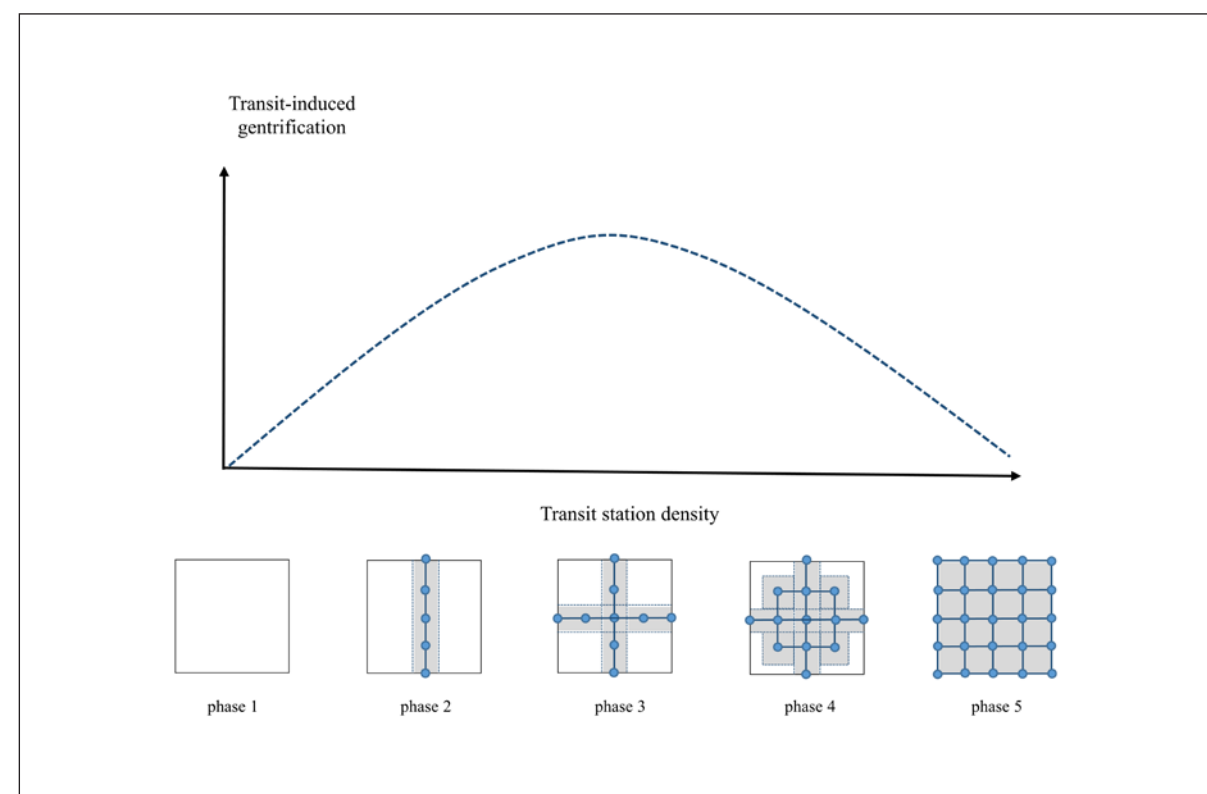
共享運具的理論與經驗談

共享運具現在還是很熱門的話題。一個常見的討論議題是，共享運具研究

討論大家的使用行為，什麼事情會影響借還與騎乘行為。另外一種討論的議題是最佳化，譬如說共享運具車輛的調度，要怎麼調度是最好的；或者是說共享運具的設站要怎麼佈置是最好的。所以，他們本來有兩個主要的討論議題，一個是行為，另一個是最佳化。

但是最近越來越多文獻，未來也預期可以看見越來越多在討論共享運具產生的公平性議題。包括公平、平等、正義這些議題。譬如說我們要設一個共享運具的系統，設置的過程是怎麼討論的？是誰決定怎麼設的？這樣討論之後，會不會是受益的人跟沒有受益的人他們的社會階層不一樣，這個是現在以及未來一個很熱門的議題。

氣候這種自然條件確實會影響大家



▲林楨家老師於 2022 年提出倒 U 曲線理論 (inverted-U curve theory)，用於解釋捷運引發縉紳化的長期演化過程，出版於 Lin, J. J., Yai, T. and Chen, C. H. (2022), Temporal changes of transit-induced gentrification: A 40-year experience in Tokyo, Japa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12 (1): 247-265.

要不要用共享運具。很明顯的，如果把台北市 Ubike 的使用紀錄，從一開始設置到現在每個月的使用量變化，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季節性的變化，溫度太高或太低，用量都會比較低。春、秋季都會是用量比較多，這是溫度。第二個就是每天每一筆出借紀錄，如果去統計，你會發現有下雨跟沒下雨的出借量也會差距很大。所以，有沒有下雨以及溫度都會是重要的原因。另外一個原因是地形，如果這個地方都是山坡地高來高去，用量也會比都是平地差。所以，自然地理的條件是會影響到使用。

沒有租借站點的共享運具，像 Obike 那種，因為可以隨處借還，過去經驗發現了停車管理的困擾。例如我有一次去北京參加研討會，拉著行李坐地鐵到飯店，從地鐵站一出來，出口完全走不出去，因為被「單車海」整個包圍住，把路口堵住。我只能再下去站內，從另外一個出口，然後繞一大圈才脫困。因此近幾年他們改用電子圍籬的方式設置站點，只能在指定的位置借還，如果沒有在那個位置，你就沒辦法操作。

兼具複雜與效率的 AI 系統

有兩個最大的改變：一個是我們在

研究行為的時候，譬如什麼因素會影響共享運具的使用行為，傳統的統計方法，大部分都只能看線性關係。如果要看非線性關係，傳統的統計方法也可以，但是通常需事先設定某一種樣態的非線性關係再去討論。但是 AI……譬如說現在流行的、大家普遍在使用的機器學習的多種方法，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差異是，他們可以找出非線性關係，而且不一定像傳統的統計要先設定一種關係，可以去探索原來沒有預想到的非線性關係。現在慢慢有一些文章發現非線性關係其實還蠻有趣的，比傳統只能看線性關係有趣許多，而且細節更深入。

另外一個是我們在作最佳化（optimization）的問題的時候。譬如說共享運具要做調度。我們學校經常會有卡車載著 Ubike 在調度，移來移去，那要怎麼去調度是最省力、最省錢，又可以最滿足大家借車不會找不到車，或者還車沒位子還，這是最佳化問題的一種。那機器學習的方法，可以提高求解最佳化問題答案的效率。傳統作法在碰到問題比較大的時候都要解很久，那 AI 可以協助，可以讓這個大的問題比較快的、有效率的解出答案，用口語說就是「它比較能夠很快的算出答案」。

二、深化研究：共享單車與機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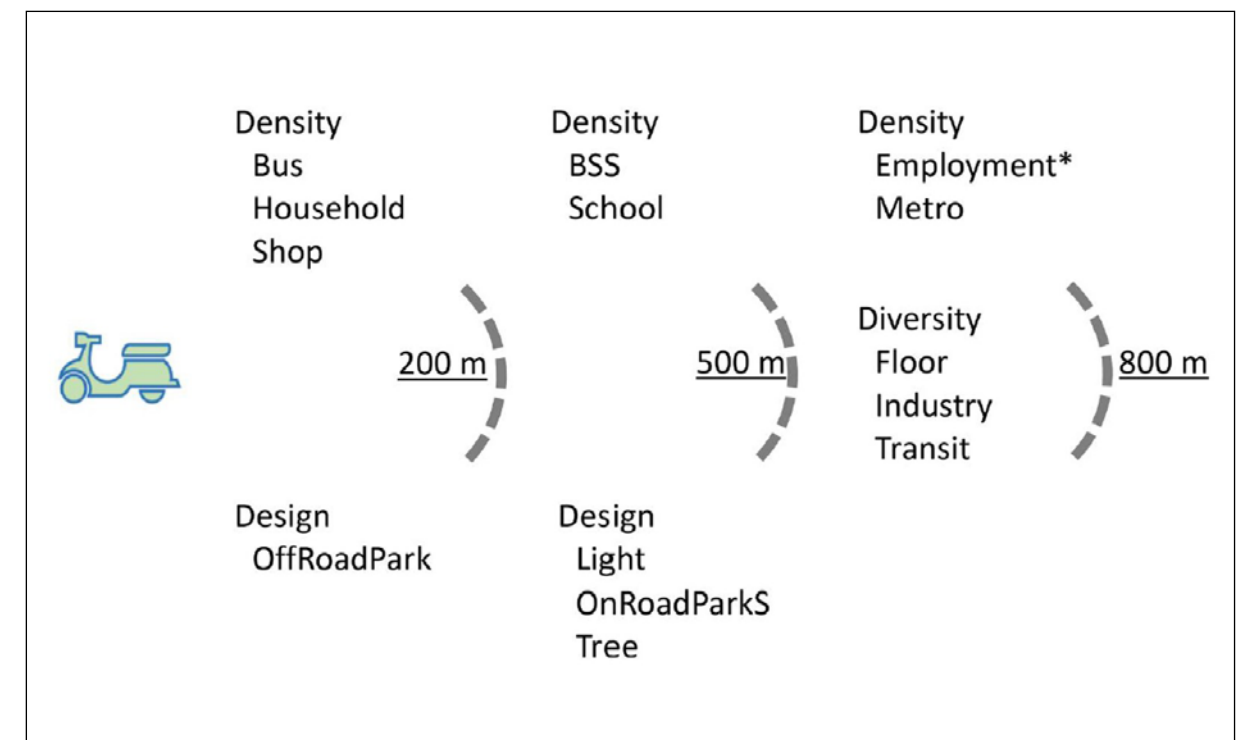
這兩個當然都跟生活經驗有關係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這幾年有執行過幾個計畫是在討論共享機車，我們那時候有在分析 GPS 的數據，共享機車的軌跡資料，全球定位的那種。我

們發現了一些行為上面的特徵，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提出現在這兩個計畫，都是在討論軌跡資料的分析，一個是共享單車的，一個是機車的。

共享單車這邊，我們用的資料是跟台北市政府申請 Ubike 的 GPS 紀錄。這筆

紀錄可以討論很多行為的議題。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會討論路段的流量、路徑的速率，以及共享單車的可及範圍，就是使用者可以騎到哪裡去。這三個事情都會跟我們共享單車友善的環境有關係，也會跟共享單車如何跟大眾運輸做整合有關係。因為以前 GPS 的資料還不是很普遍，所以，早期文獻在分析行為的時候，多使用問卷調查或是借還紀錄，資料的尺度跟精確度經常不是很合適，有了 GPS 軌跡資料可以得到更多的訊息。

另外一個計畫是機車。我們自己去調查 GPS 數據，現在正在進行這個調查。會用穿戴式裝置記錄心率變化，並用手機 app 記錄 GPS 軌跡與情緒資訊。我們這一次的分析會強調心理跟環境，這兩個元素是怎麼樣跟大家騎機車的行為有關係。這其實跟生活經驗都會有關，但最主要的是延續過去的研究，一路下來希望能夠對機車騎乘行為作更深入及廣泛的探討。



▲共享運具研究最新出版 Lin, J. J., Guo, Q. Q., and Liu, H. C. (2025), Associa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 with moped-sharing use: A vehicle-based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19(2): 133-148.，不同的建成環境特徵對共享機車使用會有相異的影響距離。

三、當主編作為一種修養提升

我擔任《都市與計劃》以及《地理學報》主編分別有八年與二年的時間，那些期刊都在那邊（指著後方的櫃子）。總共編了四十本，過程收穫很多，在我學術生涯裡面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學習到非常多事情。作主編前跟作主編後最大的差別是修養改善很多。做主編以前，我們投稿經常會被退稿，那時候年輕氣盛，對審稿人與他們的意見經常是「很有意見」的，有時也會稍稍對主編表達怨念。但是當了主編以後，我體會到作編輯跟審稿人都是很辛苦的工

作，當時應該要用更和諧的方式溝通。而且，當主編經常就會……因為我們這個期刊是雙匿名審查，你是審稿人跟作者中間唯一的管道。作者要抱怨找不到審稿人，所以，作者所有的怨念都會「迴向」到主編身上。我那時候經常收到作者的抱怨，說「這個審查意見怎麼會這樣子，主編你要好好管理，要挑適當的審稿人」。所以我發覺自己的個性越來越好了！大家的怨念來到後，跑跑步就灑到空氣中了。

多數的審稿人應該都是很正面的在作這件（審查）事情。但是，其實也不容諱言，有少數人……有可能是我們沒有找到專業的人，也有可能是他沒有花適當時間在這件事情上面，尤其是剛開始做主編，在找審稿人時發生失誤機會稍高，但如果做了主編幾年以後，應該就有足夠經驗可以掌握「黑名單」，以及各個領域適當的審稿人，這需要一些時間。另一方面，國內的審稿人 pool 比較小，經常是同一個主題找來找去都是那幾個老師。但國際期刊不一樣，它是全球在找審稿人，所有更高的機會找到適當的。我有將部分稿件送請海外華人審查，效果還不錯，這也許是擴大審稿人邀請對象的可能作法。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國際期刊投稿？我個人的經驗是這樣，我從 2011 年之後就沒有再投國內期刊了，直接做國際出版。我覺得做國際出版有一個蠻正面的事情，就是世界很大，比如說 SCI 收錄期刊在現在可能更多了，但是在我當時 2011 年的時候，大概有 7000 多個期刊，SSCI 收錄期刊在 2011 的時候大概是 1000 多個期刊。那在台灣適合我

投稿的期刊只有一隻手數得完的數量，所以在國際實際上選擇性會更大。然後，我們研究成果的學術貢獻會有不同層次，所以在國際上較有機會可以找到符合你這個層次對應的期刊，或者會 appreciate 你這個研究的期刊。所以國際出版就是海闊天空，選擇性很多。但是要注意避免那些審稿程序受質疑或是學術聲譽不佳的期刊，努力把成果投到所屬領域的標竿期刊。

小編追問：如何選擇合適的投稿刊物？

我的經驗是，我會看我的 references 裡面 cite 的文章來自哪些期刊。這些期刊你又可以區分為比較 top 的，可能是 Q1 的，其次可能有些 Q2、Q3 的，也就是說會有 rank 的高、中、低。那我就會評估我這篇文章適合投哪一個 rank，通常我們都是從 rank 最高的開始投，退（稿）了以後再往下投。

那 rank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這個牽涉到國際出版的第二個重要的考慮是：這個研究有多少人看。越多人看 impact 就越高，就會有更多人 recognize 你的研究。所以，如果你的研究是用中文寫，然後登在台灣期刊，它的影響力就不會像用比較全球性的語言登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但是，我並不是說登在國內就比較不重要，或者登在國外就比較重要，不是這個意思。我談的是 impact，這也不是一般那種 impact factor（影響指數）意涵，而是說「你到底會影響到哪些人」、「有多少人會知道你發現的這件事情」、「知識會傳播給多少人又影響了多少人」。如果影響力越大，出版價值就越高，要

不然沒事我們幹嘛出版，我們作完放著就好了。你作出版通常是要告訴大家「我發現這件事情」。當發現某件事情，你會很興奮，就會想如果越多人聽到越好。但如果只有少數人聽到，就會覺得有點遺憾。例如遠在南美洲某一個城市的人，看到你的論文後給了他啟發，這個啟發不一定是在作研究上面，也有可能他是一個都市規劃者，看了你論文中的台南經驗，正好解決了某一個遙遠城市的問題，這就是在實務上面的啟發，所以這個啟發不一定是學術的，它也會是實務的，這樣影響力是不是很大，能跨過太平洋。當然，告訴別人的另一個目的，是引發思考與挑戰，催化更深、更廣、更正確的知識出來。

國內期刊的新出路：國際化、在地化或實務技術化

國內期刊投稿量減少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我們都市計劃領域，各領域都發生這個事情。有一些領域的作法是改變自己的期刊，變成國際期刊，尤其是在管理、生醫、工程領域已經有數個轉型為國際期刊的例子，這通常要改變出版語言，擴大收稿對象來自全球，改變編輯委員成為國際性結構，然後努力去加入國際學術資料庫。另外一種是維持為中文期刊，但把期刊的方向設定在……就我所知有兩種方向：一種方向是設定在台灣內部有興趣的在地議題，那你的期望是要讓在地知道你發現了這個事情，並沒有期望要全球知道，是比較 local 的議題。另外一種方向是把期刊轉型為混合的，就是裡面會登學術性的，也會登實務性的論文，但一樣維持審稿制度。

四、田野實查之必要

我們研究室成員經常出國參加研討會，或是去作移地研究。有一個傳統，如果那一屆有碩士生要畢業，同學們會大家揪一揪去投稿，然後寫好論文全文向國科會申請補助經費。譬如說去年四月的美國地理學會年會在夏威夷舉辦，大家很興奮地跑去。我對台大學生的英文交流能力以及研究品質很有信心，實際上的經驗也是如此。報告之外，同學們也會在那邊進行「都市與區域發展實察」，在海邊、山上、空中、公園、購物中心、餐廳等地點，辛苦地體驗及記錄生態保育、人類行為、交通與休閒設施等，我們另外會有「移地研究」。譬如說我們的研究主題，是在國外的某一個城市或地區，我們就會去那邊待一陣子做移地研究。這個移地研究的時間有時候很長，有時候很短，譬如說去年二月，我就到英國倫敦執行一個臺英的合作計畫，待了大概八天在那裡作訪談、蒐集資料、現場勘查，還有跟當地合作學者討論，溝通希望幫我們找的資料。這次合作學者之一在 UCL（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倫敦大學學院）服務，是位於市區裡面的大學，很靠近大英博物館，我也趁空檔去了大英博物館兩次，進行都市及區域發展的歷史文物實察。前年我是執行另外一個台灣跟印度的合作計畫，就去了印度在東南邊的海德巴（Hyderabad），成為我第一次的印度旅行經驗。印度不僅面積很大，本身內部的差異性也很大。我在海德拉巴看到的，跟一般我聽到的一些大家對印度的都市傳說不太一樣。（編問：不一樣在哪？）這個城市回教徒的比例比

較高。英國結束殖民統治時，把殖民範圍獨立為以回教徒為主的巴基斯坦，以及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但是其實在印度某些地方，因為歷史因素，還有稍微高比例的回教徒，那邊也有清真寺，也要做禮拜，所以跟印度教的形式跟生活都不太一樣。但是也有共通點，譬如說他們都吃香料飯，但會聽到禮拜廣播，在其他城市就不會聽到，移地研究也是一方面增廣見聞。

五、恆溫熱忱與運動排壓

研究熱忱的話，平常不太會去感受到這件事情，反正每天都在作這件事，一直都有工作安排著，所以也不會特別去想研究熱忱。因為我原來是公務員，做了九年的公務員，從1990年就開始工作，那時候我碩士班一年級，然後就一直工作，到現在中間都沒停。之後在2000年轉到學術界，一直到現在差不多25年，但我沒有特別感受到什麼熱忱，

反正就是一直都有新的任務來就作啊。研究的話是不太會有倦怠感啦，可能我這個人好奇心比較重，也因為作研究沒有人管你，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跟你要做什麼，要做到什麼程度，我的個性比較喜歡這種自由的工作，所以在研究上一直沒有覺得沒熱忱的時候。

排解壓力的話我很習慣慢跑，服兵役時養成的習慣，大概每隔一天，如果天氣好、沒下雨的話，傍晚我就在學校跑。我們學校跑起來很舒服，春夏兩季還可以享受花香，跑一跑就可以紓解工作壓力。跑的時候可以想事情，也可以讓腦袋空白，兩者都可把自己從正經的情境跳離出去，讓腦袋梳理一下，壓力就可以稍微降低。

研究室網頁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view/jenjialin/home>



▲研究室成員於2024年4月參加於檀香山舉辦的美國地理學家學會年會，於鑽石頭（Diamond Head）山頂合影。

教職員動態

千迴百轉的社會生態纏繞： 郭怡君老師專訪

◎訪談整理：陳品嘉 | 圖片提供、審訂編修：郭怡君老師

Q1 首先要請老師先簡單自我介紹。根據所網，老師您的專長領域是「平衡生態與人文導向的環境規劃」，想請老師針對這個項目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1. 天秤座、A型、INTJ 建築師性格

自我介紹對我來說一直不太容易，所以我乾脆寫了一行提醒自己的小句子，也覺得蠻有趣的：「天秤座、A型、INTJ 建築師性格。」學經歷常常會出現在公開資料中，像星座、血型這些元素，不太出於自己的奮鬥，或許能產生另類的共鳴。像是性格測驗，我原本沒想到自己是INTJ，結果發現這個人格的代表形象竟然是「建築師」。

2. 專長領域：「平衡生態與人文導向的環境規劃」

我想，可能也跟我對「平衡」的偏好有關吧。以前在園藝系時，同學常笑我做事總是追求平衡，什麼都想平衡「X與Y」。所以在撰寫研究專長時，我又忍不住寫下「平衡生態與人文導向的環境規劃」。

其實，在台灣許多系所中，例如生態人文、醫學人文等，都在試圖突破過去「科學與人文二元對立」的思維，尋找整合的可能。我也曾在政大開設《韌性 (Resilience)》與 Edward Wilson 的《知識大融通 (Consilience)》兩門課，正是針對這種學門之間的整合嘗試。

進一步說明這個「生態與人文導向」的架構，大概可以用幾個關鍵詞來拆解：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生態規劃與設計）：這個概念比較明確，指的是在都市或棲居環境的發展過程中，考慮到不只是人類的需求，也顧及其他生命的生存條件。Ecological 不只是強調人與環境的關係，更是將人視為整體生態系的一部分，把「家人」的概念延伸到其他物種。這樣的規劃理念，也與「親生命性」(biophilic design) 有關，強調人與自然的深層連結，是我當初應徵城鄉所時強調的重要主題之一。

Resilience Studies（韌性研究）：這個方向來自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是一套來自宗教經典的古老城市規劃藍圖。我運用現代生態學中的韌性理論來分析這些內容。韌性理論所處理的是社會一生

態系統，涵蓋人類與其他生物，是一種關注整體系統動態平衡的思維。透過這樣的分析，能更清楚地呈現我所說的「平衡生態與人文導向」的核心意涵。

Pattern Language（模式語言）：這個概念介於理科與人文之間。Christopher Alexander 有數學與物理背景，因此他在建築領域所提出的模式語言，試圖描繪生命有機整合的結構。這種方法論既科學又具人文精神，對空間的描述充滿情感與關懷。在我看來，他是生態與人文兼容並蓄的代表人物，也是一種理想的學術典範。

Q2 老師您大學是畢業於台大園藝，之後碩士前往柏克萊大學就讀。想請老師分享一下這兩段求學歷程。另外想請老師分享自己與城鄉所之間的淵源，是什麼讓您知道並接觸城鄉所？以及，最後選擇至英國愛丁堡大學修習哲學博士，又是基於怎樣的動機和目的呢？

我在高中時就是個很典型的理組文藝青年。爸爸是工程師，我對工學院和工程學一直有些嚮往，但最喜歡的科目其實是生物。在高中數學老師和媽媽的鼓勵下，我最後選擇了台大園藝系。這個選擇讓我可以接觸到我最喜歡的大自然，也能深入了解土地、植物等主題，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具包容性的學科。

大一那年，普通植物學這門課為我後續的學習奠定了基調。就像你剛剛提到的「眼前那一塊地」，那塊地正是我的啟蒙現場——我們必須趴在地上仔細觀察地上

Sacred Landscape – beliefs, ghosts and deities（神聖地景—信念與鬼神）。愛丁堡是一座以鬼魂聞名的城市。我的博士學位是在“科學與宗教”學程，將環境規劃納在科學範疇。我相信恐懼和神聖都是地景的意義——有些地方感覺神聖，有的地方鬧鬼——信仰、神秘和記憶塑造著我們生活的地方。這些應該都是可以好好研究的。愛因斯坦說“我們能體驗到最美麗的事物就是神秘。”

目前這樣應該比一句話清楚了？（笑）。

長了什麼植物。我和當時最要好的同學哲慈，常常「趴趴走」——走一段就趴下來，再走一段又趴下來，好像爬蟲類。

我們開始認識那些看起來常被稱為雜草，其實都有名字、有分類、有學名的植物。有的需要用顯微鏡進行細部分類，或去煩植物分類學研究室學長幫忙鑑定。這段經驗讓我深深感受到，我真的很喜歡植物與生態相關的世界。

到大二大三的時候，台大園藝系在梅峰山上有一個實驗農場，那我們都要上去實習。所以我就在那裡認識了高冷的高山的農業和那邊的生態，然後就有點迷上中高海拔的生態系。就因為我們學校住在梅峰山上，所以早上五點鐘就跟老師一起去賞鳥，然後去採果，然後去挖地，然後去洗根，然後去種盆，照顧毛毛的水蜜桃（順便吃幾顆掉在地上的，都是小鳥咬過的。小鳥吃得真好～）。那時候山上有一些高山高麗菜的爭議，然後跟原住民、土地等等都還有一些張

力存在。我那時候很年輕，不太明白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不過我可以感覺到那個大自然還有那個人與環境的關係，跟我在都市裡面，尤其我是個台北小孩，是很不一樣的。以至於我在山上待久了以後，變成山上的孩子，再回到台北會覺得不對勁。有一次我媽說，「再不回山上，我的女兒就要生病了」。

好像因為山上離天比較近，我每天晚上就是被那個星空壓迫了，到山上真的，那個星空還有那個銀河系這樣壓在我的臉上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好像真的必須去面對天是什麼。然後山上小鳥每天的鳴唱，他們自信愉悅的神采，然後這種安靜到聽到自己的心跳，還有那隻蒼蠅聽起來都像是那個轟炸機那種聲音，那樣子的環境真的對我蠻大的啟發。



▲手繪梅峰原地崩裂的板岩和縫隙中長出的小草

後來在大三，我當了系學會會長，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想要把梅峰農場轉型成為從一個標準農學院的實驗農場變成生態教育園區。可是那個時候在園藝系，並不是所有師生都贊成這個方向，

所以算是有點張力緊張，然後會面臨一些逆境，還有一些不好的眼神、表情之類的。所以後來我的大三大四就會有一點灰灰的，那種有一點風風雨雨的感覺。但是也在同時呢，有位土木系學長他就跟我說我們園藝系就是非常以生命導向的這種文化可能不夠，因為那時候後來園藝系我們就有分組，有一群就是造園組，就是景觀設計路線。進了那一群以後就會慢慢的沒有那麼的科學，好像就會傾向規劃和美學和更人文的一點。可是那時候我也覺得好像我們好像我總覺得少了什麼，那土木系的學長就提醒我，說台大有一塊很珍貴的一定要去，就是城鄉所。

他還推薦我模式語言，我印象超深刻，所以我覺得那個工學院的思想就進來了，而且有打到我的腦袋。土木系學長覺得我們園藝系可能比較「拈花惹草」，那對於社會的衝擊，或者是有爭議的議題部分的時候，我們三類組這種以生命科學為本的，常常不能呼應，也沒有適當的語言和足夠的訓練去，比如說走上街頭或者是跟誰站在一起，就比較沒有辦法。雖然我們有很多老師，其實他們都是長期關心農業跟農民，其實是站在一起的，可是我們可能花太多時間在讀基礎的理科東西，我們的腦袋，我們那個時候那個年紀可能生命的成熟度也不夠，就對於人世間的這些苦難的現實這一面好像還理解不夠，我們都還在努力探索我們的青春。

所以我覺得啦，就是那個時候理組的我的確是受到工學院尤其是城鄉所的啟發和挑戰。我去到城鄉所，先去聽了夏鑄九老師的課。夏老師的課非常陽剛，

整間教室幾乎都是男生，我感覺自己擠進那個不同的知識堂奧的領域，然後聽著夏老師那種鏗鏘有力的論調，然後那個抓頭髮的氣勢，然後古今中外這樣子的講，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可以這樣講事情。然後要去選康旻杰老師的課的時候，我就發現好多人要選喔，他好像只收十幾個，結果現場教室有四五十個以上的學生，所以後來導致於他必須要選拔，還是要給我們出一些難題來考我們。所以那時候他出了「通道」這個題目，然後通道我就胡思亂想，我的作業就叫那個，我就畫一個馬桶還是什麼，就是講了我對於這種排泄物的來龍去脈我的興趣，然後它的隱藏部分之類的。所以就是那個很臭的作業，可能就讓我幸運地被選上，就開啟了我在城鄉所那個時候上的「初等環境規劃」的啟蒙。那裡有很多土木系的同學，然後還有少數的三類組生命科學相關動植物系的同學，然後有人類學的同學。

所以在差不多畢業之前，等於是我就已經在城鄉所和園藝系這樣混，然後我同時又跑山上（梅峰），然後我也去昆蟲系，然後森林系這樣子的，就整個生態系，反正是活的東西我都想要認識一下。對，所以就這樣到處跑跑，修的學分都超多的，但是分數都不是特別好，因為都沒有特別專注在某一個科目上，可是那時候就有一種通才的傾向。那後來就因為在城鄉所進出，所以就會不小心就認識了基金會的人，以至於在畢業後，我就是在基金會工作，然後好像是在園藝系山上農場，然後又在基金會工作，所以我畢業就開始工作。

我差不多是在二十五歲左右出國進

修。我沒有那麼執著在基金會，因為我那時候個性比較不穩定，而且我又太過熱情地熱愛大自然。基金會他們很需要顧念到人和社會人文社會的部分，那方面是我比較缺乏的。有時候我會覺得我自己是個異類，然後他們也都很親暱地、很包容我，給我取名叫「怪妹妹」。有很多這種大自然的項目就會讓我去做那個生態環境的規劃，然後在一些計畫當中都有我的一些小小的痕跡，就是環境規劃，就是初步基本自然資源調查的部分。

就這樣，我在基金會的工作有點不是那麼穩定，因為有時候會做一做，然後就不做了，然後又有什麼計畫，然後我又回來了這樣子。所幸這個基金會是一個包容我這種有點一直在邊緣的角色。後來才去 Berkeley，是因為 Randy Hester 老師來到台大，然後我就發現，我跟他好像有一點點像，因為我們看到蝴蝶就會去追著蝴蝶跑，然後我身上都有一本素描本，然後隨時都在畫畫。所以我就心裡對 Hester 老師產生一個嚮往，後來就去申請了 Berkeley。



▲ Berkeley 畢業前後參加環太平洋研討會（站立者）

1. 碩士論文與民生社區

在 Berkeley 念碩士班的時候，我的碩士論文是寫台北市民生社區的環境變遷與童年自經驗。一開始學校不是很認同我選擇民生社區作為研究題目，因為他們聽到那是一個中產階級社區，好像感覺不是很有代表性。但畢竟那是我成長的環境，我也知道有一群人一起在那裡體驗了那個環境大約四十年的變遷。

民生社區附近原本是基隆河洪氾平原的一部分，那時候都還有農村、眷村，有羊走來走去，有稻田。後來基隆河截彎取直，所以很多的基隆河小支流或者是水圳都被蓋了起來。我們原本在那裡丟水鴛鴦，很野的那個童年就不見了，就變成一片草地。然後後來又有新一代的思潮，是在上面再蓋一個新的、假的生態河，那是二十一世紀初生態教育的風潮。

所以我就發現這三四十年的這種變遷也會影響那個環境長大的小朋友，他們的整個環境感受。對啊，然後包括他們活動的範圍，我們以前的孩子可能是一公里範圍，然後後來就濃縮到五十公尺。當時的老師要我再想一想，真的要做這種好像很時髦的社區嗎？我覺得可能跟柏克萊大學那種 activist 的傾向有關，他們比較傾向幫助弱勢。我必須要證明這個研究真



▲碩士畢業後返校攝於 Berkeley 的 Indian Rock

的有它的意義。我的一位指導教授甚至到我的論文都完成了，他才說他終於了解我在幹什麼。

2. 從台東經驗到赴英修行

從 Berkeley 回來台灣那個時候，我感覺到心裡有一股意志，想要突破。那時候我先去了台東在那邊生活，而且在公部門生活了四年。我是帶著大箱子，先應徵台東縣政府，他們說我學歷太高，但會考慮。後來我就應徵上了縣政府綜合開發課的規劃人員，是最基層的，然後帶著大箱子去了。



▲於台東服務時和都蘭部落阿嬤們相處照（當時阿嬤們還同聲歡唱日本兒歌 Po-Po-Po Hato-poppo）

因為我是基督徒，我想說接下來要找一個教會，就看到一隻很漂亮的紫嘯鸚在我前面飛，然後我就跟著那隻藍鳥，後來去了台東浸信會的教會。在那裡一邊在公部門工作，一邊同時有信仰的生活，而且是一個不一樣的生活圈，因為是跟台東人、很多原住民，接著多種族那種很開朗的環境。這跟我這個台北小孩，這種怎麼說？很壓抑嗎？也沒有很壓抑，只是說不太一樣的氛圍，完全不一樣，常常歡笑的氛圍。在那樣的環境生活了四年，到後來我就覺得我想要找一種天命吧。可能本來

的孔子是說五十知天命，可是那時候我還稍微年輕一點，我就覺得有點想要去找我覺得我讀到碩士好像也沒有，我也一時也沒有想要更大、更高的學位。也服務到台灣最偏遠的台東和離島，我覺得我好像想要理解一個更高的存在或更高的價值，或者是哲學的時候，那時候我想我去讀神學好了。



▲和台東浸信會姊妹們在一起時常笑到崩潰

所以我就跑去念了神學院，在念神學院其實是想去找，看看在地上能不能找到天意。然後就找到《聖經》這個古老的經典，找到裡面有一個西元前六世紀的亡國之後的一個建國大綱的土地規劃，覺得很特別。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信徒，我念過去那一段應該會跳過，因為很難懂，但後來成為我的博士論文的內容。因為它是以色列古代以色列猶太人，被那時候的帝國給統治，定都在巴比倫，整個滅亡以後，成為被波斯用懷柔政策送回到現在的以色列這邊，然後又計畫重建。所以他們有經過這個亡國的創傷，他們的國族史寫了一個有點像 master plan 的這種土地重新的規劃，那個精神或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要怎麼樣，然後土地怎麼分、哪裡種什麼東西、然後糧食怎麼生產、然後河流怎麼流，

就確保了它的醫療資源、濕地的資源、漁業、然後果實什麼的。我覺得我仔細看一下，這個不是一般的宗教內容，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務實的國土計畫。所以我就想要好好地去研究它。

問題是那個東西的撰寫內容是古代希伯來文，所以就必須花那三四年去研究古文，因為它經過就像你說德文翻譯成什麼，它翻譯完之後看中文的時候就看不出什麼，因為有些東西會不見了，就回去到原文的時候，會發現有一些真相藏在細節裡面。對對，所以那個時候說你剛剛這邊有寫說動機和目的，其實主要就是說碩士研究不完，因為那個寫在《以西結書》裡面的這個國土計畫，它的難度就是它的語言比較奇怪，對是一個，然後那個古代的經典，它經過一些破碎和傳抄的過程，它有一些字壞掉了或是什麼的，所以它變成一個考古或是文獻學的一些問題，所以這個碩士研究不完，就去跨到博士。而且我發現這個地景文本不是單一角度可以研究，我



▲於英國求學時某次漫步於蘇格蘭湖岸鄉間

必須還是要回歸到跨領域。所以我就找那個，就是科學與宗教這樣子的。

那時候因為我已經去過美國，然後再加上這個是古代宗教經典，好像歐洲比較適合。那找英國，那時候劍橋大學跟愛丁堡大學有給我比較友善的回應，可是那時候在時間上面，而且愛丁堡大學的指導教授 Mark Harris 他是地球物理學者，我覺得這個簡直就是太酷了！很厲害，我很想知道他怎麼來看這個國土計



▲與愛丁堡大學指導教授 Mark Harris 合影於教授辦公室

Q3 老師這學期有開兩門課，分別是「基地計畫與永續設計」和「文化地景專題」，想請老師簡單介紹一下這兩門課的內容。至今學期已過半，您目前教學上遇到最有趣的事情是什麼？最大的挑戰又是什麼？

基地計畫與永續設計和文化地景專題，這兩門課我算是蠻幸運地承接了，因為我是算是一學年的第二學期才進來，聘任也比較趕。為了不要讓我重新開課

畫，而且他竟然是這麼懂地球的人，這麼大的尺度，他是怎麼看這個？我後來發現教授是研究粒子物理啦，所以我把它想成他其實我以為他懂的是地球，我就覺得天啊，好神奇喔。他竟然會關心我的東西，而且他還幫我去找了愛丁堡大學的地景建築的重量級教授 Catharine Ward Thompson，等於是他也預備好他自己來迎接我，所以我有被感動，我就趕快去追隨他，繼續完成這個研究。

還要經過一些程序，就讓我開了這兩門跟我的性質比較相近，而且可能很久沒有開的課，課名已經在那邊了。這兩門課好像蠻多年在城鄉所沒有開了。《基地計畫與永續設計》這門課有一個文本，就是 Kevin Lynch 的《Site Planning》，中文翻譯叫《敷地計畫》。《文化地景專題》的部分沒有固定的文本，但我想說讓學生來的時候，我們來討論看看。所以還是找到了《地景》那本書，是王志弘老師翻譯的。那《地景》要搭配什麼呢？我就想說，或許是跟傳統生態知

識有關的，因為這種生態成為一種文化。一樣，我還是想要平衡人文與生態這種觀點，所以我覺得傳統生態知識這方面，或是我想要帶進的那種神聖的概念，《神聖生態學》這本書就剛好最近才出版，然後就冒出來了。

《基地計畫》使用 Kevin Lynch 的經典文本，但是因為這門課是需要有一個 site（基地），實地考察很重要，所以一開始我們是趁著大安森林公園螢火蟲祭，去找楊平世老師請教他棲地復育的經驗；之後，經過劉柏宏老師的允准，想以民族實驗中學水圳復育工程計畫的操場那邊作為我們的計畫基地。可是當我們在那邊研究那個可能未來的 site 的時候，發現那個工程設計已經定案了，然後工程也差不多做了一半，然後我們就想說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在理解那個水圳的時候，我們請劉柏宏老師來跟我們講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自然就不只是侷限在那個水圳，還有他對城南還有這邊整個文化氛圍，還有以水為主題的一些構想，包括他在台大這邊有做了部分段落的「瑠公圳」，雖然是有做得像自然河川，不是傳統的渠道，也不是真的打開，就只是一種意象上的復育，讓大家覺得說這邊以前的水可能這樣、這樣、這樣、這樣，然後連結到那個自來水以前日治時代開始的，以水作為主題的歷史。

演講中他提及他最新的計畫是關於公館圓環拆除後的潛力。他一講完沒幾天，蔣萬安市長就拍板要拆公館圓環，我們就覺得好驚訝喔。然後一方面就是覺得說，那這整個規劃的過程有沒有我

們還可以參與的機會？網路上可以看見一些議員或一些 YouTuber 和民間專家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圓環，有人提出說之前市府曾做過模擬，拆掉會造成交通更大的壅塞，或許這個圓環只是需要做出修正，，就能夠好好的讓這個圓環發揮一個正常圓環該有的功能，它還是可以活下去。相較於國外的圓環，台灣的圓環好像特別有困難，公館圓環交通問題的確需要被解決，機車和行人尤其還有台大師大台科大「大學之道」（自行車道）應該要被顧及。

所以其實我們本來的 site 本來可能是一個水環境的想像。但是現在因為出現一個立即的要拆不拆的這個事情的時候，就讓我們感覺遇到困難，就是想要去更深的理解。

然後就在我在那邊繞來繞去有點煩惱的時候，竟然被那個新聞記者抓到了因為蔣萬安當天就在他的臉書公告說拍板說他要拆圓環，他要把地下道公車道填平，把那個路改成正交路口，這算是蠻大的事情，是很大的工程。對，然後那個媒體就去現場逮台大的學生，就問說會不會擔心這邊路會更塞。我本來想說拍個照趕快跑掉，但來不及被抓住了。他在他抓到我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非得面對這個問題了。記者問我擔不擔心？我說我有點擔心。

所以這件事情就成為基地計畫的議題，也挑戰了 Kevin Lynch 在裡面所規劃的「問題」是什麼，然後使用者是誰。我們聯絡了關心圓環拆除議題並且挑戰市府的議員，要去找他，要去問問、要去聊聊，看看有沒有什麼可能性，對，

看有什麼可能性，然後順便理解一下目前他們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怎麼樣。

坦白講，轉去關心圓環真的有點突發，而且讓人覺得很糾結，但是也很真實。原本課程開始因為螢火蟲的主題，同學們到了大安森林公園。在密集的台北大安區裡面的公園，想要試圖模擬台北過去的濕地生態系，但是又要結合螢火蟲的棲地需求，它有一些一定要有的條件和不能有的干擾。比如說，螢火蟲的幼蟲在羽化出來的時候很脆弱敏感，你把它踩爛了，它就出不來了之類的，所以需要有一些圍起來的措施等等，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考量。曾經有研究生，他自己已經有養蟲的能力，為了要支援螢火蟲祭他就自己放螢火蟲，因為螢火蟲品種不同被主辦單位抓包，成為螢火蟲祭的爭議小插曲。

Q4 老師您對未來有怎樣的期許？在研究領域上會想往哪個方面繼續探究？又如何可能藉此回應台灣社會的重大議題？

我的標準答案是期許珍惜自己和城鄉所這個蝴蝶效應和很深的緣分，能傳承、能開拓的都盡力去做。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另一方面，因為我的經歷和我的園藝背景，就像我們一開始聊到農業等等，我覺得農業的背景對於城鄉發展很重要。所以我回頭找了母系的林宗賢老師，因為他是梅峰農場之前的場長，後來是科博館館長。他是台灣芒果傳奇人物，找到芒果開化不結果的關鍵，為人非常謙和，很有

回答你的問題，最有趣也是最挑戰的是在時空滾動時我們和環境以及彼此的相遇陪伴。螢火蟲棲地本身作為基地計畫案例，配合四月螢火蟲祭本身就有很多內容，再過渡到台大週邊新店溪寶藏巖水博物館水圳的「基地」想像，脈絡也堪稱順暢。突然市長拍案要拆圓環，帶來的擾動我始料未及。其實另一門課「文化地景」課程班上同學們有登上水源（銘傳國小）陸橋，當時預感天橋可能會被拆，班上有學生暗示不想被天橋的事情煩到，有同學說沒有「論述」，保護天橋可能很困難。不知道是瀟灑還是無力還是冷漠，我們就半發呆半觀察在天橋上蹲了近乎一個小時（吹著涼涼的風）。沒有料到先要被拆的是圓環，跟隨著對市府「拆」這個動作感到質疑的我，跳進圓環議題的反而是基地計畫的同學。

土地的智慧，而且很愛農民，是很神奇的角色。還有我植物學的啟蒙恩師郭城孟，總以溫柔的態度帶學生認識千萬年植物與地質生態。以及剛才提到的，昆蟲系的楊平世教授，我也曾在他的水棲昆蟲研究室「混」（水＋昆）過。我覺得這些教授，他們其實退休了仍然極為活躍，都擁有自己的生命哲學。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陳章波教授，一直提醒我莫忘「道法自然」。在有機會的時候，我就邀請可敬的老師們來和城鄉所碰撞出一些火花，然後那個語言對話的時候有點有趣，有些不同星球的對話有時候相互聽不懂真的很好笑。對，這個也是我覺得我的期許，就是我給自己安的一個小角色，想要讓不同領域的前輩們跟這些後生可畏的小輩們相遇對話、碰撞。

那想要繼續探究的領域呢？韌性理論是我覺得要繼續研究的，因為韌性理論也能夠回答後面那個大問題，就是回應台灣社會。台灣社會一直是一個海島，它的韌性可能是與生俱來的，然後它也有它自己的小系統。那正好就跟韌性理論強調的多尺度、靈活的，然後去思考一個生命體在複雜系統裡面，應該就是用適應來面臨動盪。所以這個是我可以延續的研究方向。原本可能是經典研究或是韌性理論研究，那現在可能是務實的應用在真實的環境裡面。

另外就是除了生物愛（biophilia）以外，還有生物恐懼（biophobia）。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跟我完全相反，我愛的她都怕。我很喜歡動物、喜歡植物，但她就會怕。她宿舍出現一隻壁虎，她就睡不著，還會傳訊息問我該怎麼辦。這讓我注意到，如果我每天都在喊生物愛，而且假設生物愛是普遍人性的，可是其實我需要注意到，有人是很害怕這些的，很害怕蟲蟲危機，很害怕大自然就在我們身邊。所以對生物的愛與恐懼，我覺得這個都還可以在更深地去追究。然後是都市生物棲地的變遷。包括我的角度就是說都市發展了，動物都被趕走了，我會用一種遺憾或是覺得該紀錄該研究的心情來看待。可是對於我朋友而言，她就說動物們走得好，辦，不要再過來了。對，所以這是都市生物棲地變遷的另一個面向。

還有傳統生態知識與文本研究，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呈現 Christopher Alexander 不同階段的知識發展。我在英國的時候被論文評審建築史家 Ian Cambell 提醒，說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很重要。我們不要只看 Alexander 七零年代初的《模式語言》，要配合他後來晚期那四大本的《秩序的本質》（The Nature of Order）。這個題目不太好翻譯，因為他去研究 phenomenon，就是生命的現象，然後去研究生物生長分化的模式，幾乎是用數學物理結合建築空間的一種很整合性的理解。可是那個東西大家都比較看不下去，可能資訊量太大。再來就是本來有些人覺得 Alexander 的思想的實用性也被挑戰。可是我覺得他是經典，然後還沒有被理解，那我覺得應該要有人花時間去理解。如果我有能力的話，我願意帶一些有興趣的學生一起去理解 Alexander，然後讓他的思想精髓在我們當中可以傳承下來。

最後一點，不同尺度的物種面臨不同的議題，小的尺度常常會被大的尺度忽略或是遺忘。所以我一開始進所上演講題目是「心疼的力量」，覺得建立不同尺度的韌性，不同尺度者互相認識相互支援將持續地對台灣或者不同的環境有所助益。

校友迴游

「交通」人生的再進化： 白仁德老師／學長專訪

◎訪談整理：陳品嘉 | 圖片提供、審訂編修：白仁德

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的白仁德老師（學長），為本所博士班的第一屆學生。白老師（學長）關心研究領域為交通運輸規劃、社區防災規劃和產業群聚分析。本期校友迴游，我們有幸邀請到白老師（學長）和我們分享他的學習經歷、想法與感觸。



▲白仁德老師／學長近況

校友檔案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學系 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工程學系 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博士

經歷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教授

一、首屆城鄉博班與「大桌」生活

我大學是成大交通管理，研究所是交大交通運輸工程研究所（編按：現已更名為交通運輸工程學系）。在交大交研所唸書的時候，林建元老師剛好（從美國）回來了，他在交大任教一年。當時我的碩論指導教授是跟曾國雄老師，他剛好與曾老師有合作，所以在研究室裡就有比較多互動。碩士畢業後去服役，在裝甲旅，那時候通訊沒有像我們現在這麼方便，連打電話都不方便，寫信是最常見的聯絡方式，當然也沒有什麼社群軟體啊，退伍前寫了聖誕卡向幾位老師問安，沒有想到林建元老師很有心的給我回了一封信，看我退伍後要不要到臺大來就讀。那時候我本來是想出國去唸，但當兵的時候腦袋打漿糊，雖然憧憬著想再出國進修，迷迷惘惘還無方向，就順著林老師的提議，在休假的時候去找林老師，他提議我考台大城鄉所博士班，也叮囑我同時報考交大交研所博士班。

那時台大城鄉所博士班是第一屆招生，本來是「山中傳奇」在土木所，我們當時是第一屆，錄取七個，當時考取台大城鄉所的排名是第一，等於是第一屆第一名入學，當時跟我一樣一起考上台大跟交大的，有另一位是施慈魂，但他後來也沒有去交大。當時博士班每個月有一萬五的助學金，當然就選擇台大。

個人覺得那時候的台大城鄉所，老師的領域比現在相對完整，像林峰田老師是 GIS，林建元老師是都市計劃，陳亮全老師是防災跟社區參與，夏鑄九老師就是社會跟文化方面，畢恆達老師是女性主義，另外還有華昌宜老師的不動

產經濟，是很多樣的。城鄉所對第一屆的博士要求比較多，有一個「qualify」的制度設計，在第一個學年結束之前沒有通過的話就不能繼續唸。記得班上同學有一個補考，到了下一學期開學的時候再補考，有一個就沒通過就離開了，還有一個是他就選擇到英國去唸。到了隔年，剩下五位繼續唸，那一屆有我、王志弘、黃瑞茂、賴志彰、施慈魂。

那時是在工綜館三樓，一部分在海外會，那所辦旁邊不是就是最大間的教室（313），對面就是博士班的研究室，那時候博士班大家互相撞擊，感情還不錯。以前碩士班全部都在教師研究室對面，就是面對所辦左邊的最後一大間，現在好像隔了 1 間小教室，旁邊以前整個都是碩士班的空間。王志弘老師以前的研究室在海外會，他都會跑過來跟我們「喇哩」一下。那時候感情比較好的有洪啟東、胡志平、溫國忠、蔡淑瑩、賴志彰，我跟楊勝評坐在一起，徐裕健有時候也會來這邊攪和一下，另外還有謝慶達。那時候博士班的互動也是形成一個很好的脈絡，我覺得那個 chaining 流下來讓大家在一起以後可以形成一些互相互動的基礎。

其實我本來都是一直走比較交通或計量方法的研究，到了城鄉所又是比較多建築與規劃，要學的東西蠻多的，還有思維方面，一方面是博士班面對很多研究方向的選擇，再加上博班強調獨立研究的自主性，第一年唸完有點想打退堂鼓，本來是存有一個出國留學夢，想在台大唸書，可以兼顧就近去考託福，就在語言中心那邊。但後來老實講也很忙就沒時間了。

二、暫時轉換：公務單位經驗

到第二年快結束的時候，就覺得好像看不到畢業的邊，進入一段徬徨期。我其實是 full time 學生，每天都很早去（學校），我不敢說我很認真啦，但是就很早去。所以，那時候我經常一早就遇到王鴻楷老師，他很資深，算是林建元老師的老師，他以為我很認真。但是當時有一點萌生退意，再加上家庭因素一度想要停止學業。到第二年暑假的時候，我就想說去考個高考看看。不誇張，我那時候其實工作也有一些多啦，所以我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準備。就準備一個禮拜就去考了，差不多算「裸考」，還好本質學能還行，去考運輸行政的高考二級。我記得我去考的時候還遇到一個學弟，我就聽到他說：「欸那個學長來考」，感覺上如果我考不上會很丟臉那樣。我想說考個高考來試看看，沒想要考上了，而且考上那個運輸行政那一組的第二名，相對可以優先排志願，然後就分到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或許就是人生的宿命，碩士班在唸交大研究所跑去運研所找資料，因為以前沒有像現在一樣電腦敲一敲就有資料，都要到現場去查啊、影印啊。那時候的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在（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 號，是一棟不是很高的建築物，現在是原址重建的。當時去訪的感覺是這裡上班環境怎麼那麼好，很安靜，裡面空間很乾淨，然後感覺上大家素質也很高。它是研究單位嘛，不像一般行政單位，我就想說以後如果能來這邊（上班）能有多好，結果高考就分到那裡去了，之後就到那邊工作。

我是民國 80 年入學，然後民國 82 年底分到那邊去，等於博士班唸了兩年半。其實我課也大概都修完，就是 qualify 也通過了，但還沒資格考，開始進入公職生涯。那時候自以為還蠻受重用的，主要的工作是協助《交通政策白皮書》，還有《交通衝擊評估制度》（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甚至幫忙開會，以及《智慧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這項工作也讓我學習、成長了許多。隔年又考上交通工程高考一級，因為我運研所有些研續計畫需要幫忙，我去了北捷還未滿六個月我就調回運研所。所以我有兩張高考證書，一張是高考二級的運輸行政，另一張是高考一級的交通工程，我有經建行政職系以及土木工程職系的資格。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有兩種職系，一個是研究員的職系，一個是工程師的職系。簡單講一個是行政職系，一個是工程職系。結果，我從入職到離開不到七年，就從原來的「五本五」開始，到離開時已經「九本五」了。就是待不到七年，就達到大家很難升的九等，算是很幸運的，其實卻是長官照顧以及被後面要升職的新進同仁推著走。

因為是中央單位，所以也沒有什麼太多複雜的層級，就是從助理研究員、工程師、研究員這樣逐步晉升。其間也代理過副組長，那時我們組的副組長出國去短期進修。公職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時候，我也勉強把學位完成了。其實本來想要放棄，非常感謝林建元老師鼓勵我說：「你還是把這個學位完成。」，就跟隨林老師的一個國科會研究案把論文完成，研究主題是探討高速公路對周邊發展的影響。

有件事情蠻有趣的。那時候運研所有一些長官開始都高升到交通部，有一些長官就跟我說，你拿到學位後要開始出來磨練啊，像有些人去路政司，

有些去航政司，有些去民航局、高公局，就跟我同期或前後期的，現在很多都是台面上響叮噠的人物，跟他們也學習蠻多的。

三、教書：有點出乎意料的第二人生

學位取得後，原本也無心仕途，一直想進大專院校任教。因為嚮往教書的自由，就投了履歷到很多學校。不敢投什麼名校啦，就投了明新科大、大葉大學、育達、明道等等這幾個學校。人生機緣真的很難講，當時自酌沒有什麼太多的學術表現，就只有學校的一些研究成果，行政經驗倒是有一些。有幸得到明新科大叫我去面試，面談的系主任是台大農經博士，我本來不認識，年紀比我年輕，他碰到我就說：「啊白老師啊好久不見啊！」但我根本不認識他，應是他把我認錯成另一個人，但其實那個人跟我外觀差很多。不管怎樣聊一聊後，他就馬上帶我去見校長，沒想到校長就當場發聘書給我，還問我說：「你這樣轉換工作有沒有什麼問題啊？」我就傻眼，沒有教職經驗也不知道應聘的程序是如何，一時之間也不知所措。

那是在民國 89 年，也就是 921 大地震的隔年，台灣那時候推行教改，成

立了很多大專院校。造成那一年，明新科大的企管系突然很多老師離職，換到其他學校去，很多課排了沒老師可授課。我當場心裡就：「蛤！？怎麼這樣就發一張聘書給我。」我從來沒有去應徵過教職，回去之後我還在猶豫。我記得好像是禮拜三去面試，因為交通部運研所是可以彈性上班兩個小時，好像是台灣唯二可以彈性上班的單位。我從新竹就先去 interview，結束後就趕去上班，去到辦公室不是遞假單而是遞辭呈，就跟我的組長講說我要辭職了，我要換新的工作了，那時候組裡有點慘，我們那一組內多位組員大部分都是博士，有好幾位目前都在各大名校任教，包括林楨家老師，他那時候是跟我們同一組，突然之間就跑光光了，組長其實也擋不住，我就這樣就跑去教書了。在明新科大那一、兩年其實是很快樂的教書時光。離家又近，又不用朝九晚五。那時候小孩子還小，有時候全家只有我老婆去上班，我帶兩個小孩子在家裡或到處鬼混，有課再去學校就好。薪水相對公務人員也比較多。

四、落腳文山：進入政大地政服務

去了明新之後一年，政大地政在徵人。學弟岳裕智，當時在城鄉所博士班，找我團報。他那時候還沒畢業但他也投件了。那年政大在應聘老師時來了很多

人，有些是 fresh doctor，有些是已經是資深老師了。然後，來 24 個要錄取 1 個。我覺得很多人都很優秀，但我可能是「buffet」的概念，也就是說，第一個，因為地政系資班剛成立沒多久，我們（地政系）需要一個具有交通專業，但一直都

沒有人開這個課。就交通專業上，我可是相當有自信。畢竟是交通科班出身，又待了七年的交通部公職；第二個，要能帶量化的課目，這部分我的訓練應該還算蠻紮實的；第三，要有一些實務，因為要帶實習課。我在行政機關上班，雖然不像顧問公司做一個 project，但其實有不少經驗。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三個 criteria 綜合加權，我可能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應該都在中上，很像是那種吃 buffet 的概念，雖然不是最優，但什麼都會一點，當然也要感謝當時系上師長的錯愛，結果後來就進來了。到現在，來地政系已經第 24 年了，也算是人生過了一半了吧，我的工作主要都在這裡了。以前一開始來就覺得自己不是學地政。但如此的歲月影響下，我不算「地政人」要算什麼人？這大概是我走上教學這條路的過程。

五、階段性反思：研究的特殊性與聯通性

我那時候在城鄉所的時候，博士班的訓練是每個人各有一片天。本來老師就各有一個山頭，每個學生都是一個個案，有那種建築師獨來獨往的，有搞社會參與的。那我以往的學習都是跟林建元老師，用比較量化分析的方式推論，是理性分析的一種主要的脈絡。以前我們在城鄉所的實習課，我們有時候會幫忙，然後有時候林老師會叫我幫他當 TA，所以也讓我有一些教學的經驗。當然我也先在明新教過了，所以之前的一些訓練的過程，特別是實習的部分，可以把某部分大致上轉進來，像是理性規劃或是社區參與。

博士班的話大部分都會專注在自己的經驗裡面，所以有些學習過程的經

我在城鄉所是學習，來地政系是在教學。而且，我們地政系有大學部、有研究所，城鄉所只有研究所，應該不太能對等比較。但我自己覺得，其實城鄉所以往的師資跟方向比較多元，現在反而蠻趨同的。當然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特質，地政系跟城鄉所說實在不是在同一個 level 上。像地政系，因為我們有三班大學部學生，目前總共有七、八百個師生，但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的老師不足。現在城鄉所有九位老師，大概教一百多位研究生差不多。然而，地政系現在剩下十九位老師，要教大概七百多位學生，大學部、研究所跟在職專班。進得剛進來有三十一位老師，但這幾年師資變得很少，簡單看師生比就知道了。

驗，不完全可以放到地政系這邊來用。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比如說規劃技巧、社區參與這些的，以往我在交通部裡面比較沒有去碰觸的，所以也算是拓展另外一種視野。

研究這件事情，我認為是要聯的上去，然後聯的通就好了，我常講做份研究或論文，主要是 Description、Deduction & Induction 三件事。以前我們都覺得要寫一個都不得了的曠世巨作，然後什麼都要來一點。但其實當你學得越多，看得越多，你會發現說自己真的很渺小。我現在常常覺得我自己沒有什麼專業，真的是這樣，我常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懂，但是你到了那個場域，很自然地就可以一些意見，這也是報城鄉所訓練所賜。

六、專長的三位一體：交通運輸土地使用、社區防災與產業分析

這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講。當時陳亮全老師帶領我們幾位老師去做國科會整合型防災計畫。陳老師那時候做很多防災計畫，一開始針對應對土石流災害，進行一些脆弱度跟韌性的評估。從此，陸陸續續做了很多年的防災整合型計畫。其實，我自己的研究主軸大概有三個面向，一個是交通運輸土地使用，是我一直以來在做的，防災的整合型計畫，一開始探討疏散避難，本來就是一種交通行為，以及要去規劃庇護地點，它就是一種網絡跟 logistic（物流）。跨進去之後就發現，其實因應氣候變遷、防災以及各種評估，可以應用多評準量化分析的工具，專用在防災上面，工具都還算完整。然後，對於空間規劃的概念我們也都有了，現在就是如何把它應用在不同的議題上面，例如原民部落或

偏鄉。所以，因應氣候變遷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各個部門都要做，那我們那時候做到防災這件事情，就是從疏散避難到脆弱度評估再到韌性分析。

剛剛講到交通運輸跟土地使用，還有防災是兩個研究主軸之外，第三個是產業分析。這是因為以前林建元老師一直協助工業局的產業群聚分析。所以，全省的編定工業區我每一個至少都跑過三次以上，到現在搞不好都累積到四次或五次了，工業局現在改組成「園管局」跟「產發署」。其實有一陣子做比較多有關產業方面的研究，像是產業用地、產業分析、產業群聚這些。那交通運輸跟土地使用是最早我的研究的出發點，我最早是探討區域性尺度的，例如高速公路或高鐵建設前後的影響，但現在我比較喜歡做都市或社區尺度的，有關市區交通工程或都市設計等研究。

七、研究領域的延展與拉伸

現在探討都市地區的大數據分析，如：TOD Map，我去分析捷運的 OD，分析自行車歷年來的 OD，然後做一些像 airbnb 或 co-working space，都是在都市地區節點裡面做的。我現在指導的研究生還不算少，不同的研究方向、研究題目，要做的面向也很多元。當然有些是順著學生的興趣，但我會引導他們到這三個面向上面。應該是這樣講，一開始在練唸博士的時候，就是一門深入小題大作，但是也不要忘記要有一個第二專長。但是，當你出來教書之後，既然是博士了，你就是什麼都要懂一些。

當然不是說要樣樣精通，就像現在新聘一位教師一樣，他可能專長不完全符合系上設定的，但想一想，他能夠念到的博士應該有適當的可塑性，只要專長方向大致相仿，進來的我們可以帶領他。同樣的，作為一個博士，應該要多方去嘗試，要麼是像老師號召有志之士加入，要麼是你自己主動去做一個研究，作一些國科會的提案。所以，我們也會主動去做一些我們想做的研究案，也有主動提案，國科會這幾年做整合型計畫，已經做了一段時間，就有一個 teamwork，專注於某方向那你就沒有太多的力量再去做其他案子。總之，這三條研究脈絡長出來，說真的也都是在城

鄉所的時候打下基礎，來地政系就做一些適當的結合跟應用，學的是方法、理論跟邏輯。

八、試論台北交通改善之可能

這有很多面向。我以前在交通單位，需要把相關的交通數據拿出來，並且清楚地說明。我們交通工程通常會談論「K、Q、V」這三件事，也就是流率、密度和速率。然而，這三件事會衍生出許多問題，例如停車延滯。以指南路這邊來說，上次有位學生跟我提到，以前在 Seven 便利商店那邊的公車站牌已經不見了，它被移到了新光路口那邊。然後那位學生還問我，要不要將現在萊爾富這邊的公車站牌，移到抽水站前面。我覺得這些都必須要經過一些科學分析，交通工程的分析是一個基礎。

以交通工程的分析基礎，再來就是說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改善措施。從學理上來說，大抵就是「3 個 E」。第一個是工程（Engineering），第二個 E 是執法（Enforcement），你雖然做了這些改變，大家有沒有遵守規則，就像政大每到下課的時候，學生們和老師們自由行走在指南路上，這就牽涉到執法（Enforcement），有沒有人來取締違規。現在車輛都會禮讓行人，像政大附近道路到了下午四點多，附近經常會交通打結，因為中小學學校放學、家長來接送，還有學生放學等等，在這個「大三角地帶」經常在四點多會這樣，我觀察過幾次。所以需要第三個就是教育（Education）。這「3 個 E」要能讓交通順暢。

當然，你講的這些施政措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像現在有很多智慧型的停車設備，或是一些有趣的人行道設計，甚至有一些路面設計會讓你覺得這個地方有什麼令人有趣的特殊之處。這些東西慢慢地，從以往只有交通工程的分析，又會結合更多的都市設計元素，乃至於現在有更多的科技元素，這些都不外乎是從這「3 個 E」延伸出來的，像是科技執法，對不對？科技執法，可以說是科技加值在執法上。有了科技執法，現在大家在那裡都很守規矩。你會感覺到，跟平常有沒有警察在那裡不一樣，現在因為有科技執法，大家就會比較小心，不會闖紅燈，不會亂來，不會違規停車太久等等，就會比較遵守規則。

教育是一件事，執法是另一件事，當然還有你設置的那些標誌標線號誌，這些「3 個 E」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對吧？所以你剛剛講的這些東西，雖然沒有明確的對象，但大致上是朝這個方向。

當然，還有一些道路線型的改變，道路交通工程不外乎就是道路的線型、標誌標線號誌這些管制作為。一個是比較偏向硬體的建設，另一個是比較軟性的。然後再來就是民眾的習慣。像現在有行人帝王條款，你敢亂闖亂衝嗎？不敢啊。以前是行人怕車子，怕被罰錢。

貼合時事的話，我試著做一些分析。例如說，我現在分析台北市和新北市，把它們劃分成 100 公尺乘以 100 公尺的網格，來分析每個網格裡 TO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的強度，並且把它做

成地圖（map），那麼這個地圖就會關聯到很多事情。例如，在不同的 TOD 強度下，這個區域都市更新案件的多寡和申請案的多寡，有空間自相關的關係。舉例來說，一般人駕照到 70 歲之後就無效了。換句話說，70 歲之後你就不能開車了。不能開車的話，你要搭公車或大眾運輸。台北市大眾運輸的站點和他服務的周邊老年人的居住分布是否適當？它的班次和數量是否足夠？我可以做一個類似 Lorenz curve（羅倫茲曲線）的分析，把這些站點和現有的服務量做一個完整的分析，這樣你就可以知道這些站點設置得是否適當。探討 social equal 的議題。

所以交通問題其實包含很多面向，不只是公路上的交通工程，也包括大眾運輸的佈設。而且以我的專業來說，來到我們地政系，最多談論的就是 TOD 及其分析，以及很多周邊的議題。像現在 ITDP3.0 的手冊裡面，有很多將交通工程和都市設計結合在一起考量的東西，我覺得那是我們現在學門融合的趨勢。你學土地、學景觀、學建築這些設計領域，要怎麼交通規劃相結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對交通規劃來說，完整性本來就是大家要求的。但是因為我們說土地開發，是從規劃、開發到管理，這些東西其實是一條鞭的流程。而這一條鞭的流程，會牽涉到資源怎麼分配，資源怎麼分配就有它的先後發展順序。所以，你說 TOD 加都市更新這件事，當然希望它是整體開發，但是你要找哪個地點去做開發？可不可以到動物園去做整體開發？我們要叫動物來住喔？不行啊。雖

然動物們很好，但你到忠孝復興去做整體開發也不容易做到。因此，這裡有很多種考量，可能是它有開發的優先順序，也有可能是它開發的難易度。所以這又回歸到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很多所謂的多準則評估（multiple criteria），需要從多種價值觀去判斷，要考量的面向非常多。所以「整體」當然是以前都說的 comprehensive，現在才慢慢理解 comprehensive 是怎麼樣的概念。

九、城鄉與地政的交流網絡建立

可以交流啊，這種交流，可以從碩士班的來交流一些研究課題開始。像我們有實習課，你們也有實習課啦。看要不要來聯合實習。如果你們有學生想要來這邊，跟我們共同上課，然後等於城鄉所大哥哥大姐姐帶弟弟妹妹們出去一起做實習課，也是一件好事。像以前我在城鄉所的時候有學生都去那邊跟一些社區阿公、阿嬤聊天博感情，掌握議題。也可以相互邀請老師來演講或進行合作研究總之，這都可以再討論，看看要怎麼合作，在哪方面可以搭上線，是有很多可能的。



▲白仁德老師近期合著作品

校友迴游

化無奈為動力，透過幽默： 林辰學長專訪

◎訪談整理：賴彥霖 | 圖片提供、審訂編修：林辰

林辰學長有感於出身苗栗的「鄉土」意識，以及大學時期對於土地開發與空間政治經濟學的興趣，而來到城鄉所就讀。經歷糾結的田野與論文寫作經驗後，選擇回到故鄉的地方公務單位服務。本期的「校友迴游」，我們特別邀請學長來為我們分享這一路上的經歷與體悟，也帶領我們初步探索在公務單位服務的真實面貌。



校友檔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經歷

苑裡鎮公所 約聘人員

苗栗地方機關 約聘人員

某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工程員

▲林辰學長近況



▲西湖鄉宣王宮前一隅，北上唸書前的還願地。

因為城鄉

我是苗栗市客家人，大學是念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那時候的東亞學系有分兩組，一個是「漢學與文化組」，另一個是「政治與經濟組」，而我是後者。大概 2012 年開始念大學時，剛好是馬政府第二任執政的時期，當時的社會氛圍我覺得跟現在差異很大。在他第二任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政策，包括推動科技園區、產業園區等，雖然現在一直都還是有這樣的大型土地開發案，但當時的時空背景與國際局勢條件不太一樣，所以在各地都受到蠻大的抗爭。

當時在大學看到家鄉也有很多的案例，有些是產業園區的開發案，有些是科學園區的都市計畫區的擴大案，還有一些是用 BOO（Build-Own-Operate）或 BOT（Build-Own-Transfer）的方式，去做很多文化園區或殯葬園區等等。我

發現有好多這種不同類型的政策，其實它的核心共通點都是土地開發，當時就對這件事蠻有興趣的，想要更多了解一點。還有就是自己從比較鄉村城鎮的地帶來到都會生活，對那種城鄉關係的課題有興趣，所以才會決定報考城鄉所。我在面試的時候準備的備審資料，大概就是把大學回鄉做的一些客委會的相關案件放進去，包含一些陶瓷的調查、農產品的調查等。還蠻幸運的就是有這個緣份，可以進城鄉所來念書。

我是一直到念大學才離開我的家鄉，在我的生長環境裡面，父母都是講客家話，一個是頭份人，另一個是苗栗市人，所以我覺得我在面對「鄉土」這件事是比較有感情的。相較於苗栗的北部地區，頭份與竹南可能受到竹科衛星城鎮的擴散效應，所以變化蠻大的；苗栗的南部地區，我居住的苗栗市其實差異不大，甚至產業不斷的在空洞化，人

口也不斷的流失。當然，一體兩面的就是有一些傳統的文化，甚至一些生態的條件，反而會因為這種開發動力的缺乏、人口組成與社會組成的相對封閉，

而可以保持得比較好。我印象非常深刻，去年回到家鄉的機關服務，在機關裡面跟長官討論公務都是講客家話，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經驗。

關於論文：地方政治議題的難處

我的論文題目²原本想處理很多的開發案，因為對派系政治很感興趣，也因為家庭的關係，或多或少可以知道一些相關的資訊，所以就一股腦的往地方政治與治理結構這些東西去發展，可是後續發現，只要牽涉到比較敏感的利益關係，就我當時的生命經驗跟累積的人脈，甚至一直到現在都是做不出來的。

我的其中一個口試委員是楊友仁老師，當時我跟我的指導教授王志弘老師，一直反覆的在討論楊老師探討南科開發案的治理結構與政權理論的期刊文章³，後來才知道他之所以可以寫出很具體、很富創意的內容，比如那些政治聯盟如何去操弄這些政治工具，是因為當時可能楊老師本身就身在那個規劃的過程當中，並在這個脈絡下認識了這些關係人。

換句話說，他跟我在進行研究的背景是不同的，我作為一個小小的研究生，完全沒有那樣的背景跟場域，去參與這些開發計畫。那時候王老師就反覆問我：「你真的確定你做的出來嗎？你真的確定嗎？」，每個月幾乎都會問一次。果然老師的直覺是對的。真的去訪談的時候可能

都可以找到很漂亮的對象，像是議員、處長、副處長或科長等等。可是這些人的社會經驗非常豐富，他們在公家機關，甚至在社會上走跳的時間真的多很多，怎麼樣去操縱話語，怎麼樣去判斷能講或不能講什麼東西，甚至如果要講，要跟你講到什麼程度，要用什麼措辭、語氣，他們都太有經驗了。講好聽是有智慧、有手腕，講難聽就是滑頭太多了。你會覺得訪談怎麼好像抓泥鰍一樣，明明好像有抓到，但是一看又什麼都沒有（苦笑）。

我後來反思，很多時候反而是一些小的承辦人、層級沒那麼高的主管，他們反而才可以跟你講你想聽到的事情，但當然也有可能沒有辦法查證。這就是做地方政治相關題目的一個難處，也是我一直最想要跟同學們分享的：在選擇訪談對象的時候，不用太執著於要找一個很大牌的。有時候你問的東西反而是越大牌的越不會跟你講，雖然這也是要依各個同學的論文題目而定，至少我的題目在這點上讓我覺得挫敗感很大。真的要相信指導老師的判斷，他們在指導、處理論文與期刊的經驗絕對比你多好幾倍，所以他們有那個敏銳度，去分析一個題目到底能不能操作。

¹ 不過，近年也持續面臨不動產或各類開發行為的壓力，就在這個月，苗栗市一處日本時代的指標性古窯剛被拆光。另外，苗栗縣這種丘陵山窩多而人稀的地帶，也是濫倒事業或開發廢棄物的熱點。

² 林辰（2022）《土地開發的程序政治：苗栗縣空間規劃的庸屬化與離地化》，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³ 楊友仁、蘇一志（2005）〈地方成長聯盟轉化與空間治理策略：以台南科學城為例〉，《都市與計劃》32(1)：1-23。

給王老師指導的那段時間，他就有反覆講到題目要做得「小而巧」，除了好操作之外，就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每一個議題、材料都像一個精雕細琢的小盒子，都可以繼續再打開發展，而且做得小而巧，累積到後面其實份量也是蠻多的。做大的話可能俄羅斯娃娃打開兩層就沒有了，哈！

此外，能趕快把計劃書寫完，即早的進入田野，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很多你幻想的東西進到田野之後都會

論文就是不斷累積

在那麼多修課經驗裡面，我對空間政治經濟學這類型的課比較感興趣，畢竟當時選擇研究的土地開發議題，其實就是緊緊扣著政治跟經濟的關係，並且去談他們的空間生產過程。但修課方面還是會建議大家能修盡量多修一點，不只是跟你的論文有關的課。我當時就修的很懶惰，只修跟論文有關的課，可是到後來真正在進行訪談的時候，可能收集出來的素材不是一開始假定會談到的，就會沒有辦法順利操作。

比如我原本假定是要談派系的面向，可是我發現真的去做了訪談之後，收集回來的東西根本沒有辦法支撐我去處理這個事情，反而可以談的可能是另外一個面向。但是，這時候如果你有多修原來沒有預設會修的課，它可能就會有機會幫助你解決這一塊。所以如果能從頭來過的話，我會多修很多課。

我當時還很浪漫，在「空間的社會分析」的每一次小作業，都各寫了一個開發案，總共寫了好幾個不同的

發現是假的，都會被推翻，趕快進入田野其實就是在幫助你爭取後續調整論文的時間。我當時就是太晚進入田野，所以其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讓我再好好的去調整。能訪談就趕快去訪談，能寫字就努力去寫字，當然，同時要照顧到研究倫理的課題。我當時就是逃避訪談、逃避寫作，就讓指導教授帶來很大的困擾，畢竟寫論文不只是自己的事。總之，我事後覺得真的不能太高估自己，覺得一定要做到很厲害，其實把論文寫完就很棒了。

開發案。可是這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我的東西都沒有辦法累積，變得很零碎、很片段。後來真的要推展論文的時候，給我自己帶來蠻大的麻煩，變得事倍功半。所以我覺得，應該針對自己論文的田野跟領域持續的累積，不要讓它變得太斷裂。



▲曾作為小作業题目的苗栗高鐵特定區，居民利用人煙罕至的廣場曬蘿蔔乾。

實習雖然有些遺憾，但是過程才是最珍貴

我的實習課包含高階實習大概兩年，是跟著陳育貞老師到基隆的暖暖進行社區參與式空間改造。我記得當時我們組覺得基隆有很多山坡地的聚落，是組成基隆的一個很重要的面向，所以想說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面向做些什麼。當時我們考慮了很多地方，後來選擇暖暖是因為有暖暖老街、暖東峽谷，以及跟隨整個基隆河流域的茶葉與煤礦的開發歷史。但它在市鎮化的過程中，面臨發展重心轉移到新興住宅區而沒落的情況。另外，我們會選擇暖暖也考慮到交通情況，因為暖暖火車站一出來就是老街，老師從宜蘭往返也比較方便。

當時我們找到一個社區，剛好在活動中心有定期的老人共餐活動，就決定先契合著當地長者的生活習慣與節奏，

在老人共餐的那段期間去做訪談。請里長或阿姨們分享一下他們的故事，我們也分享了我們眼中的暖暖，辦過故事工作坊。後來我們得知活動中心的廚房因為一些建管、土地使用的問題被拆掉了。同時，我印象中基隆還有來自內政部的社區規劃師補助，所以我們經過分析，決定來改善活動中心旁邊的一些小空地，變成一個同時還有廚房的小公園。因為我們認為這個活動中心是暖暖的一個很好的社區互動點。

當時操作的強度很高，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大雷雨，我們從公館樓叫計程車，把設計模型從公館、基隆路一路送到暖暖開工作坊，中間接連開了兩三次都沒睡，好像47個小時沒洗澡，非常非常搖滾。但工作坊與規劃設計做完之後，我們原本是希望能繼續推進，但地方的頭人或居民可能有不同的想



▲當時實習小組與老師在空間工作坊中，利用模型與居民討論空間活動。

法，所以就無疾而終了。就像前面提到的，小時候很多事情是聽不懂的，可能就字面上或口語上能明白他的用詞，卻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覺得地方對我們那麼好、那麼友善，應該是做的起來；直到長大了點，才會發現那些比較有社會

經驗的人，都會有他們自己的盤算。我當時就覺得如果有些頭人再加把勁，也許就能推動成功，但畢竟地方居民才是真正生活在那邊的主角，很多我們自己覺得正確的事情，並不一定契合他們的考量。

在地方談參與

我碩士畢業之後先去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當時剛好碰到地方選舉，我們所上的劉育育同學後來選上苑裡鎮的鎮長。就想說好像是一個機會，可以去公所看看台灣基層單位的情況。雖然我不是在苑裡長大，但多少跟爸媽去觀光過。所以退伍前就先跟公所聯繫，等一退伍就去面試，租屋處找好之後就到苗栗的海線工作了。苗栗的海線有四個鄉鎮，由南到北是苑裡、通霄、後龍、竹南，主要是講台語的人居多，除此之外大部分就是講客家話，還有些山區是賽夏族與泰雅族的朋友居多。我這個「苗栗國」人在苑裡，都會有種從山城出國的感覺，我的台語便是在苑裡練起來的，雖然仍舊不輪轉。公所處理的事情很貼近民眾，我在苑裡工作的時候就發現，其實很多鎮公所會處理的事情都很值得做研究，寫成論文。

比如說我當時有些業務是自來水公司、台電或中華電信的案子，這些單位常常會需要幫新興的社區建案在道路下方挖管溝、埋管線。很有趣的就是你會發現，原來我們每天行駛在道路上，常常會一直罵路怎麼鋪得那麼爛，其實不是只是在消化預算，很有可能是當地有一些新的社區有這個

需求。我當時就很常去看他們進行道路施工，包含承接他們要辦相關作業的申請，以及去看他們挖完之後有沒有好好把瀝青填回去，就是很多這些跟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業務。

當時另外一個工作的重點是辦大型的工程專案。因為基層的公所自有財源比較少，所以通常都是用中央政府補助的預算，去做這種大型的工程專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道路工程專案，還有些是公園的景觀工程等。當時公所就在想，如何在既有的制度下去推動參與，



▲驗收時須確認管線單位施作的鋪面平整度及標線復舊。

可能是寫在工程的契約裡面，讓廠商或設計顧問公司來執行。比如規定最少要辦幾場參與的工作坊，讓居民可以知道這些工程的資訊，並且是在規劃設計階段就進行。通常這些公共工程的專案是分成兩個標案，第一個是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標，通常包含工程監造，第二個就是工程標。

總之就是寫在規劃設計標的勞務契約裡面，在制度上要求他們要辦工作坊。只是我覺得在基層公所真的要像以前在城鄉所，有那麼高強度的參與，其實非常困難。我們當時在實際的推動過程中，發現廠商可能並不了解什麼叫做參與的工作坊，他們可能就會把它想成是一個政策的說明會而已。另外，工作坊的選址與設計也很重要，

所謂參與，在體制內

我後來覺得參與是一件很「貴」的事情：首先，參與本身是一門專業，它其實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識基礎。要讓一般民眾真的進入到這個空間生產的過程當中，其實非常困難，參與有其自身的專業技術⁴門檻；其次，推動參與也需要一定的財務與資源。因為從前期籌備到真正開始舉辦，包含場地、宣傳與時間的確認，都需要時間及資源的開銷。以前我們在城鄉所，都會把參與奉為教條，覺得一定要付諸行動、予以實踐。但真的跨出同溫層之後，我的感受是這個東西真的沒有那麼簡單，如果要讓參與有其成效，

因為過去的工程都不會有這種參與的習慣，所以居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甚至你沒有安排點心的話，人家就不會來了。當時還有其他的單位，就直接選在有民眾打球的運動公園舉辦工作坊，成效就不錯。但我有些案子是在偏郊區的地方，來的可能就是里長、民意代表而已。不過政治人物講的內容往往跟真實居民所需有落差，我們想要去理解民眾的生活節奏、日常生活的使用需求，就不能單純採用代議政治結構，取代這些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後來回到苗栗某機關工作，是因為家庭的緣故，就從苑裡回到了苗栗市。我覺得蠻好笑的，因為一直都在批判性研究該機關，結果後來到了該機關工作，總之每天都在反思這件事。

是需要有專業技術、經驗的累積，以及財務、資源的相輔相成的。

最後是制度的門檻，我們當時有把舉辦工作坊寫在契約裡面，或多或少就是希望能改變一些既有的制度。但是假如今天是中央的經費，地方只做為執行單位，可能就會碰到一些困難。

中央經費的運用有一個特性，就是會有很嚴格的期程限制。今天中央機關編列多少預算給地方，同時就會規定一定的時間，要完成可能30%、50%、90%，或什麼時候工程就要全部結案，再依進度來請款。但如果今天你沒有達到它的進度，它可能就會因為你的執行進度不理想，要求你後續

⁴ 此處的專業技術是指，讓民眾能融入空間生產過程中的技法與技術，簡言之，是「推動參與的專業」，而非法規、統計、繪圖、測量等等專門技術。

經費由地方機關自行籌措。但地方怎麼可能生得出錢呢？但當然，所處位置的不同，總會碰到不同的壓力。假如我是中央機關的承辦，那我對應到的就是立法委員的監督，立法院核准那麼多經費，結果執行率太難看，這筆經費可能之後審預算就會被拿掉。

換言之，我覺得整個制度面與組織面，其實對參與是非常不友善的。當我們的公共工程機制都在講求時間、

公務單位這件事

到目前為止會選擇去公家機關，除了是跟家庭妥協，可能是因為還是對公共事務比較有熱情。但如果回歸到想要推動公共事務，或想要推動某個議題這件事，我覺得公部門或許不是最好的選擇。我印象非常深刻，有個比我年長大概十歲，歷練非常豐富，長期在地方做抗爭的朋友，得知我要到公家機關服務時就我講說：「你要去做公務員喔，你會過得很不快樂喔，你自己要有心理準備。可能要你做的事情，機關必須要推動的事情，都跟你的價值觀會有衝突」。

自己這三年走下來，這種自我與外在的衝突，在不同機關之間還是有程度差異。我覺得最大的共通點是，只要進了政府機關，因為機關它有業務的定位跟屬性，所以勢必要跟隨著它的條條框框來行動，你就是一個螺絲或齒輪。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很浪漫的，去跟民眾做高強度的參與式規劃，或是很縝密、很

金錢與操作執行上的確定性，希望有統一的標準普及到各處，那我們所生產的公共空間，勢必會與地方及居民產生脫節的。因為地方實際的空間或生活需要，以及參與這件事往往是充滿不確定性與異質元素的。尤其是在自有財源沒有那麼充足的地方政府，它需要運用中央預算所推動的公共建設，就會碰到這樣的課題與矛盾⁴。我覺得這是一個迫切值得思考，甚至作為論文題目予以理論化的議題。

詳實的把民眾的日常生活、不為人知的課題發掘出來。至少就我的經驗，作為一個行政性質的承辦人員，機關可能不會賦予你這樣的主動性去做這些事。社會上有沒有一些其他位置可以推動公共事務我不太清楚，至少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在比較有城鄉所色彩的顧問公司工作，他們還是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在公部門服務一樣有個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種話中有話的情境。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建議，訪談的時候不要太崇拜某些地位崇高的人，畢竟他們要唬弄你實在太簡單了。以前我這三年的工作經驗，常常都是被人家欺負了，自己還不自覺，還笑著跟人家說謝謝。

不過這就是經驗的累積吧，在互動過程中，你會不斷的思考對方的表達背後到底隱含了什麼意思，有什麼考量。進而回到自己在做相關的公務推動時，要去判斷這件事情我要如何表達、能講

哪些東西或不能講哪些東西、對某人能講哪些東西或不能講哪些東西、我對某人要用什麼樣的詞語或語氣，甚至要在什麼樣的地點或時機講。我覺得這些非常內耗且痛苦，雖然民間企業或許也是這樣，蠻無奈的。

我很常想到王志弘老師在入學第一天講過的一句話，他說：「各位同學，恭喜你們進入了城鄉所，但是我要跟你們說，你們來這裡唸書，可能

無奈與幽默

接受訪談的此刻，我自己也還在思考這些議題，甚至這是我畢業以來，第一次有這樣的機會好好停下來，想一想這些議題。可能很多東西都還沒有想清楚，並且每天都有新的疑問，時不時就跑了出來。不過，我很喜歡《城鄉通訊》第28期，高郁婷學姐的分享，我記得學姐想表達的是，你雖然不知道自己什麼，但你能比較清楚知道自己不要什麼，進而把它從人生清單劃掉。我一直到畢業後這幾年才想通，既然不知道自己什麼，就更值得把握比較年輕的時候，應該把握自己還在學的時候，多去嘗試。

寧願抱持著懷疑，寧願抱持著疑惑，努力的往前走，努力的去看看、去闖一闖，去看看更多不同社會的角落、不同的社會群體。因為倘若什麼都不做，懷疑與疑惑還是存在，不如好好出去碰撞，說不定你對這些疑問會有解答，甚至人生會有不同的發展方向。我近日也才體認到，不是每個疑惑都會也都要有解答，但是嘗試與

不會讓你感到更快樂，你的人生會有更多的無奈」。就像我前面所提到，八九年前的我聽不懂老師想表達的意思，但當你把城鄉所教給你的東西當一回事，認同其中的價值，並重新踏入社會，你就會明白其中的無奈之處。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還可以接受，能夠釋懷。但對我而言，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總會思考起這些事，擔心選擇公部門的自己會不會越活越犬儒。

探索的過程，會帶給你不同的見解與體悟。它使你看待這些困惑的視角有所轉化，嚐到不同的滋味。

最後，人生雖然常常感到無奈，但是我選擇讓它幽默一點，畢竟每天都那麼辛苦，不如把自己的苦化為一種迷因自娛娛人，是不是比較快樂一點呢？當然，認真的事情還是要做，會無奈就代表有在意的，幽默則可以持續灌注熱情在這些事情上，讓自己走得更長遠一點。

⁴ 曾與王老師討論過，這種公共工程有限的社會參與，或許正是支撐地方政權壟斷並分派公共資源的制度及物質基礎。

社會行動

上來瞧橋：

從天橋與圓環看臺北市失效的公共空間政治

2024年10月，一紙A4大小的公文悄然被貼在和平新生天橋的樓梯轉角。一名路過的在地居民偶然瞥見，頓時大為震驚，因為那張紙上赫然寫著：11月4日將拆除天橋。這樣突如其來的消息，竟未曾在大安區的任何鄰里公告中傳達。該名居民隨即以掛布條、舉辦天橋藝術行動等方式，成功喚起了在地居民與媒體的注意，一場未曾預期的抗爭行動就此展開……

▲圖1 橋墩拆除時還留著的「我們反對強拆」——圖片來源：林玟君提供

天橋爭議脈絡

和平新生天橋，自落成以來已靜靜矗立四十年，成為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座天橋之所以獨具意義，其中一項關鍵即是它在影像文化中的高頻率曝光：包括李安、楊德昌等知名導演，以及多個國際影視製作團隊與藝文創作者——如五月天、楊乃文、鄭怡、持修、美秀集團等，皆曾選擇此處作為拍攝場景。天橋因而逐漸嶄露於國際視野，成為外國觀光客造訪台北的熱門地點之一，也讓這座原本樸實的橋樑在城市文化地景中佔有一席之地。

若親自踏上橋面，不難理解其受到攝影愛好者青睞的原因。天橋擁有遮蔽功能的屋頂、等距排列的框架結構，加上具層次感的迴旋樓梯，共同構成視覺上和諧且富有深度的空間感。這不僅為

拍攝創作提供了理想場域，也成為城市中少有的靜謐觀景平台。而對周邊居民而言，天橋不只是交通設施，更是一段段生活軌跡的交會場域，從孩童往返學校、公園，到長者的日常散步、情侶的駐足片刻，它早已深植於社區記憶之中。

然而，在市府提出拆除計畫後，官方以「人本交通」為原則，主張此類結構屬於過時產物，既不符使用效益，亦耗費維修資源，應予汰換。交通局進一步引用事故統計數據，指出天橋對視線產生阻礙，甚至可能導致車禍。但此種說法是否經得起檢驗，卻鮮少被深入討論。例如，若行人穿越線設於橋柱之前，肇因是否應歸咎於橋體設計，抑或駕駛行為未符安全規範？這樣的問題反映出一種簡化責任歸屬、忽略複雜因素的政策傾向。



▲圖2 抗議標語與天橋取景影視作品張貼 | 圖片來源：莊詠竹拍攝

我們並非反對人本交通本身。事實上，作為規劃或設計背景的實踐者，我們理解推動良好都市視野與改善通行環境的重要性。但設計並非唯一標準、交通也不只有一種實踐方式。正因如此，天橋守護團隊積極提出替代方案，嘗試針對市府原有論述進行回應與擴充。然而在整體決策過程中，民眾能發聲的場域極為有限，往往只能透過零星的說明會或社群平台爭取關注。

遺憾的是，市府所關注的，往往是可見的、短期的成果，那些所謂的「近未來」效益；而居民在意的，則是延續地方文化脈絡與記憶的「遠未來」可能（呂欣怡，2020）。當文化保存無法迅速轉化為可計量的政治聲望或經濟利益，它便從政策優先序列中消失。於是，文化論述與工程語彙之間出現鴻溝，缺乏交集、難以對話。即便民間團體不斷



▲圖 3 居民與守護天橋團體提供的交通改善方案
| 圖片來源：下一代人本交通促進會提供

試圖靠近技術層面，想要用專業語言加入辯論，仍舊難以打破那堵制度性的沉默牆，因為關鍵問題從未是「技術無法對話」，而是「權力不願對話」。



▲圖4 市府臨時舉行的拆除說明會抗議 | 圖片來源：楊晏豪拍攝



▲圖 5 天橋存廢爭議關鍵字 | 圖片來源：陳毓文繪製

天橋行動的田野觀察和心情寫照

在城鄉所於「白晝之夜」首度發起天橋藝術展後，大安區居民迅速展開自發行動，並共同提出「天橋的一百種想像」作為行動的核心概念。除了每日皆有當地居民自願巡邏，不久便有居民發起「天橋咖啡日」，也有來自影視領域的街坊發起人邀請七位 DJ，舉辦為期兩天的「天橋 House Party」。書店經營者更將整箱書籍與椅子搬上天橋，打造出臨時的「天橋書房」；民眾則自備野餐墊，規劃出「發呆區」、「躺臥區」等自在空間；甚至還有畫者提供現場免費素描，為路人留下紀念（陳毓文，2025）。

短時間內，這些活動一一落地，宛如一場自發性的都市節慶。許多構想僅在社群聊天中短暫醞釀，便迅速變成現實。這股活力，或許正源於拆除壓力與里長不支持的雙重刺激，使居民間激盪出超乎預期的集體創造力，也讓我們見識到城市中平時隱而未顯的行動能量。

至於我自己，起初其實對這座天橋並沒有太深刻的感情連結。加入守橋行列，某程度上是出於同儕間的支持與互助，而非出自強烈的個人信念。更何況，「都市景觀」或「天際線」這類議題，本身就帶有高度主觀性。從城市規劃的角度思考，我一度認為拆除與否各有其合理性。就如景觀學會所指出，若單從功能與效率出發，拆除的確不無道理；但若涉及歷史與文化價值，則需更多層次的闡述與說明（陳毓文，2025）。

這些價值，正是在拆除說明會上、在居民自發行動的溫度中，才逐漸被我所體會與理解。也正是在那段期間，我才真正感受到這座橋與人的關係，原本與我生活幾乎無交集的建築，竟能在公共情感的牽引下，重新與我產生意義的連結。

在 11 月 19 日之前，無論是市府辦理的拆除說明會、記者會，還是文資現勘程序，都未對拆除進程構成任何實質

阻力。市府內部一律將其視為「已完成溝通、定案執行」的既成事實。這也導致了台北市有史以來最快速的文章現勘安排與審議結果，快到公文尚未送達發起人住家，天橋樓梯便已全面封閉，施工工程隨即展開。里長未接獲通知，現場的百名警力與施工人員皆為臨時調度，就連公車司機也在當晚才被告知需臨時改道，整體毫無預警與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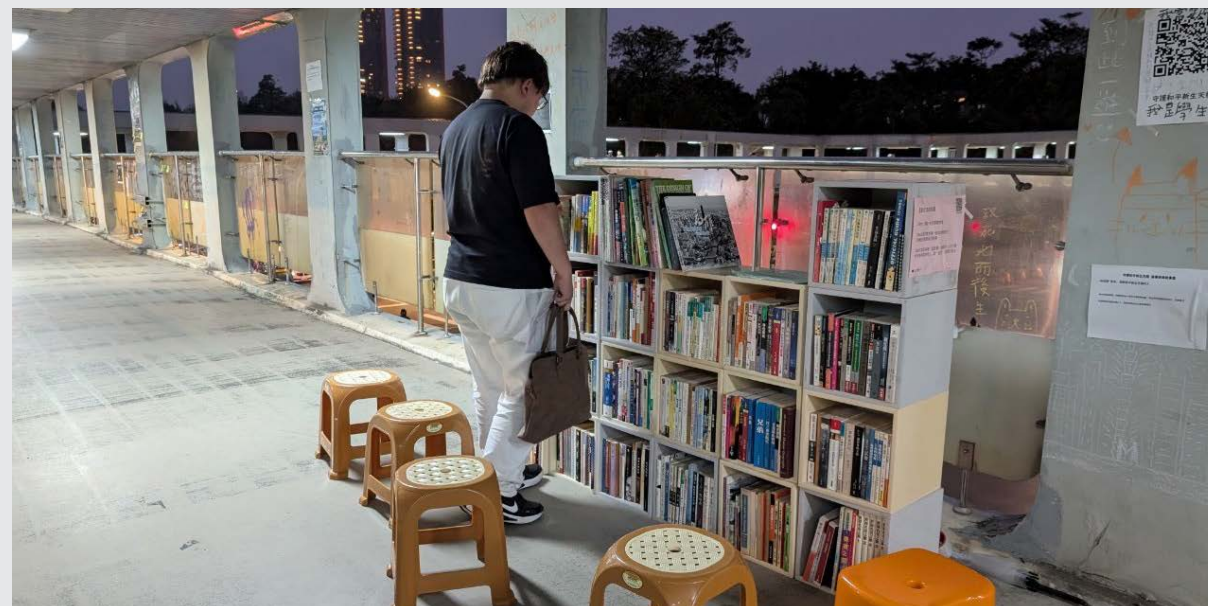
在如此倉促而混亂的程序中，所出現的諸多行政瑕疵，未來皆有檢視與追究的必要。天橋議題本可大可小，最終演變成一樁需要跨局處首長、市長親自回應的公共爭議事件。此事引爆大安區居民的高度關注與社群媒體的強烈反應，多次登上新聞版面。整體過程市府呈現出一種莫名的「緊急動員」與「強勢執行」姿態，從一開始便未展現出任何實質溝通的誠意，所謂的「程序」僅止於形式上的表演。更甚者，當民眾尚未完全理解整體情況時，大型機具便已駛入現場，直接開始進行拆橋作業。現

場的悲情的喊話、最後一刻送別天橋的儀式、以及居民那試圖緊握最後一絲「是否還能保留」的希望，全都毫不掩飾地呈現在場景之中。當下市府人員冰冷態度，與居民悲傷交織著憤怒的情緒，形成劇烈對比。而來自城鄉所的學生與老師也持續在現場堅守、喊話、思考對策，直至深夜仍未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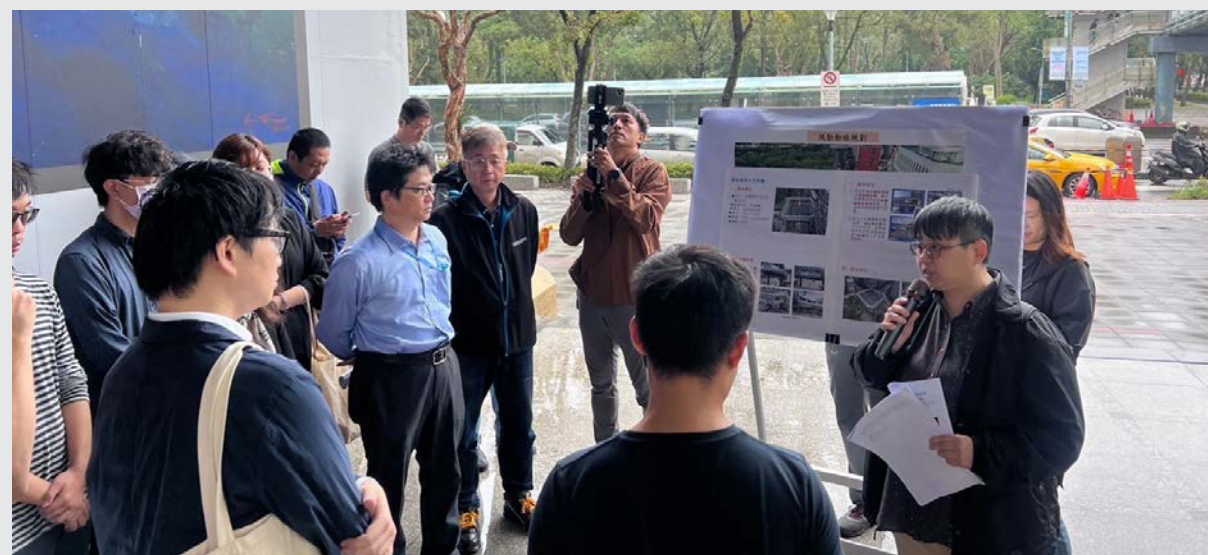
即使天橋已遭拆除，卻未徹底消失。有一段時間，拆卸下來的橋體被暫時安置在六張犁社宅旁的空地，等待後續的剝碎處理。在這段期間，雖然抗議行動的熱度有所消退，但地方居民仍自發組成「天橋活化團隊」，試圖延續這段公共行動的意義。他們主動發起串連、尋求民意代表協助，甚至展開跨區合作，成功與新工處、文化局、區公所、公車處等相關單位進行溝通。截至2025年4月的最新狀況，市府已確認將保留三座天橋遺構，並展開後續的活化規劃。這些無疑是居民不懈行動與多方協調的珍貴成果，也為「抗爭之後」留下更多可能性的空間。



▲圖6 民眾自發性提供粉筆，讓路過民眾留言、作畫、欣賞 | 圖片來源：陳毓文拍攝



▲圖7 天橋書房 | 圖片來源：蕭凡奕拍攝



▲圖8 文資現勘 | 圖片來源：莊詠竹拍攝



▲圖9 拆除當日，守護天橋團體的緊急記者會 | 圖片來源：張好婕拍攝

公館圓環看北市府的決策風格

最近，公館圓環的議題再次浮上檯面，這次決策者對於圓環的處置似乎給出了明確的指示，讓人不禁聯想到當初和平新生天橋拆除案的決策方式。然而，在蔣市府的任期內，許多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顯得急迫且充滿爭議。

市長蔣萬安首先於個人臉書平台釋出為了「安全」而拆除訊息，但根據內部消息指出，其實當天市政會報上僅剛開始討論圓環改善方案，尚處於紙上談兵階段，連基本的規劃案都尚未完成招標，卻很快地公布了拆除的做法。看到這裡，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如果規劃尚未發包、研究尚未展開，市府又尚未掌握各種替代方案與評估結果，那麼「拆除」這一選項究竟基於何種依據？變為正交路口真的可以解決塞車、減少車輛交織風險又能取消機車待轉嗎？目前仍

無具體規劃內容與完整評估可以回應。即便詢問交通局長，他恐怕也無法給出具體承諾。根據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於2020年的評估報告指出，若在該路口允許機車免待轉，將導致大、小客車行駛速率降低，並增加機車與直行車的交織風險，反而可能造成事故機率上升（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2020）。換言之，即使圓環轉為正交路口，仍可能因交織風險而要求機車繼續待轉，原本預期要解決的問題便無法真正改善。當一座本可依原線道順利轉彎的圓環尚被視為危險時，拆除後改為路口型態，其交通安全與流暢性的提升是否成立，仍大有疑問。多項核心問題目前尚未有答案，甚至可能根本無法被解決。

當初市府以「安全」為由，決議拆除已使用四十年的和平新生天橋，並以「人本交通」作為政策口號，陸續推動

台北市多座天橋的拆除工程。然而，這類決策往往欠缺完整的規劃評估與科學依據，未充分考慮地區實際交通流量、文化背景、居民日常記憶與社會觀感，甚至未能明確說明拆除後是否真能改善交通狀況。許多民眾因此感受到這些政策顯得倉促，似乎更像是在展示行政魄力，而非經過深思熟慮的城市治理決策。在現任市長任內，這樣的處理模式已成為頻繁上演的治理常態。

當代都市規劃的核心課題，在於如何促成公民之間的集體協作，以共同回應社會所面對的整體性議題（Healey, 1992b）。雖然會議制度常被設計為政府部門與市民之間的對話平台，但在實務運作中，即便程序齊備、形式完備，也不代表真能反映民意。許多時候，以天橋唯一舉辦的拆除說明會來說，這類會議僅是為了完成既定程序，而非真正用以促進雙方的平等協商與討論，更何況完全不舉辦會議。

更令人憂心的，是市府背後的決策結構與制度設計。以天橋議題為例，目前新工處所訂定的天橋存廢標準如下：只要使用年限超過四十年，便可直接申請拆除（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2024）；若天橋尚未達到年限，才需經過評估流程與地方意見調查，才能進一步決定去留。也因此，和平新生天橋在制度上並未觸發「需辦理公聽會」的條件，最後也只在社會壓力下召開一場「拆除說明會」，作為象徵性的溝通場域。而像銘傳國小、行政院、平樂等天橋，亦因超過年限，被劃入可逕行拆除的名單中，全無討論與諮詢的空間（陳毓文，2025）。

這樣的評估機制，其實才是真正值得檢討的核心所在。若討論焦點只停留在某單一個案的存廢得失，便容易忽略整體制度性問題。事實上，應將視野拉回決策體系本身，才能真正針對都市設施管理與公共參與的根本問題進行修正。

對於市府決策的想法

順著前面的討論，筆者認為更合理的決策程序，應當從市府內部對該路口進行最「安全」的改善方案研究開始。應先透過調查與評估，盤點出多種可能的解方。或許，評估後的最安全選項，仍是保留圓環本體，僅需調整標線或縮減圓環尺寸，甚至取消待轉機制；若正交路口確實為最優方案，則包括待轉設計、左轉專用道、機車與汽車的交織路線等細節，也都需一併納入考量。

待多個替代方案成形之後，市府應召開公聽會，廣邀地方里長、居民、

專業團體等共同參與，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公部門在此過程中，應展現出解釋政策、吸收建議的能力與誠意，藉以辨識各方案對地方需求的符合程度。若公眾反應激烈，認為方案未能回應在地需求，則應將方案退回府內，重新檢討修正。所有決策，最終都應回到「充分溝通」與「嚴謹考量」的核心原則上。

2024年入選威尼斯影展的《青春末世物語》，劇中就深刻描繪了一種決策情境：以「安全」為名，逕行排除民主程序，在毫無協商的前提下強行推進政



▲圖 10 拆除當日守護天橋團隊舉出招魂旗
| 圖片來源：陳毓文拍攝



▲圖 11 拆除當日，大型機具拆解天橋
| 圖片來源：陳毓文拍攝

策，這樣的做法既非理性，也無正當性。而這種邏輯模式，也正可能套用於公館圓環的處理上。誠然，公館圓環確實是一個事故頻繁的路口，但若回顧和平新生天橋的前例，也曾歷經各方安全討論，最終並未發現其結構存在重大問題。當時交通局轉而主張「橋柱遮擋視線、導致死亡事故」，作為拆除正當性論述，其實本身也充滿爭議。當一座沒有安全疑慮的天橋，都能在幾乎無溝通的情況下被拆除，公館圓環作為一個高關注度、實質牽涉都市空間變動的節點，其討論空間恐怕難以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公館圓環的爭議不僅是交通技術問題，它牽涉到更廣泛的都市規劃課題。這樣的決策邏輯與話術，可能被複製到台灣其他的規劃案例中，並形塑出一種以「安全」作為壓倒一切的話語體系。作為規劃工作者，我們能否承受這樣背後的政治操弄？又是否真能辨識出「安全」的真實意涵？

天橋過 40 年了，拆除才安全。

公館圓環肇事率第一，拆除才安全。

你家房子有結構疑慮，拆除才安全。

此區容易淹水，加高堤防才安全。

此區未被規劃環境很差，重劃最安全。



▲圖 12 天橋保留的張貼與繪畫
| 圖片來源：蕭凡奕拍攝



▲圖 13 天橋保留的張貼與繪畫 | 圖片來源：蕭凡奕拍攝

天橋事件小記

「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 的相關概念中，唯有透過社會運動所帶來的群眾壓力，才能迫使遲鈍的政府與逐利的企業做出較為公正的行動選擇，進而實現公平的都市規劃似乎是易懂的。歷來的重大社會變革，往往不是從制度內部的溫和改革出發，而是經由抵抗與對抗而推動的。國家體制下的規劃行動，至多只能達到改良的層次；若真正期盼深層且根本性的社會轉型，僅依靠身處體制內、或缺乏群眾基礎的規劃者，是難以實現的。若規劃實踐者能夠積極投身於廣泛的社會抗爭，例如反全球化運動、反縮紳化等，乃至對抗企業財團的草根倡議，或許才可能培養出一種具有顛覆性與創造力的「反叛式規劃」

(insurgent planning)，這種規劃強調的是對抗主流、超越常規、並帶有想像力 (Mirafab 2009, p.32)。正義的城市

需仰賴社會運動的勝利，而社會運動的前景則取決於能否建立跨議題、跨社群的連結與聯盟。

建立能夠共享資源與策略的抵抗網絡，雖是社運關鍵之一，但並不屬於規劃專業獨有的技能，也不見得是規劃訓練的強項。辯護式規劃者所發現的，許多社區團體往往面臨更為急迫的需求，而規劃者所能提供的技術支援，其實只是這些群體在多重挑戰中「本來就需要」完成的一環。因此，更關鍵的問題不在於規劃者能否主導變革，而是能否找到參與公共政治的策略，並在這個長期不公與結構不平等深植的社會中，持續進行具有政治意識的實踐行動 (Beauregard, 2023)。

非常謝謝守護和平新生天橋於城鄉所的各位成員，能夠透過白晝之夜點燃議題的火苗。感謝發起人大安橋王、在現場拿起麥克風吶喊的高雄理事長與桃



▲圖 14 天橋 House Party | 圖片來源：蕭凡奕拍攝

園水姑娘、後段行動的主力社子島小王子、總是有閒就會上橋探看的大直學長、提供專業支援的交通團隊、藝文界的導演等等，當然還有在當前動能日漸低落的城鄉所中，仍願意挺身而出、帶著學生親臨現場的黃舒楣老師與陳盈棻老師等人。很多行動或許不需要太多實際執行的人手，但卻非常需要「看戲」的人。事實上，許多來到現場觀看、關注的城鄉所學長姐與學弟妹們，其實都大大增加了現場的動能與氣場。正因為有這些人存在，行動才得以被放大、被看見。

自 14、15 號公園的迫遷爭議以來，政府從決策到實際拆除僅歷時三個月；而在和平新生天橋案中，整個過程甚至不到兩週。這樣的節奏顯示，面對來自民間的反對壓力，政府往往不願、也不可能給予民眾足夠的時間反應與組織。因此，如何在制度框架內爭取時機、擁有相關的網絡、尋找關鍵人物、突破行政節點，往往成了一場「時也、運也、命也」的賭注。

康老師提過：「若我們真心想要為某個議題發聲、試圖改變現狀，那麼無

論情勢多麼不利，都必須嘗試。」唯有行動，才可能創造翻轉的契機。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必拘泥於傳統或制式的抗爭模式，有時也許正是那種不按牌理出牌的創意與行動，才能在夾縫中撐出空間，讓改變真正發生。



▲圖 12 天橋拆除工程施工告示牌 | 圖片來源：賴彥霖拍攝

參考文獻

Healey, P. (1992) Planning through Debate: The Communicative Turnin Planning Theory. *Town Planning Review*, 63, 143-162.

Mirafab, F. (2009). Insurgent planning: Situating radical planning in the global south. *Planning theory*, 8(1),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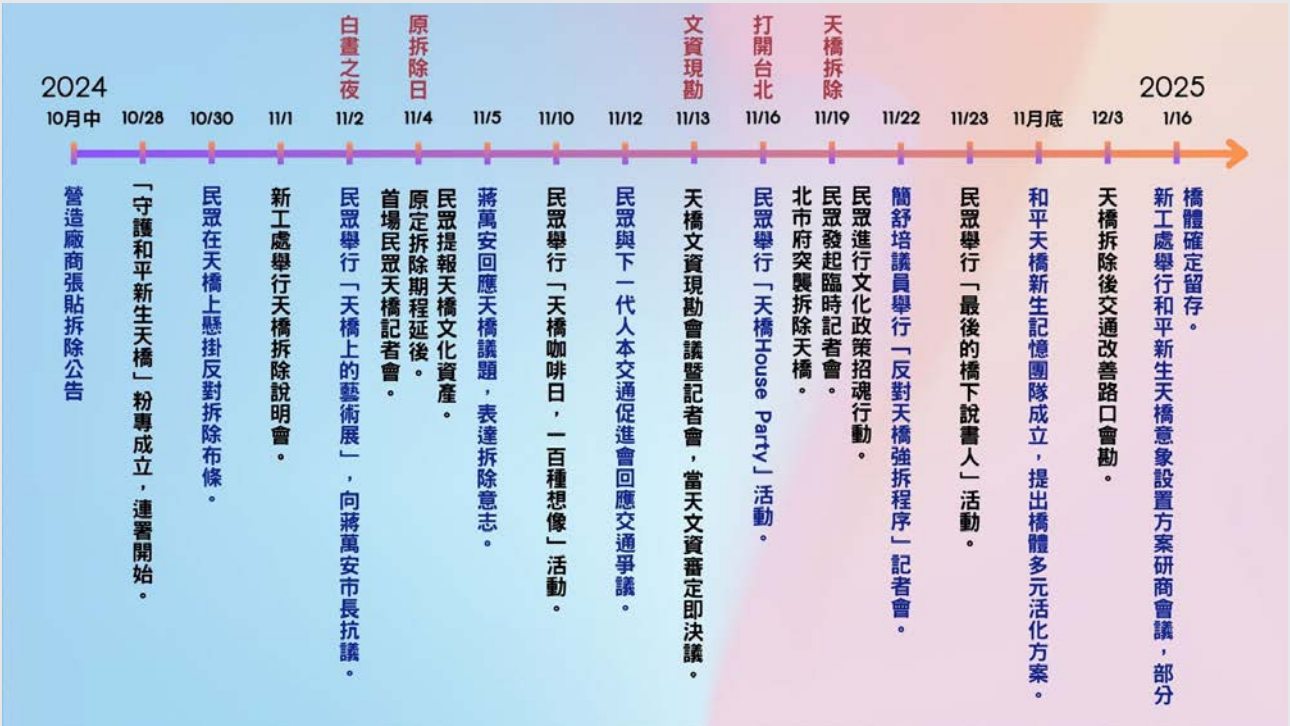
Beauregard, Robert (2023) 《規劃理論的進階導引》(錢伊玲、王志弘譯)。群學。

呂欣怡 (2020) 〈會議做為未來時間性的匯集與競逐：臺灣離岸風電環評的民族誌分析〉。《臺灣人類學刊》18(2)：79-128。

陳毓文 (2025) 〈既不平也末新生的天橋強拆爭議：保存行動與都市景觀的政治辯證〉，眼底城事。<https://eyesonplace.net/2025/04/11/27746/>，檢索日期：2025/4/18。



▲圖 15 和平新生天橋一景 | 圖片來源：黃智遠拍攝



▲圖 16 和平新生天橋事件大事紀 | 圖片來源：陳毓文繪製

城鄉評論

都市邊界：橫濱黃金町、壽町與港未來的空間分隔與融合

◎撰稿：柳瀨葵

一、前言

橫濱市作為日本重要的港口都市，其都市結構與經濟發展歷程長期受到產業轉型與都市計畫的深刻影響。在此背景下，黃金町與壽町成為兩個具有鮮明對比的區域：黃金町因違法性產業的聚集而具爭議性，但近年來透過藝術再生展現了復興的可能性；壽町則以日雇勞動者的社會弱勢特徵聞名，長期面臨經濟困境與社會排斥。然而，伴隨著 1980 年代橫濱市政府推動的「港未來 21 計劃」（橫濱市都市整備局，2024），這兩個區域不僅面臨來自都市再開發的壓力，還與港未來地區的高端經濟與商業發展形成鮮明對比。

大學時期的經歷讓我對這三者之間的張力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在黃金町，我參與了友人藝術工作室展覽的策劃工作（Koganecho Area Management Center，2024），親身感受到藝術如何成為激活社區與消解污名的重要力量。同時，作為壽町每月炊食活動的 NPO（「寿炊き出しの会」，2024）志工，我目睹了日雇勞動者的生活艱辛以及 NPO 為改善他們

境遇所付出的努力——這些活動不僅提供了物質援助，也讓社區居民與日雇勞動者建立了相互支持的關係。

然而，這些自下而上的在地努力，與自上而下推進的港未來 21 計劃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對比。港未來 21 計劃以高端化、全球化為目標，成功地為橫濱市帶來了商業與旅遊的繁榮，但同時也加劇了都市內部的資源分配不均。我親身感受到，這種對比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黃金町居民為保存地方文化而努力，壽町的日雇勞動者卻在社會邊緣掙扎，而港未來的摩天大樓則成為一種遠不可及的象徵。

本文章將以黃金町與壽町的歷史與現況為切入點，結合參與在地活動的經驗，探討這些區域如何在「港未來 21 計劃」的框架下進一步邊緣化，並分析都市再開發過程中現代性與邊緣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本文希望透過對這三者關係的深度剖析，揭示橫濱市都市空間發展中的不平等現象，並為未來的都市計畫提供批判性反思與建議。

二、橫濱黃金町風俗街的重組：拜拜作戰對性產業從業者的影響

黃金町的違法性產業其歷史可以追溯至江戶時代黑船來航後的社會動盪與經濟結構轉型（太田久好，1892）。在此歷史背景下，作為邊緣化經濟空間的黃金町逐步形塑為吉原街，成為集非法性產業與社會底層勞動力再生產於一體的空間載體。此種空間形態不僅滿足了當時城鎮化進程中被排除於主流經濟之外的群體需求，更透過其非正規性質與主流社會的規範體系形成了權力的對抗性結構。

進入戰後時期，黃金町再次因應國際權力格局與地方經濟結構的變遷，成為服務駐日美軍軍人的性產業聚集地（小泉勝夫，2003）。此過程中，性服務產業的合法化與非法化之間的模糊地帶，實際上揭示了權力機制如何透過空間治理與符號操作來再生產社會秩序與經濟利益。黃金町的空間功能在此歷史階段呈現出高度的去領

域化特徵，既作為美軍需求的附庸經濟體系，又成為地方經濟依賴的基礎。

橫濱市中區的黃金町地區曾是非法賣春宿集中地，特別是在京急線黃金町站至日之出町站的高架橋下，約 500 米的範圍內聚集了超過 250 家被稱為「ちょんの間（短時間性服務小屋之意）」（Kawasaki, T., 2020）的小型賣春宿。這些店鋪在 20 世紀後半期迅速發展，成為關東地區最大的違法風俗產業聚集地。

然而，隨著社會對違法風俗行業的批評聲浪增加，警方於 2005 年展開了名為「Bye Bye 作戰」（神奈川縣警察，2024）的集中掃蕩行動，對黃金町地區的非風俗店進行了一次全面取締。在這次行動中，絕大多數非法賣春宿被迫停業，許多業者選擇退出該行業，但也有部分業者將其業務轉移到鄰近的地區（例如曙町等合法風俗區域）。



▲圖 1 從黃金町約 1.5 公里外的橫濱市中區曙町外景（2024） | 圖片來源：筆者提供

「Bye Bye 作戰」作為 2005 年橫濱市警方對黃金町非法風俗店的大規模取締行動，對當地從業者的生活與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下是基於一位神奈川出身的前成人影片演員 M 小姐的案例（Heartful World，2024），探討該行動對個人層面的衝擊及後續變化。

M 小姐在「Bye Bye 作戰」之前，已在黃金町的一家店工作兩年。由於她有一定的信用卡債務壓力，該工作成為她維持生計並償還債務的主要收入來源。然而，「Bye Bye 作戰」徹底關閉了黃金町的非法風俗店，迫使她隨店遷往曙町繼續從業。她描述道：

「當時的債務壓力讓我無法停止工作。在黃金町工作的環境比較穩定，但搬到曙町後，一切變得更加困難。新環境的競爭激烈，工作時間延長，精神壓力也隨之增加」（Heartful World，2024）。

該案例反映出「拜拜作戰」雖然在改善城市形象方面具有正面效應，但對從業者的個人生活卻帶來了顯著的負面衝擊。尤其是，行動的結束並未伴隨系統性的轉業支持，許多從業者在失去工作後不得不面對經濟壓力與身份認同的雙重挑戰。一些業者選擇轉移到合法風俗區，如曙町，另一些則試圖再試。

黃金町管理中心（Koganecho Area Management Center）成立於 2009 年，旨在解決當地因非法風俗業導致的負面形象問題，並透過藝術與文化振興推動社區可持續發展。該中心選擇以藝術為核心策略，不僅用於吸引外部資源與遊客，也希望透過創造性視角解決社區問題，促進居民、藝術家與觀光客之間的交流。

黃金町管理中心的理事長指出，成立這個 NPO 的初衷在於應對黃金町長期以來的非法風俗業問題以及因此帶來的社會

與空間形象劣化。他認為，「僅僅依靠行政的「淨化」手段不足以帶來根本改變，而是需要通過更積極的方式讓社區重拾活力」（Koganecho Area Management Center，2024）。因此，他選擇以藝術作為核心手段，希望通過藝術的創造力與感染力，不僅改善地區形象，還能吸引外部資源，為當地居民創造新的可能性。

理事長強調，藝術之所以成為關鍵策略，是因為它能夠打動人心，改變人們對黃金町的固有印象，同時為地區注入新價值。他希望以藝術為橋樑，建立一個能夠讓居民、藝術家和訪客共同參與的空間，從而實現社區的長期復興與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最終促成了黃金町管理中心的成立，並成為該地區轉型的重要推動力。

三、曙町與日雇勞動者：空間、經濟與社會的交織

橫濱市中區的曙町長期以來被視為「日雇勞動者之街」（小泉勝夫，2003）。這一稱號並非偶然，而是多種歷史、經濟與社會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曙町位於橫濱市中心的中區，其地理位置具有顯著的戰略性：北接以藝術

再生聞名的黃金町，南鄰以高端商業與國際化定位著稱的港未來地區。這樣的地理格局使曙町成為一個獨特的過渡空間，不僅連接了以過去低端勞動力為主的曙町，還與追求現代性和經濟繁榮的港未來形成鮮明對比。



▲圖 2 原黃金町非法性服務店位置與現在的地址 | 圖片來源：google map（2024）。筆者繪製



▲圖 3 曙町的清晨風景外景（2024） | 圖片來源：筆者提供



▲圖 4 壽町的簡易宿設垃圾場（2024） | 圖片來源：筆者提供



▲圖 5 排隊領取伙食的日僱勞動者 | 圖片來源：神奈川新聞社提供

壽町的形成與發展可以追溯至二戰後日本的戰後重建時期。隨著國家經濟的復甦與基礎設施的重建需求，建築業和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大量短期且低成本的勞動力。作為港口城市橫濱的重要節點，壽町以及鄰近的黃金町迅速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尋求臨時工作機會的勞動者。同時，壽町的地理位置靠近港口和城市交通樞紐，為勞動者提供了便捷的進出條件，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勞動力集散地的地位。

此外，壽町提供大量廉價的簡易宿舍和短期租賃房屋，這些住房選項符合日僱勞動者的經濟能力和生活需求。然而，隨著城市發展的進程，壽町逐漸被邊緣化。鄰近的港未來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再開發，建設了豪華的商業設施與

高端住宅，而壽町卻未能享受到同樣的基礎設施升級。基礎設施的老化以及公共服務的不足，使得該地區的生活環境日益惡化。即便如此，對於許多無法負擔更高生活成本的勞動者而言，壽町依然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壽町還因其集中化的勞動市場而聞名。當地的勞動中介機構和便捷的雇傭流程使得日僱勞動者能夠迅速找到臨時工作，這種高效率的雇傭體系進一步鞏固了壽町的角色。此外，壽町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支持網絡，這包括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和志願者所提供的免費炊食、醫療支援和生活援助。這些服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者的經濟壓力，並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根據增田明利（2010）《今日から日雇い労働者になった》（《今天起成為日僱勞動者》）「對於壽町一位 50 歲的日僱勞動者進行訪談時，他回憶了 30 年前的情景，並與現在進行了比較。他描述道，30 年前的壽町充滿活力，日僱勞動者眾多，每天清晨街道上擠滿了尋求工作機會的人，許多人聚集在簡易宿舍外等待招聘者的到來。當時的工作雖然辛苦，但機會相對較多，尤其是在港口和建築工地，收入勉強能維持基本生活。」隨著時代變遷，他提到壽町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現在的日僱勞動機會減少，街上的勞動者人數也大幅下降，許多熟悉的面孔早已不見。他指出，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科技的進步，體力勞

動的需求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專業化和機械化的工作形式。

壽町作為橫濱市的一個特殊街區，融合了日僱勞動者的生活日常、NPO 的支援活動以及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形成了一個既真實又充滿挑戰的社區樣貌。對於觀光者來說，步入壽町的感受是強烈而複雜的。日僱勞動者的身影構成了這裡最鮮明的特徵。他們聚集在簡易宿舍外或炊食活動現場，展現出一種面對生活壓力的堅韌。觀光者可能會注意到，他們的穿著和行為雖顯得樸素甚至略帶疲憊，但彼此之間的交流和互助卻散發著社區的溫度。尤其是在早晨的街道上，那些準備出工或等待工作的勞動者，讓人感受到一種真實而不被粉飾的城市生活。

與此同時，NPO 的活動為壽町注入了一絲希望。觀光者可能會目睹炊食活動的現場，志工們熱情地分發食物，並與居民進行友善的交流。這些場景讓人深刻體會到，儘管生活困難，這個社區並非完全孤立，而是由無數默默付出的個人和組織支撐著。然而，壽町的環境也難掩其挑戰。觀光者可能會注意到，許多建築顯得老舊，部分街區略顯破敗，與橫濱其他繁華地區形成鮮明對比。同時，壽町的高齡化現象非常明顯，許多老人步履蹣跚地行走在街頭，這一景象不禁讓人思考都市邊緣化人群的未來。

此外，橫濱市政府的努力也體現在街區中，例如一些更新的公共設施和針對老年人設立的健康中心。然而，觀光者可能會感受到，這些改善與整體需求相比仍然不足，壽町的根本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解決。根據武藏野大學社會福祉學科學生在曙町參加炊食活動作為研討課程一環時的報告記載「…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炊食志工活動。來領取食物的人都非常有禮貌，他們對我們說『謝謝』的樣子讓我印象深刻。雖然聽說他們中的許多人生活困難，但也有人帶著笑容和我們交談，讓我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連結」（武藏野大学人間科学部社会福祉学科，2023 年 8 月 27 日）。

四、空間階層化：黃金町、與港未來 21 地價分布中的空間治理

港未來地區的迅速崛起，得益於港未來 21 計劃的高度集中投入。該計劃旨在提升橫濱市的國際化形象，並將港未來地區定位為商業、會展和旅遊的樞紐。透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例如橫濱地標大廈、太平洋會議中心，以及豪華酒店和購物中心的引入，顯著提高了該地區的吸引力。同時，政府對交通、景觀和公共空間的大量投入，使港未來地區迅速成為橫濱市的地標性區域。

參照圖 6。用橙色虛線圈起的區域，是在港未來地區中被認為最具價值的商業區，圍繞著女王大樓（Queen's Building）。橙色圓點所標示的是地價 A 點，顯示了鄰接港未來地區核心區域的商業大樓的位置。圖 7 中的折線圖則顯示了該 A 地點大樓價格的變動。

另外，在圖 6 中，橙色虛線左下方的黃色虛線所標示的是距離港未來地區約 2.5 至 3 公里的黃金町區域。黃色圓點則代表了黃金町地區中一戶平均水準的住宅，即 B 宅的位置。圖 8 則呈現了 B 宅的地價變遷情況。

港未來地區作為橫濱市港未來 21 計劃的核心，吸引了大量資本、企業和遊客，其 A 點地價上漲了超過 2.56 倍（国土交通省，2024），成為高端商業與居住的象徵。相比之下，黃金町的發展雖受益於鄰近港未來地區的地理優勢，但其 B 點地價僅上升 1.35 倍（国土交通省，2024），發展動力相對不足。黃金町歷史上作為紅燈區的形象，長期以來被社會邊緣化。在 2000 年代初期的再開發計劃中，雖然政府和地方團體推動了以藝術振興為核心的轉型，

但資金投入和規模與港未來地區相比存在明顯差距。此外，黃金町的社區更新更側重於文化層面的提升，例如藝術家進駐和小型文化活動，這些措施對地價提升和經濟效益的拉動效果相對有限。

港未來地區與黃金町之間的發展差距，凸顯了城市再開發政策中資源分配

的不平衡。港未來地區的高額投資與明確定位，造就了其作為橫濱市核心區的地位；而黃金町由於歷史污名與再開發資源的不足，仍然難以擺脫邊緣化地位。這種政策導向的差異，進一步強化了城市空間中的不平等，使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認同上的落差擴大。



▲圖 6 港未來 21 計畫與黃金町地理位置 | 圖片來源：国土交通省（2024）。筆者繪製



▲圖 7 港未來 21 計畫地價 | 圖片來源：國土交通省（2024）。筆者繪製



▲圖 8 黃金町地價 | 圖片來源：國土交通省（2024）。筆者繪製

五、結語

黃金町與港未來地區的發展對比，揭示了橫濱市城市再開發政策在空間治理與資源分配上的不平衡。港未來地區透過港未來 21 計劃的大規模投入和明確的商業定位，迅速崛起為高端經濟樞紐，而黃金町則因其歷史污名與有限的資金支持，雖有所改善但仍難以擺脫邊緣化地位。這種發展差距體現了城市規劃在經濟驅動與社會公平之間的權衡挑戰。

同時，黃金町管理中心通過藝術振興的方式成功推動了當地的空間與文化轉型，為低資源地區的再生提供了一種創新的模式。然而，這種模式在改善社區形象與吸引外部資源的同時，對當地居民的長期影響仍需進一步評估。如何在不加劇社區分化的情況下，實現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壽町作為橫濱市另一個邊緣化地區，則展現了不同的挑戰與韌性。日僱勞動者的生活與當地 NPO 的支持活動形

成了一個相對穩定但脆弱的社會結構。儘管壽町的高齡化與經濟困境問題日益突出，但該地區仍然通過其獨特的勞動市場與社會支持網絡，維持著其基本的功能性。未來的發展需在基礎設施改進與居民需求之間找到平衡，避免因過度商業化而加劇社區邊緣化的風險。

綜上所述，橫濱市的空間治理案例顯示出再開發政策中的多重矛盾與挑戰。一方面，大規模的資金投入與基礎設施建設可以迅速提升地區經濟價值，但另一方面，這種發展模式容易忽視弱勢社區的需求，加劇城市內部的不平等。未來的城市規劃應更關注多層次的發展需求，通過協調歷史、文化與經濟利益，實現真正具有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城市發展。透過黃金町與壽町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平衡發展不僅是經濟與政策的挑戰，更是社會正義與文化價值的實現之道。

參考文獻

Koganecho Area Management Center. (2024). About the town: Voices of the town / The town's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ttps://koganecho.net/history> (Referenced sections: History of re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Heartful World. (2024). <https://hicbc.com/tv/heartfulworld/>

Mitsubishi Estate Co., Ltd. (n.d.). (1993). Yokohama Landmark Tower. Retrieved November 28, 2024, from <https://ja.localguide.biz/listing/yokohama-landmark-tower/>

神奈川新聞社 (2023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kanaloco.jp/news/social/article-353827.html>

国土交通省 (2024)。公示地価・基準地価。 <https://www.reinfolib.mlit.go.jp/landPrices/>

財団法人地図情報センター (2009)。横浜の地図。 https://chizujoho.jpn.org/01_chizujoho/29/mi29_1img/chizujoho_109_D.pdf

静岡県平和資料センターオンラインミュージアム（2024）第二展示室。https://shizuoka-heiwa.jp/?page_id=834#box4

日本国土省気象庁（2024）。日本付近で発生した主な被害地震。https://www.data.jma.go.jp/eqev/data/higai/higai1996-new.html

国土交通省（2024）。地価地図。https://www.reinfolib.mlit.go.jp/map?areaOption=station&surveyYear=2024®ion=200&line=8200&station=%E9%BB%84%E9%87%91%E7%94%BA&layers=publicNotices&publicNotices=00&publicNotices=03&publicNoticeS=05&publicNotices=07&publicNotices=09&publicNotices=10&publicNotices=13&publicNotices=20

日本基督教団神奈川教區壽地區中心（2024）。炊き出しの会。

日ノ出町環境浄化推進協議会（2021）。初黄・日ノ出町地区のこれまでの歩み。http://kogane-x.koganecho.net/history/

米空軍図書館蔵、横浜資料室提供（1945 年 5 月 29 日）。横浜大空襲。

米国立公文書館蔵（1965 年 6 月）。戦後占領時の横浜、中心部。

増田 明利（2010）。今日から日雇い労働者になった。東京：大和書房。

武蔵野大学人間科学部社会福祉学科（2023 年 8 月 27 日）。https://note.com/musw/n/n2cfcb7d2853e

横浜市都市整備局（2024 年 4 月 1 日）。

横浜市役所（2024 年 7 月 2 日）。戦後の接收與市街地の返還。https://www.city.yokohama.lg.jp/city-info/seisaku/torikumi/kichi/sesshu/yokohama-rekishio1.html

横浜市役所（2024 年 4 月 17 日）。みなとみらい 21 地区全体図。https://www.city.yokohama.lg.jp/kurashi/machizukuri-kankyo/toshiseibi/mm21/mmkaishatsu/gaiku.html

横浜市役所（2024）。横浜市経済状況。みなとみらい 21 地区 事業概要。https://www.city.yokohama.lg.jp/kurashi/machizukuri-kankyo/toshiseibi/mm21/gaiyo.html

横浜市役所市史編纂係第一冊。（2024）。横浜市震災誌。1（1）、p.4。

横浜市中区・都市整備局（2005 年 7 月）。中区まちづくり方針。https://www.city.yokohama.lg.jp/naka/kurashi/machizukuri_kankyo/machizukuri/10toshimasu.files/0058_20200324.pdf

横浜市都市整備局（2018）。みなとみらい 21 中央地区都市景観形成ガイドラインの見直しについて。https://www.city.yokohama.lg.jp/kurashi/machizukuri-kankyo/toshiseibi/design/shingikai/bitaisaku/taisaku/116kai.files/0010_20180921.pdf

読売新聞オンライン（2024 年 2 月 23 日）。「青線」だった横浜・黄金町、香水と体臭が混じった宿がアートの街に変わった「バイバイ作戦」。https://www.yomiuri.co.jp/national/20240219-OYT1T50046/

城鄉評論

誰的開放空間？—— 談新板特區豪宅爭議

◎撰稿：陳彤

一、前言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新板特區，隨著都市計畫的推進，近二十年來發展快速，已成為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現代都會區之一。特區中的豪宅群亦成為萬眾矚目之焦點。其中豪宅社區的「開放空間」爭議，更曾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相關討論持續至今。本文將探討新板特區豪宅開放空間發展之始末與爭議內容，並從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深入剖析這些爭議的根源與發展脈絡。藉由回顧爭議事件，並實地探查空間的當前使用情況，筆者希望揭示開放空間政策在實踐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並為未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提供參考意見。

二、新板特區開放空間爭議之背景與初期發展

（一）爭議之始：挪為私用的「開放」空間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的新板特區，隨著都市計畫的推進，近二十年來發展快速，已成為新北市最具代表性的現代都會區之一。特區中的豪宅群亦成為萬眾矚目之焦點。其中豪宅社區的「開放空間」爭議，更曾引發廣泛的社會關注，相關討論持續至今。本文將探討新板特區豪宅開放空間發展之始末與爭議內容，並從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深入剖析這些爭議的根源與發展脈絡。藉由回顧爭議事件，並實地探查空間的當前使用情況，筆者希望揭示開放空間政策在實踐過程中的困難與挑戰，並為未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提供參考意見。

（二）爭議高潮：政府強拆開放空間違建

直到又一個限期改善期屆滿的 2013 年 4 月，仍有 6 處社區開放空間未完成改善，因而市府終於祭出鐵腕手段，到社區張貼拆除公告。此舉引發住戶恐慌，紛紛向民代、市府陳情，或商議在社區外貼公告，表示社區願開放「開放空間」。然而，工務局表示違建部分仍將依法拆除（黃福其，2013a）。

其後於 2013 年 6 月 20 日上午，市府工務局率隊前往 6 處違法封閉之開放空間進行拆除作業，違法加裝的各式華麗裝置頓時化為烏有。原以交誼廳等樣態打造的氣派空間，一夕間變了調。住戶們大概認為已無力回天，便也未再行陳抗。拆除工程尚稱順利。然而，仍有住戶抱怨政府拆其大門，令其門戶大開，危害社區安全，並表示政府應予社區自行拆除的時間，更稱住戶不清楚開放空間之意涵（吳志雲，2013）。

（三）開放空間之起源與政策背景

「開放空間」究竟是什麼、其創設的源起為何？簡言之，它是建商為換取更高的容積率，承諾將社區部分空間開放給一般大眾作通行或休憩使用。當年在鐵路地下化、舊板橋車站腹地有限等背景下誕生的「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發展計畫（黃健二，1993；王琦榕，1976），為能更快速、大規模地進行開發，祭出開放空間等多樣容積獎勵，吸引建商參與開發。配合新板開發政策，建商須於建案留設部分空間供一般大眾使用，另亦須留設部分空間供市府空橋、空中廊道聯通計劃使用，此二者均為開放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板特區成了一個住商機關等功能齊備、內外交通便捷的都會中心，其房價也隨之水漲船高，超越鄰近的臺北市萬華區（呂健豪，2024）。

建商以供大眾使用的開放空間，換取興建更多、更高的建築空間，這樣的機制乍看之下尚稱合理，為何仍會在住戶、建商與大眾間引發持續多年的爭議，甚至在政府強拆違建後，議題仍持續發酵？下節試圖從爭議中的各角色立場與互動，釐清爭議關係網絡。

三、爭議中的多方角力與後續發展

（一）建商與住戶：共犯？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

當年的臺北縣政府若僅憑一己之力，無以完成需大量經費的新板特區開發計畫，於是提供各式容積獎勵予建商，換取建商參與公共建設，或提供建設好的社區空間。政府不費分毫便可取得建好的公共設施，對大眾還可宣稱此舉乃為民謀利，作為政績，一舉數得。

建商則大可忽略政府開放空間政策所標榜的公益價值，只關注這項政策能換取的大量容積、大筆金錢。畢竟建商在容積獎勵開放空間加蓋違建已多有先例，且地方政府亦未積極稽查、取締（監察院，2010）。於是，建商抱著不會受罰的投機心態，在拿到使照後，藉二次加工將開放空間裝修得豪華氣派、納為社區公設，以吸引買家、賣得好價。對此，部分住戶指出建商於當初的建案銷售廣告中，將開放空間位置標示為「飯店式氣派門廳」、KTV、運動中心等公設，入住後方知其為違建。住戶強調，他們亦為受建商欺騙的受害者。另有管委會指出，建商在銷售、領使用執照、簽訂買賣契約及交屋等過程中，從未告知社區一樓為開放空間，而是將該空間作為社區公設售予住戶。因此，管委會擬對建商提出詐

欺告訴，並控訴主管機關監督不力。對此，部分建商回應，在買賣契約中已有註明開放空間不得作為私人使用，認為住戶不應將所有責任歸咎於建商。還有建商指出，開放空間二次施工一事已記載於買賣合約，住戶實為知情。另有建商表示願以當年售價向住戶購回房屋，然住戶因數年來房屋每坪單價已漲了四、五十萬，而不願將房屋賣還（鄭朝陽，2013a；鄭朝陽，2013b；黃福其，2012；黃福其，2013a）。住戶與建商眾說紛紜，且每個建案狀況不一，真相為何，非當事人無從得知。

然而，在 2014 年的一件法院判例中，有位新板特區住戶控告賣方刻意隱瞞社區開放空間為違建之事實，使其誤以為違建空間屬於社區公設，而以較高價格購屋。賣方辯稱已向住戶告知相關情況，然最終法官仍認定賣方無法舉證證明買方知情，「顯見故意不告知」，裁定賣方需以「當初交易價格」與「經鑑定無開放空間之估計價格」之差額賠償買方（饒磐安，2014）。由此案可推知，在眾新板特區開放空間違建案例中，確實可能有部分住戶在毫不知情、甚至在誤以為購得大面積豪華公設的情況下購屋。從這個角度來看，便更能同理住戶為何認為自己遭受欺騙，以及在開放空間被強制開放後，仍將其視為「自家客廳」的心態。此外，也不難推測，建商及仲介為提高售價，極可能刻意隱瞞開放空間需對外開放之事實。

（二）強拆後的開放空間與公民行動發展

這些豪宅社區在被政府強拆違建後，不得不將開放空間一一打開。2014 年 12 月，有位中年男子稱「國家世紀館」社區裝設透明布幕，意圖阻擋民眾使用開放空間，故「微服出巡」，將腳踏車騎進部分應屬開放空間的社區大廳，更自備便當，席地用餐，餐後還在地上仰臥起坐，共達三個多小時。這位「鬧事阿伯」的行徑引起住戶、管理員側目、衝突。警察到場後，因其行為未違法，而無權將其驅離。對此社區主委表示，政府令其開放社區空間，卻無訂定相關社區安全及維護標準，若發生意外，不知應由社區還是政府擔責。另，由新聞記者對此事件之報導用字遣詞如：「竟無法可管」、「侵門踏戶」、「行為離譜」等，可知部分記者，乃至於社會大眾，對開放空間的「公共性」之認知仍顯不足（游凱茹、游博智，2014）。

「鬧事阿伯」事件被媒體報導後，臉書粉絲專頁《大家來找碴》受其啟發，在網路上發起了「豪宅聖誕趴」活動，號召網友於聖誕節當晚，一同至新板特區使用豪宅開放空間。當天約有十餘名民眾響應，一行人在板橋大遠百集合，拿著「自己的豪宅自己用」等標語手牌，前往鄰近的「國鼎」社區一樓沙發區。「國鼎」社區主任管理員接受公庫記者訪問時表示，事前已於網路得知消息，歡迎民眾在不影響他人之前提下使用空間。然而此後社區副主委及一名住戶現身指出該沙發區乃「自願留設開放空間」，非屬「容積獎勵空間」，故非「真正的開放空間」（陳

家豐，2014）。一行人遂改至「畫世紀」社區席地而坐，卻又被警衛以「坐在地上不雅觀、不適當」之名義勸離。另一處場勘時確認有開放空間的「東方富域」社區，則在當日貼出告示，表示該空間因不計入獎勵容積，非屬對外開放空間，非法闖入將視同「現行犯」處理（曾福全，2014）。此舉引發網友非議，市府也在數日後公開表示該空間應為開放空間。其後社區雖撤除禁止進入之公告，然宣稱網友的行為已引起住戶恐慌（陳韋宗，2014）。

約一個月後，臉書粉絲專頁《大家來找碴》再度號召網友，來到前次拒絕他們進入的「東方富域」社區中庭，進行「撕名牌大戰」、「睡衣趴」等活動。活動數天後，出現了「東方富域可能收回部分開放空間」之報導。社區表示在開放大廳後，發生數起外部人士尾隨住戶之情形。社區屢向市府陳情，希望收回社區中未換取容積獎勵的開放空間（陳韋宗，2015）。

與《大家來找碴》同於 2014 年開設、不時互轉貼文的另一粉專《自己的容積自己用》亦密切關注以新板特區為主的容積獎勵開放空間議題。當時就讀台大城鄉所博士班的陳志軒利用閒暇時間，實地踏查新板特區各建案的公共空間使用狀況，分享於粉專，引發網友熱烈迴響，迄今約有 8100 多名追蹤者。其發文內容也一度成為記者撰寫相關新聞之參考及引用來源（鄧凱元，2015）。

從「鬧事阿伯」、《大家來找碴》到《自己的容積自己用》，民眾以個人行動或組織動員、佔領空間或訪查撰文等方式，表達自己對開放空間公共性議題的重視，也成功引起媒體報導、群眾對該議題的認識，以及社區、政府對於開放空間使用議題的正視。然而亦可見單靠拆除開放空間違建，並無法有效解決開放空間公共性之相關問題。

（三）新北市政府的矛盾治理

上述爭議所在之豪宅群緊鄰新北市政府所在地，與執法單位比鄰，卻仍明目張膽地違法，足見政府有瀆職之嫌。從 2011 年起的新聞可見，政府似乎只在接到民眾檢舉後，才會象徵性地前往社區開罰，罰完未見改善，再繼續罰，執法態度消極。並且，市府懲罰的對象竟是社區管委會與住戶，而非能從容積獎勵實際獲益的建商，其背後緣由可議。此外，新北市政府還協助建商詢問內政部營建署（有一說是「建議」營建署）能否讓建商買回開放空間，雖遭營建署否決，但其居心可議（黃福其，2012；黃福其，2013b）。或許市政府係因與建商、社區多次協調未果，便想藉此方式，換取中央背書支持，並非真希望讓建商購回開放空間。一旦開放建商或社區購回開放空間，將開先例，引其他建商效法，而後開放空間政策之公共性將不復存，失去當初立法之美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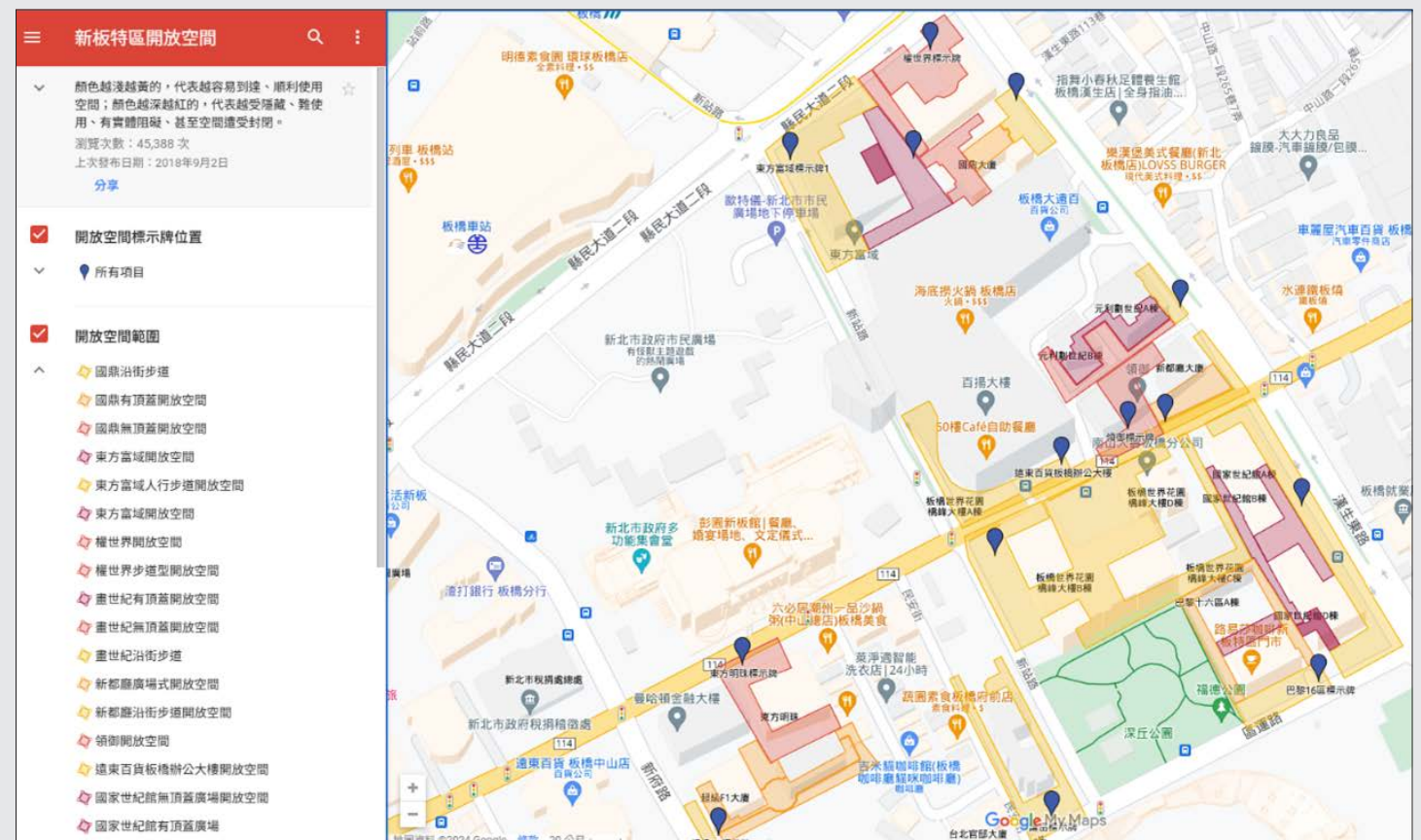
不過新北市政府在多次開罰、協調未果後，最終終採取強制拆除之手段，取回一千三百多坪開放空間，對外宣傳是為民奪回「公共財」之「大有為政府」作

為（吳志雲，2013）。後亦於 2015 年 4 月公告《新北市建築物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明定開放空間之管理、維護相關規定，並載明開放空間之禁止行為，算是對前述公民運動、大眾關切及住戶擔憂之回應。

市府一方面在民眾檢舉時才採取反應性作為，略顯消極，一方面又突然採取強硬措施，拆除違建並訂定政策，整體態度有些矛盾不定。這樣被動反應式的治理方式欠缺長遠、系統性的規劃，無法從根本解決問題，其改善有限，且難持久。

三、十年過後的實地訪查與現況分析

筆者為探討當年爭議空間的十年後開放及使用現況，故參考《自己的容積自己用》粉專製作的開放空間地圖（見圖 1），訪查前述爭議空間現場。



▲圖 1 新板特區開放空間地圖 | 圖片來源：陳志軒（2018）

註：粉專《自己的容積自己用》製作此地圖，以顏色深淺表示開放空間的易達性及可及性，並標示各開放空間標示牌位置。然地圖最後更新日期為 2018 年 9 月 2 日，現各空間開放狀態及標示牌位置均有異動。

（一）觀察一：開放空間公共性進步有限

筆者將空間現況與當年多張新聞圖及《自己的容積自己用》之拍攝照片進行比對，發現十年來，雖空間陳設多有變動，但多數空間並未變得更開放、易用。以當年一度因網友前往活動而禁止大眾進入的「東方富域」社區為例，其開放空間告示牌疑遭撤除、遮掩或放置於不易尋找處，導致筆者沿建築繞了數圈，仍不確定開放空間設於何處。最終找到唯一一處無門窗遮蔽的空間，鼓起勇氣踏入。一踏入，保全立刻上前詢問筆者來意。筆者表示係為完成學校作業而來，並詢問保全該空間是否開放，而得到肯定的答案。保全表示原則上不會阻止民眾進入，但會在旁監督，然平時不太會有民眾步入。該空間設於建築背側，位置少有行人經過，亦不利找尋。入口有保全盯梢，且被社區私用空間包圍，裝潢與社區公設並無區隔，又無告示，難以辨別能否進入。此外，空間亦無放置座椅，也非可供通行使用，整體而言公共性、實用性、近用性均不佳。

「東方富域」旁的「權世界」社區之車道及頂蓋式廣場空間應屬開放空間，卻被社區以紅繩及黃色警戒條包圍，並張貼數張告示，稱其車道正進行工程、雨遮玻璃爆裂待修等，阻擋人流進入。然而筆者端詳許久，並未見到車道有任何工程進行的跡象，且雨遮玻璃早應於十年前就被市府拆除，不該再有任何玻璃等阻擋物，故筆者合理懷疑那些公告、拉繩只是為了阻擋外人進入空間而設。另比對照片，當年華麗圓形雨遮下，置有沙發椅可供休憩，如今椅子已遭撤除，還多了管理員櫃台的監督，令筆者不敢靠近。

附近的「畫世紀」社區亦為當年遭強拆一樓大廳玻璃帷幕的社區之一。2021年還被媒體報導該社區於非颱風天，以貼滿防颱「咒語」的可拆卸玻璃裝置封住大廳四周，並聲稱是為防疫需要。彼時市府表示該社區確有申請安裝防颱設施，然而只有在陸上警報或豪雨特報時才能封閉（黃毓倫、郭文海，2021）。筆者前往勘查當天並非颱風天，社區大廳卻仍全數以防颱門包圍，只是撕去防颱門玻璃上宛若咒語的「防颱措施」字樣，阻絕外人進入。筆者最終只能鼓起勇氣，混於住戶間進入社區。「畫世紀」的一樓開放空間面積極大，並置有多處沙發座椅，然其以防颱門取代当年被拆除的玻璃帷幕牆，仍營造一種私人社區意象，讓人不知其為開放空間，便不會、也不敢進入。

當年「鬧事阿伯」前往的「國家世紀館」則用綠籬圍住後方可直接通往開放空間的入口，讓欲使用的民眾僅能自前方的社區大門進入，筆者也是猶豫再三才裝作若無其事步入。筆者在走訪各社區後發現，當社區之開放空間僅能從有保全監視、並與社區民眾出入動線重疊的單一出入口進出，將使欲使用開放空間的民眾對於是否能步入心生懷疑，怕誤闖私人空間而感到恐懼，最後放棄使用。筆者得以進入前述空間並不代表社區願意對外開放，而很可能只是因為大樓社區住戶太多，管理人員認不全住戶面孔，這才將佯裝得若無其事的筆者誤當住戶，遂未加阻攔。

（二）觀察二：開放空間標示牌設置缺失影響使用

除了管理櫃台、保全崗哨及單一出入口的設置外，開放空間告示牌也可能成為社區阻絕外人使用開放空間的策略。筆者觀察所有社區的立牌，發現其中許多標示牌或未註明社區名稱、方位及周遭路名，或標示牌方位與建築物不同，甚至有少數社區之標示牌已不知去向。以上種種缺失讓民眾難以判斷開放空間之位置、範圍，進而有意圖阻擋民眾使用開放空間之嫌。

現今《新北市建築物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僅規定標示牌應置於廣場、街角之明顯處，並標示維護及管理機關、檢舉電話及開放空間的位置、範圍等，相當籠統。筆者認為該要點應增列規定，令載明建物名稱，以免發生牌面立於兩社區之間而難以判斷之情事。另，標示牌亦應將其所在位置標示於地圖上，並使地圖與觀者同向，或至少標示周遭路名、方位，以利觀者快速辨識位置。若能做到上述幾點，民眾便能快速且明確判斷開放空間的位置及範圍，也能更有底氣地使用本就屬於公眾的開放空間，無須擔心誤闖私人空間，有效減輕民眾使用空間之心理阻礙、情緒成本。標示清楚的開放空間標示牌或許是開放空間增進公共性之根本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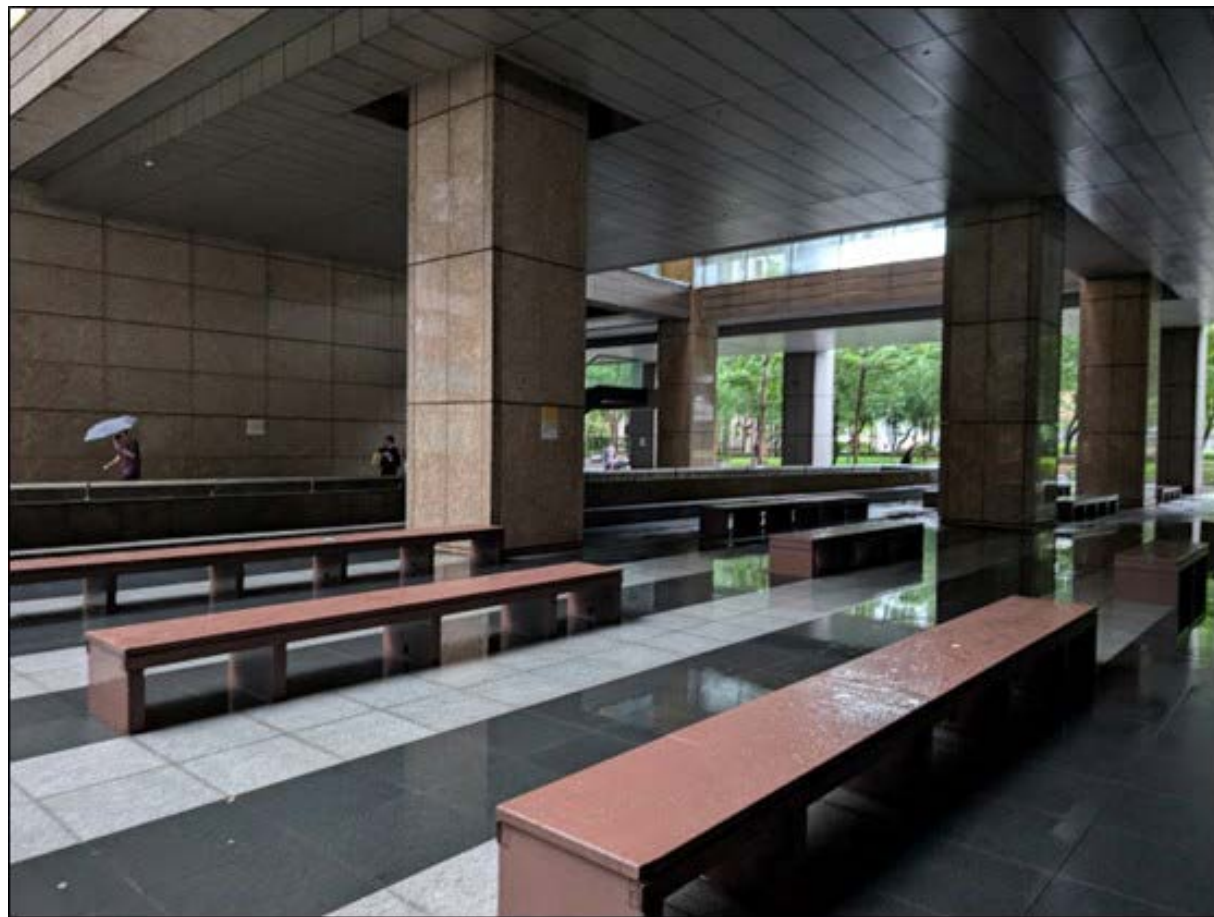
▲圖2 開放空間標示牌 |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註：此標示牌立於兩社區之間，且立牌中建築方位與實際有九十度落差，又未標示週遭路名，令觀者難以判斷其開放空間之具體位置、方位及範圍。

（三）觀察三：原始設計決定空間命運

相較於多數令人失望的豪宅開放空間，「世界花園橋峰」社區倒是新板特區中的一股清流，從設置之初即未曾有過爭議報導。雖與前述六處被拆除違建之社區一樣，有著大片頂蓋型廣場式開放空間，然從圖3可見，該社區從設計之初即未意圖將開放空間充當內部公設，而是以全然開放、供大眾使用之方式進行設計。此外，因其開放空間之動線與住戶進出之動線有明顯區隔，加上該空間的開放式設計讓民眾不會懷疑其公共性，故能很自然地走入，而不會感到任何使用上的心理負擔。筆者幾次路過，均見民眾自在地在廣場上運動、散步、跳舞、談天。

故而筆者認為，或許是最初建商對開放空間的使用設定，以及受該設定影響的空間設計，決定了空間後來的命運。若建商起初便「奉公守法」，將開放空間以「開放給公眾的公共空間」樣態進行設計，並與住戶動線有所區隔，在銷售、使用時便也不會將該空間視為社區公設，住戶自然不會認為該空間屬於社區私用。反觀其他爭議社區，問題多半源於當初建商的取巧心態，將原屬於公眾的開放空間，以社區內部公設的方式進行設計、裝修與宣傳。如此一來，住戶在購屋時，自然便預設該空間屬於社區專有，因而在事後產生受騙或受害的感受。這樣的開放空間也因起初屬內部公設之設定，而與住戶動線高度重疊，故在開放後無可避免地引發住戶



▲圖3 世界花園橋峰社區之部分開放空間 |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被「侵門踏戶」之安全、隱私顧慮。欲使用開放空間的民眾也容易因為該空間的原始裝修及動線設計，覺得自己好似誤闖別人家中，而感到不適、不便。

綜上所述，容積獎勵開放空間制度的先天設計不良，導致部分貪婪無度的建商得以鑽漏洞，騙取大量容獎空間售予住戶，賺取暴利後將責任全部推給住戶承擔。花大錢購買開放空間的住戶和原應享有開放空間的大眾同為受害者。市府不應僅懲罰被建商丟爛攤子的住戶及管委會，而應將違規建商公告、記點，並取消超過若干違規點數的建商之相關容積獎勵優惠。另應設法從源頭制度端解決問題，才能將開放空間真正還歸大眾。

四、小結：未完待續的公民行動

筆者觀察自己的生活周遭充斥著許多開放空間爭議案例，之所以選擇新板特區，主要是因其開放空間型態多樣且密集，並曾在相關議題上受高度關注，具備作為標竿案例之潛力。新板特區豪宅開放空間爭議自政府強拆違建至今已逾十年，期間經數次公民行動與「新板空廊及指標系統工程」，然而至今開放空間仍不夠開放，許多區段處於低度使用狀態，當年的兩個公民行動粉專亦已於多年前停更。除了上述豪宅內部開放空間之使用爭議外，新板特區後續亦有空廊及由空廊串聯而成的商辦開放空間、公共設施等使用低落、甚至荒廢等問題。

此次初步研究後，筆者認為如新板特區這般的既有開放空間，可繼續透過巡水田式的現場勘查、使用及檢舉，來維持或爭取其基本公共性。然而這些行為並不能徹底解決部分開放空間在設計之初即產生的根本缺陷，以及其他更廣泛的開放空間公共性問題。

若要使未來新建成之開放空間不要步入新板特區豪宅之後塵，不能單靠檢舉及佔領行動，而應從源頭設計端解決問題。因此筆者擬繼續以新板為中心，觀察豪宅開放空間，以及由空廊系統串接的商辦、商場等各式開放空間，描繪更立體的開放空間使用圖像。下一步便能試著從田野成果中理出關鍵問題，並研擬「開放空間建議設計準則」予市府及內政部國土署參考，讓開放空間真正還歸大眾。

對於新板特區乃至全台灣開放空間的未來，筆者仍備感期待。



▲圖4 新板特區開放空間爭議豪宅地圖 | 圖片來源：筆者繪製

▼表 1 新板特區豪宅開放空間爭議事件時間表

時間	事件
2011.11	新板特區住戶向新北市府陳情，表示建商領到使照後將開放空間二次加工成「私密空間」賣給住戶，市府對社區開罰並要求限期改善。
2012.03	新板特區豪宅再被檢舉在開放空間設置欄杆、綠籬、花台等，市府再開罰並令其限期改善。
2012.08	新北市府請示內政部營建署能否由建商或社區買回容積獎勵空間，遭否決。
2013.03 月底	六處違規加封開放空間之社區未於期限內改善，市府至社區貼拆除公告。
2013.06 月初	市府工務局完成拆除作業之人力機具調派推演。
2013.06.13	市府前往六社區貼「三天後強制執行」公告。
2013.06.20	市府工務局拆除六社區（國家世紀館、國鼎、巴黎 16 區、畫世紀、權世界、超級 F1）開放空間違建共 1368 坪，並令其月底前完全對外開放。
2014.06	賣家遭郭姓住戶提告隱瞞開放空間違建等事實，被法院判賠 130 萬。
2014.11	台大城鄉所博士生陳志軒開設「自己的容積自己用」臉書粉絲專頁，呼籲大眾關注被豪宅佔領的容獎開放空間。
2014.12 月中	一位中年男子進入國家世紀館社區騎腳踏車、吃便當、做仰臥起坐。
2014.12.25	臉書粉專「大家來找碴」號召網友前往國鼎、畫世紀、東方富域三社區開聖誕趴。
2015.01.24	「大家來找碴」再度號召網友前往東方富域社區。
2015.02	東方富域、國鼎社區向立委江惠貞陳情，欲收回自願留設而無容獎之開放空間。
2015.10.13	《新北市建築物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要點》公告。
2016.05	新板特區空橋及公共開放空間指標系統工程完工。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黃福其（2011、2012、2013a、2013b）、孟祥傑（2012）、吳志雲（2013）、鄭朝陽（2013b）、饒磐安（2014）、呂思逸（2015）、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16）。

參考文獻

王琦榕，1976，〈眼看他樓坍了眼看他又起高樓——板橋發展生機無限〉。光華雜誌，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a6cc2257-b5e3-4c35-a451-3f6ad79860c1&CatId=10&postname=%E7%9C%BC%E7%9C%8B%E4%BB%96%E6%A8%93%E5%9D%8D%E4%BA%86%E7%9C%BC%E7%9C%8B%E4%BB%96%E5%8F%88%E8%B5%B7%E9%AB%98%E6%A8%93%E2%80%94%E2%80%94%E6%9D%BF%E6%A9%8B%E7%99%BC%E5%B1%95%E7%94%9F%E6%A9%9F%E7%84%A1%E9%99%90>，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2 日。

吳志雲，2013，〈佔地千坪 新北 6 豪宅違建 拆了！〉。聯合報，11 月 18 日，B1 版。

呂思逸，2015，〈2 豪宅討開放空間〉。聯合報，2 月 9 日，B1 版。

呂健豪，2024，〈容獎激勵 新板特區翻轉超越萬華〉。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40820000473-260110?chdtv>，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3 日。

孟祥傑，2012，〈綠籬花台擋路 新北市不排除直接拆〉。聯合報，3 月 18 日，A6 版。

陳志軒，2018，新板特區開放空間 [地圖]。Google 地圖，<https://www.google.com/maps/d/viewer?mid=1pwNuQPJPoPTnk589D08QrKm86IQ&ll=25.013035359767972%2C121.46731631566114&z=18>，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3 日。

陳韋宗，2014，〈公共空間禁入 「東方富域」惹眾怒〉。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42741>，取用日期：2014 年 11 月 3 日。

陳韋宗，2015，〈新板豪宅開放空間 恐見社區收回首例〉。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53190?fbclid=IwY2xjawGUNcFleHRuA2FlbQIxMQABHdW9ChMKGZ_hFT-yDjyDej5BW9VU0qydCmLVpuILNqMcpoy0exNZkeu0sQ_aem_FZu_EUhiZQPRPnWLIJRMHA，取用日期：2014 年 11 月 3 日。

陳家豐，2014，〈臉書發起「豪宅耶誕趴」號召網友共享公共空間〉。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25546>，取用日期：2014 年 11 月 3 日。

曾福全，2014，〈禮拜二場勘的時候詢問過的《東方富域》大樓〉〔臉書貼文〕。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856643874386847/?post_id=860699633981271&view=permalink，取用日期：2014 年 11 月 3 日。

游凱茹、游博智，2014，〈闖豪宅公設騎車吃便當 警無法可管〉〔影片〕。三立新聞台，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7G_XizOs，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3 日。

黃健二，1993，《新板橋車站特定專用區發展計畫》。臺北縣政府，6 月。

黃毓倫、郭文海，2021，〈新板特區豪宅驚見「防颱咒」貼整面牆 社區聲稱防疫需求遭打臉〉。民視新聞網，<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1815S01M1>，取用日期：2014 年 11 月 3 日。

黃福其，2011，〈豪宅開放空間 加封違建賣住戶〉。聯合報，11 月 18 日，B1 版。

黃福其，2012，〈新板特區 6 處豪宅 開放空間變私有挨罰〉。聯合報，9 月 6 日，B1 版。

黃福其，2013a，〈新板 6 豪宅 1 樓違建將拆〉。聯合報，4 月 1 日，B1 版。

黃福其，2013b，〈開放空間加封 6 豪宅違建喊拆〉。聯合報，6 月 17 日，A11 版，。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2016，〈新板特區空橋及公共開放空間指標系統工程規劃構想及辦理情形〉。<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home.jsp?id=237&act=be4f48068b2b0031&dataserno=c88dc1550b57916708fa6cd966d11e8a>，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4 日。

監察院，2010，〈99 年內調字第 130 號調查報告〉。監察院，12 月 8 日。

鄧凱元，2015，〈另類土地正義運動／討回被偷走的公共空間〉。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5064104>，取用日期：2024 年 11 月 4 日。

鄭朝陽，2013a，〈新北 6 社區 開放空間違建 拆了〉。聯合報，6 月 21 日，A10 版。

鄭朝陽，2013b，〈新板 6 社區 違建空間 月底前得開放〉。聯合報，6 月 22 日，B1 版。

饒磐安，2014，〈豪宅交誼廳是違建 賣家隱瞞判賠〉。聯合報，6 月 27 日，A14 版。

城鄉評論

政大性別通用廁所爭議事件——運動與空間規劃策略分析

◎撰稿：張維嫻

一、前言

2024年9月23日，一名國立政治大學（下簡稱政大）的女學生，將其在校園中使用性別通用廁所，卻遭到偷拍騷擾的經歷上傳匿名社交平台DCARD，後續學生向校安單位、性平會求助，卻得到缺乏性別意識的不當回覆，此事陸續引起校內同學、媒體與校方的回應（匿名，DCARD，2024年9月25日）。¹在同年10月17日，又有另一女學生在同一個地點遭到偷拍。根據報導，警方並不排除九月的偷拍案亦是該男所為。（陳彩玲，自由時報，2024年10月17日）

一連串討論在各大論壇延燒，並且討論者多認為性別通用廁所「男女皆可進入」的特質，與偷拍犯罪有關，顯示空間的特性在性騷擾案與相關爭議中有重要影響。本文將從女性視角出發，討論目前非二元性別廁所的推行策略有何缺漏，何以導致現今造成廣大生理女性的恐慌，並波及更為邊緣的多元性別族群。

在討論政大爭議事件之前，應先理解全臺非二元性別廁所設立的始末。根據畢恆達（2024：15），早在1990年代中期，謝園等人就已經在女廁運動的脈絡下提出無性別廁所之概念，但當時是從女廁數量不足與照護需求議題切入，可見去除二元性別的公共廁所，對生理女性而言並不必然是不恰當的設施。另一方面，根據林芳玫（2007）的整理，台灣在1990年代數位婦運人士的推動下，性別政策成為全國上下各級選舉的重要戰場之一，並趁著台灣基於國族與國際地位的需求，使性別主流化成為國內政策的重要指引（林芳玫，2007：67-69）。2004年，在葉永鋕事件的影響下，台灣中央政府亦隨之頒布《性別平等教育法》，開始推動體制內的多元性別包容政策，將原先的兩性平等擴大為多元性別之理解。

也因此，由於性別平等教育法要求各級政府與學校都應設立性別平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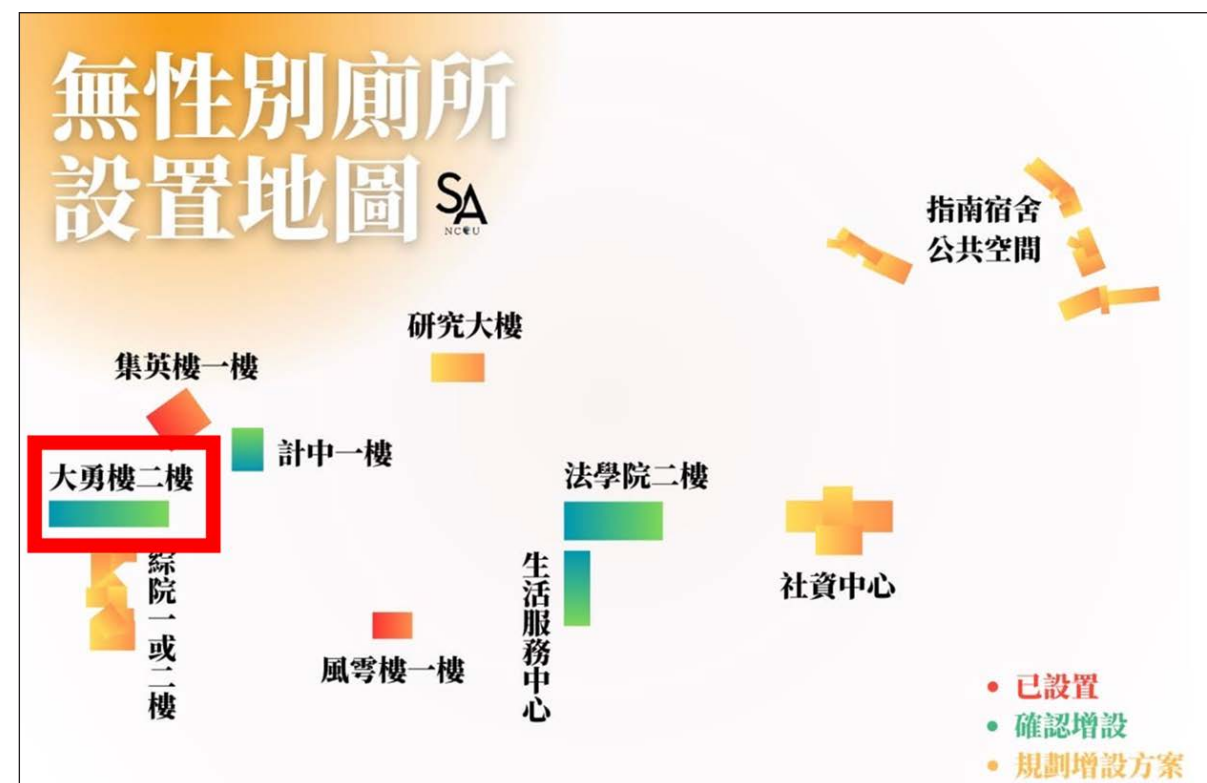
委員會，因此許多關注空間議題的性別專家，也得以直接地影響校園內空間規劃。以最早設立非二元性別廁所的世新大學為例，就是彭滄雯趁著身兼該校性別平等委員的機會，在會議中提起並成

功興辦。後續，更可見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等其他公家單位，紛紛跟上「性別友善」的潮流，試圖在校園、公共場所改建或設立性別友善廁所（畢恆達，2024：17-18）。

二、性別通用廁所爭議事件細節與評析

接續上述非二元性別廁所在台灣的發展，國立政治大學內的相關討論亦不落於人後。早在2009年就已舉辦「無性別廁所日」，只可惜當時的討論度並不高（畢恆達，2024：16）。經過台大、東吳等大學校園陸續設立性別友善廁所，政大的學生會終於在2021年中發放問卷，調查學生意願與認知，其結果顯示，當時的政大學生對於「性別友善廁所」一詞已不陌生，且有四分之三的學生都支持設立，明確不支

持者僅有一成。根據問卷，學生們最常見的支持原因是「有助於校內性別友善、平等的落實」等，反對者則認為「影響上廁所的自在度」或者「避免有心人士利用性別友善廁所實行偷窺行為」（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權益部〔政大學生會〕，2023：24-29）。最終經過將近兩年的籌備，校方終於同意於數棟教學大樓改建具性平意義的性別友善廁所，其中便包含此次性騷案件的地點——大勇樓二樓。



▲圖1 政大無性別廁所設置地圖，紅色方框為本次事件發生地
| 圖片來源：政大學生會，Facebook，2023年4月20日

¹ 根據媒體取得之錄音，女學生向性平會求助時，承辦人員回覆：「……那邊有緊急求救鈴，妳也沒想到按……妳又不是像我一樣戴老花眼鏡，老花眼鏡會有盲點，會有些看不清楚。」顯見其對性騷擾案件中，受害者的心理狀態、案件接收的標準程序頗為無知。（吳冠緯與彭冠霖，華視，2024年9月26日）

（一）事件細節

早在 2023 年 9 月，政大學生會甫公開性別友善廁所之改建計畫時，就有學生在匿名平台上以〈政大的女同學們，我們的廁所正在被消失〉為題討論該政策，並認為校方與學生會並沒有充足地調查學生意願與想法，就倉促公告改建，是「假『性別友善』之名，行剝奪女廁之實（匿名，DCARD，2023 年 9 月 19 日）。當時的留言多聚焦在性別友善廁所可能帶來的尷尬與性騷擾，並且「藍頭」²多表達進出廁所看見異性容易尷尬，「粉頭」則更常提及怕被（男性）性騷擾的感受，針對跨性別者的討論則幾無（僅一則）。

而在今年 9 月的〈大勇樓性別友善廁所偷拍〉一文中，女學生描述自己受到性騷擾的經過、反應與後續求助經驗，並提及校安中心與性平會的不當處置（匿名，DCARD，2024 年 9 月 25 日）。留言亦大多表達安慰與提醒，女性則經常提及自身的恐懼以示同感，但也並沒有過多激烈的言語攻擊男性或跨性別者。真正的爆發點反而是在另一社交平台——Threads。

自 2024 年大選過後，台灣使用 Threads 的用戶就節節上升，影響力亦足以支撐數場全國性集會。根據筆者個人觀察，Threads 明顯聚集了一群對代孕、免術換證議題相當不滿的同溫層，根據其文章的用字遣詞，可推斷多數是順性別女性，隨著 Threads 的演算法渲染，儼然成為一股「恐跨浪潮」。其論述方式包含但

不限於：（1）著重攻擊跨性別者中的男跨女（MTF），並且會視情況將用詞改為跨女或男跨，跨女指「正常、無辜」的跨性別者，男跨則指稱可能會攻擊順性別女性的異常者，亦是其反對的對象。（2）某些用戶認為跨性別運動是對性別刻板印象之固化，因為「男跨女」的實質意涵是男性「模仿」女性的外在表徵，而無經歷過順性別女性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一種將「女性」視為外在、裝飾的嚴重物化行為。（3）恐跨者聲稱，跨性別運動聲量已然大過女性議題，並且試圖透過模糊女性概念的邊界，達到刪除「女性」的概念特性、奪取公眾關注的目的（參考自反免術換證網站「No Self ID TW」）。「反跨」之強烈，使關注跨性別議題的團體紛紛呼籲跨性別群眾，應暫時避免使用社群平台以減少傷害（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Facebook，2024 年 10 月 11 日）。

承繼這個熱度，當 10 月 17 日新聞報導提及李姓男子在政大校園大勇樓性別通用廁所偷拍後，相關議題在 Threads、Facebook 以及 DCARD 上都有所討論。在 DCARD 上，有女性用戶針對偷拍者被逮的新聞發文討論。本文與留言大部分皆批評校方處理此事上的怠慢與效率低落，並沒有討論到跨性別者，與其他兩個平台相對隔離。然而在 Threads 的討論便承繼上述的恐跨現象，甚至影響到 Facebook 的政大學生交流版社團，其中有一位曾任政大性平會委員的同學（依姓名

推論應為男性），認為性別通用廁所會導致處理偷拍事件時，辨認嫌疑人的困難，大量的回覆亦將焦點放在性別通用廁所是否真的會提升偷拍事件發生的機率（個人通訊，2024 年 10 月 17 日）。顯示網路社群對於女性人身安全的焦慮，仍可能延燒至跨性別族群與性別友善廁所議題。

（二）各方觀點與論述評析

接下來，筆者將嘗試整理出，在此次政大性別通用廁所偷拍事件中，校方、學生會與（女）學生的回應，以討論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策略中差強人意之處。首先，本文以 DCARD 平台為主，針對首當其衝的女性學生之反應觀察，發現他們在發言與感受上多以恐懼、同理與避讓為主。比起男學生，女學生更習慣「可能受性騷擾」，並且認定性平案件的舉證、指認困難，因此對校方的配套措施不具信心，選擇自行做出避讓（不去上性別通用廁所），或是會在女性之間相互呼籲。顯示雖然學生之間反對跨性別運動或是性別通用廁所的留言尚不多見，但其焦慮與不安是真實存在的情緒。

在學生會方面。針對大勇樓的偷拍事件，學生會表示將先行加裝臨時防水膠條與刷毛於門縫處。同時也在文章中承諾，會在廁所周遭張貼偷拍求救的管道與指引。校方則表示，嚴厲譴責偷拍行為並高度肯定受害者與協助者的義舉，承諾會「責成總務處緊急加裝臨時性預防措施，立即安排加裝網狀隔板於廁間門縫」。（政大學生會，Facebook，2024 年 10 月 21 日；政大秘書處公告，2024 年 10 月 17 日）

筆者認為，學生會與校方都有「性別盲」的疑慮。以學生會於 2023 年發布的《國立政治大學性別友善廁所白皮書》為例，本白皮書對性別友善廁所與性別議題的書寫已經頗為完整，只是從細微之處仍能看見該屆學生會對於性別議題的偏重與取舍。首先，從該白皮書的排版與篇幅來看，比起性別友善廁所的婦運脈絡，行文更偏重破除二元性別框架，為非二元性別者提供安心的如廁空間，至於女性人身安全、照顧者方便性等議題則較少著墨。比如在照明與通風一節，白皮書建議廁所應以自然通風、採光為主，人造技術為輔，忽略了女性對偷拍的擔憂，並認為以清潔人力兼任偵測者可以解決之。對於求救鈴的解釋，也只談論在身障議題脈絡下的求救，缺乏考慮廁所作為一個性暴力犯罪常見的場所，所需的「求救」需求。最後，在問卷調查結果分析一節，政大學生會對性別友善廁所的調查中，竟然缺少針對不同性別的討論與分析，僅將受訪者廣泛稱為「學生」，不僅忽視男女兩性不同的性別處境，更假設非二元性別群體的特性、處境皆為均質，並且都喜愛性別友善廁所的設計。

校方的部分則可從性別通用廁所的實際樣貌，與性平案件發生後的因應做討論。首先，不可忽略的是，經過 2021 年以來的推動，不同於既有集英樓廁所對非二元性別廁所用意的曲解，新大勇樓廁所之設計確實有了許多進步。³ 比如其外部標誌便劃時代地僅以「廁所」命名之，小便斗也被平

² 在 DCARD 社群中，以藍色為頭像，其用戶會被假定為男性；粉色則為女性。

³ 集英樓廁所亦為非二元性別廁所，但外部標誌是兩個分別穿著裙裝、褲裝的人形；內部空間亦缺少防偷拍、改變性別分邊的設計，與性別平等的本意相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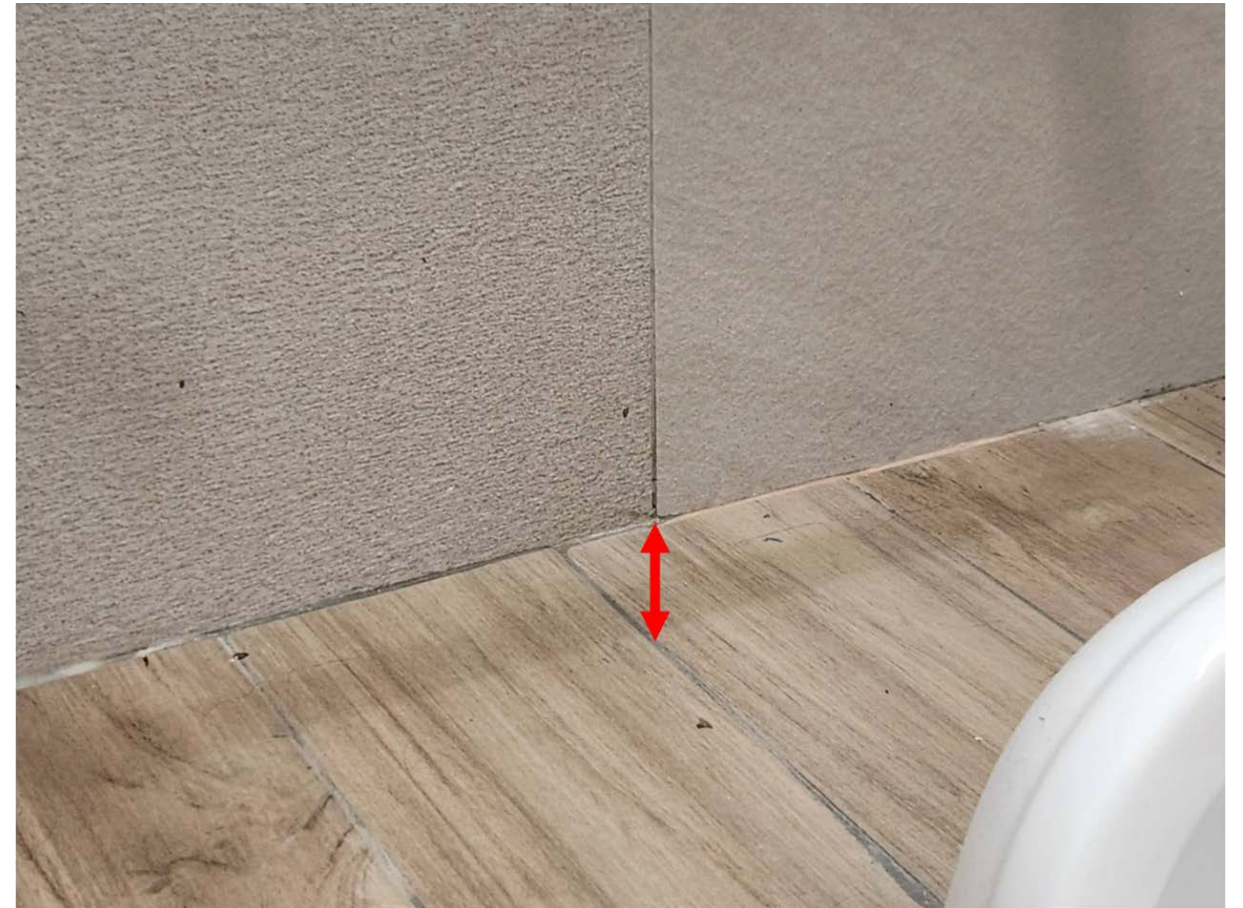
均分散在兩邊，不再是「性別分邊」的設計，加寬的搗擺、廁間避開窗戶位置等防偷拍設計也都有做到。然而，造成偷拍的漏洞卻出在過去鮮有人注意的搗擺底部縫隙，根據作者親自赴政大觀察（2024年10月21日午後），發現雖然學生會已於10/21早上十點公開表示以膠條、刷毛亡羊補牢，校方聲明也聲稱會加裝網狀隔板，但在14個生理女性可用的側間中，就有6間底部仍有縫隙而未加上膠條，高度不等但最高的約有三公分，確實可供手機通過並進行偷拍。⁴8間小便斗廁間亦皆有縫隙，可供手機通過。顯示在硬體設計上仍有疏漏，而校方與學生會的補救措施也沒能全然解決。

其次，政大校方在事發後的因應更是缺乏性別意識與警覺性。如同上述整理，早在九月就有學生向校安中心、性平會等組織告知，並請求調取事發廁所外的監視器，但皆收到消極的回應，前者以隱私為由，不同意提供而僅能透過性平會；後者的承辦人員則責怪該同學沒有第一時間就按下緊急求救鈴（吳冠緯與彭冠霖，華視，2024年9月26日）。在事件陸續登上新聞版面後，政大的回應也並不積極，僅以「會加強巡邏」回應。可見無論是在性別意識還是具體實踐上，政大校方對廁所的警覺性不足，間接導致網路輿論中，性別通用廁所的正當性遭到削弱。



▲圖2 事發地點的無性別廁所告示牌與便器分佈圖
|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2024年10月21日

⁴ 作者在現場確認兩廁間無人使用後，與同行友人共同實驗。



▲圖3 蹲式馬桶廁間搗擺的空隙，高度約三公分 | 圖片來源：作者自攝，2024年10月21日

三、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策略反思

綜觀學生會與政大校方的缺失，本文認為在台灣的大學校園引入性別通用廁所論述中，事實上還隱含著三個未爆彈。其一，性別運動與官僚體制永恆的衝突；其二，女性作為社會結構中的「第二性」，所面臨的敵意環境並未解除，而與身體、隱私密切相關的公共廁所，勢必成為第一戰場，但女性的人身與隱私安全卻並未成為主要議題；其三，在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過程中，針對現有經驗與恐懼的探討相對不足，由學生會主導以及與校方的合作導致使用者感到不被重視，對性別友善廁所的反對與質疑亦不能充分表達，才導致積蓄的不滿一朝爆發。

首先，在處理性暴力相關的案件中，早有大量論述討論「依法行政」對受害者造成的二次傷害（畢恆達，2004；李柏翰等，2023），然而，在此次政大校方對偷拍事件的回應中，屢屢可見依照官僚體制邏輯而來的回覆，導致當事同學持續陷入自我懷疑與傷害之中。其次，根據政大性平會的公告，針對設置性別友善廁所的事前討論工作坊僅開設一場，也有學生在匿名平台表示建置的決策並沒有經過充足的討論與告知，在建置完成之後，相關的配套與救濟措施也沒能有效幫助受害者，可見政大校方並不能全然理解性別友善的推動。從本質上來看，顧燕翎（2005）曾對官僚體制有所批判，認為官僚體制的

服從、宰制性格，根本上就與女性主義所追求的改革有所衝突，若無積極的推動者（性別學者或高度關心相關議題的學生會），相關政策必然無法持續，甚或流於形式。

然而，性別運動在制度中的困境未必是本質性的互斥，如鄭珮宸（2020）所觀察，試圖制度化的性別改革極容易被政治名聲與利益、管理需求所扭曲，是因為政府與媒體出於社會結構之習慣與自利，傾向忽視改革之中的公民角色，轉而將改革冠以「政績」之名，將功勞歸於政府，公民的角色則永遠維持在單一的被動形象。甚至當推動者具有邊緣的政治身分時，更容易遭到污名與忽視。王顯中（2017）則認為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台灣的公共領域討論中，「（上層階級的經濟）自由—民主」秩序仍然居於優位，即便社運團體積極推動多元主體，面對群眾倡議時仍需要回歸「自由—民主」的框架，因此導致性別議題難以被排在首位。

綜觀這幾篇不同年代的研究，可以看到性別運動的論述逐漸由本質性的思考與性別二元框架，走到跳脫本質與多元的框架，同時也反省了多年來性別運動與主流體制的關係。其中，鄭（2020）與王（2017）兩者形成對比，同樣提到主流體制對運動成果的曲解或竊奪，前者以特公盟的例子證明性別運動或相關實踐仍有成功進入民主體制運作的可能，王（2017）則以較悲觀的態度評論之，認為當性別運動試圖進入體制，只會被排在次要位置。對此，筆者認為在未來的運動實踐上，不可能完全如王（2017）所希望的，

改變台灣民眾討論公共議題時的議程，畢竟在根深蒂固的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主體下，人無法跳脫經濟與資本的框架思考公共議題。然而，若要繼續與體制配合，也未必能複製特公盟的成功，除了該研究提到，運動者的成果經常遭到政府竊奪這種負面影響，性別議題的高度異質性與經驗取向，皆使得缺乏相關經驗者很難理解當前性別運動的追求，缺少了支持者，就難以在民主的框架下取得足夠的正當性。因此，本文認為，運動者應該認知到多年來主流框架對運動成果的竊奪，已然造成大眾對運動理解失準，因此，運動者應該重新審慎地思考運動與體制貼近的利弊，並嘗試更綿密、貼近常民生活的倡議策略。

其次，性別通用廁所在台灣除了有婦運的脈絡之外，近年更常被討論的是要破除二元性別框架，跨越本質論。然而，本文認為在討論跨越「本質」之前，首先要理解組成個人條件的「本質」，也就是了解個體在社會結構中所擁有的特權、意識形態與限制。而台灣的女性權益，雖然因為多年來的婦運努力已有長足進步，但根據2022年人約盟所提出的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平行報告書，從疫情中女性更難生存到女性障礙者的受忽視，皆可證實女性仍處於社會結構中的「第二性」地位。其中性暴力防治的成效更相當有限，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更新與網路新型性暴力之出現，國家的政策顯得反應速度過慢又無力（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2）。

面對上述現實，性別友善廁所的推動者卻依舊以跨越本質、跳脫二元框架為主要論述，反倒落入忽視既有性別階級，對女性的人身安全置若罔聞的陷阱。與此同時，也因為性別友善廁所與跳脫框架被人們視為跨運的重要成果，連帶導致跨性別族群遭到焦慮者的攻擊。因此，本文認為此刻不能只是抨擊焦慮者們為恐跨，而是應該重新認知、反省女性的焦慮來源，將人身安全與隱私重新放回視野中心，而非忽視結構與造成結構的種種要素，僅喊著「破除二元」的口號。

最後，第三個未爆彈指的是，政大學生會為推動性別友善廁所而選用的策略，沒能緩解反對者的尷尬與不安，反而在持續的累積下導致強烈的反對情緒。對於這種情緒，Speak and Ashok Kumar（2018：161-163）一文解釋到，右翼政治的興起就肇因於，具有批判意識的規劃論述在實踐中，忽略了公平正義等概念在大眾層次的共識塑造，使得大眾規範性使用道德倫理框架思考之，認知價值只能當作

絕對真理來信奉。在此次偷拍事件的相關討論中，也可以看到人們在早期就提出不安與恐懼，卻沒能得到校方與學生會適當的回應。唯一可以明確表達意見的工作坊也僅僅辦理過一次。對於反對的學生而言，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立並不是進步的象徵，而是其心聲又一次被官僚、組織所忽略，性別平等的美意也因此不能傳達。

從前文整理的「恐跨」論述中，可以看到反對者對跨性別群體的理解並不真切，真正的不滿反而在於校方與學生會對女性困境的忽視。本文認為，要真正緩解此次恐跨危機，避免未來性別友善廁所與跨性別運動被打上厭女標籤，就必須正視順性別女性的焦慮，跳脫性別運動中細部的分類，集中量能並共同討論女性的人身與隱私安全問題。同時，各團體應該積極尋找不同議題與女性議題的相關性，產出以女性為受眾的運動論述，以此避免經營性別運動的同時，使不同族群產生資源被侵奪之感，反而傷害了社會運動本應保護、重視或視為根本的人群。

四、結論

本文從順性別異性戀女性的視角切入，討論政大性別通用廁所偷拍事件中，從事前預防、事後回應，到整體的運動論述之大小漏洞。本文觀察到，順性別女性的焦慮是爭議的核心。對女性而言，公共廁所是必須，卻不總是安全的空間，面對任何的變動，女性承受風險的能力亦相對薄弱，導致其反應特別激烈。另一方面，

相比起近年稍有斬獲的同志運動，跨性別運動仍在耕耘階段，性別通用廁所也並不像同志遊行與同志驕傲日能夠被主流政治人物提及甚至實踐，而還停留在校園等小範圍的嘗試中。因此「廁所」之所以引起恐懼，並不是跨性別者實際上造成了傷害，而是因為其議題性質牽涉人身安全，同時在推動過程中，官方與學生會沒有做足

功課，使性別通用廁所之改建沒能取得使用者認知中的正當性，長期觀點受忽略的使用者觀點加上對人身安全的焦慮，才導致女性的焦慮無從排解，便以令人不安、不捨的方式，朝更弱勢的跨性別族群湧去。

本文認為，任何性別／性傾向相關的社會運動，雖然在權利主體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甚至可能相互矛盾，但就社會結構而言，都是受到父權社會結構貶低、剝削的人群，在策略上不該斷然分隔。筆者認為，上述運動應該重新論述並認識（尤其女性的）日常，除了討論（破除）邊界之外，也應該相互認識不同主體的視角，使倡議的手段與論述不致於無意間傷害其他盟友，反而淪為「弱弱相殘」，不利性別平等的實踐。

參考文獻

Speak, Suzanne and Ashok Kumar (2018) “The dilemmas of diversity: Gender, race and ethnicity on planning theory.” In Michael Gunder, Ali Madanipour, Vanessa Watson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Theory (pp. 155-166). New York: Routledge.

Y 旅人（最後參考日期 2024 年 11 月 3 日）。女性空間的消失。No Self ID TW。https://noselfidtw.cc/impact/space/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2022）。2022CEDAW 平行報告。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https://covenantwatch.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12/20220531_CW_2022_CEDAW-PR_TC_rev.1.pdf

王顯中（2017）。性運 2.0：歷史與當下的雙向運動。應用倫理評論。62，69-83。

台灣性別不明關懷協會（2024 年 10 月 11 日）。海上陸上反跨颱風警報。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istscareTW/posts/585692837143177/?_rdr

吳冠緯與彭冠霖（2024 年 9 月 26 日）。政大性平會遭控質問受害者「怎不求救」校方未回應。華視新聞。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2409/202409262381229.html

李柏翰、官晨怡、林峻吉、林耕暉、張竹苓（2023）。打造加害環境：以臺大公衛 MeToo 事件為例。婦研縱橫，119，48-59。

林芳玫（2017）。性別主流化在臺灣：從國際化到在地化實踐。婦研縱橫，84，64-72。

政大秘書處（2024 年 10 月 17 日）。針對大勇樓通用廁所偷拍事件 校方緊急因應說明。政大官網。https://www.nccu.edu.tw/p/405-1000-17935,c86.php?Lang=zh-tw

政大學生會（2023 年 4 月 20 日）。性別通用廁所設置辦法通過校務會議。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683393080495394&id=100064741234608&set=a.617901127044590&locale=zh_TW

政大學生會（2024 年 10 月 21 日）。偷拍事件嚴厲譴責。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Ss7eJciyacaqYDDE/

匿名（2023 年 9 月 19 日）。政大的女同學們，我們的廁所正在被消失。DCARD。https://www.dcard.tw/f/nccu/p/253323026

匿名（2024 年 9 月 25 日）。大勇樓性別友善廁所偷拍（更）。DCARD。https://www.dcard.tw/f/nccu/p/256760215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會權益部（2023）。國立政治大學性別友善廁所白皮書。政大學生會。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Ck4aqIhMD1s0oJweVVTuWKOZ580FzCP/view

畢恆達（2004）。空間就是性別。心靈工坊。

畢恆達（2024 年 1 月 31 日）。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廁所設置參考手冊。教育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

陳彩玲（2024 年 10 月 17 日）。手機藏近百部影像、數十女受害！政大偷拍狼收押禁見。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amp/news/society/breakingnews/4833923

鄭珮宸（2020）。改革公園兒童遊戲場的媽媽民主：連結照顧日常與倡議論述的對抗性公共領域。臺灣社會學刊，67，135-191。

顧燕翎（2005）。女性主義與官僚體制：重讀《女性主義與官僚體制之難以兩立》。婦研縱橫，74，80-86。